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 《记忆》311期

### 【悼唐伟】

清华、深大纪念唐伟

唐伟夫人王祖杨致谢

### 【思想文化】

清华的教育——从清华大学的老校训看党化教育/唐伟  
国家的职位与任期 /严家祺

### 【百年中国】

清华文革蒯氏黑牢的覆灭/周宏余

附：414 战歌

画说我的一生（16）/ 刘海鸥

上战场，枪一响……

（1967年8月-10月）（中）

### 【人物】

低学历老学者何方/宋以敏

技工刘榔头/向真

### 【述往】

1973-1977：我的“二外”记忆（14）

——我带走了“二外”的一张借书证/李红云

### 【书讯】

《吴忠将军口述——几件大事亲历记》在美出版

陈楚三、李大震整理说明

### 【资料】

清华大学文革期间造反组织的情况调查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一九六七年目录

### 【读者来信】

1. 林成谈言真《写给明天的纪念》

2. 一青年读者谈沈言真的长篇小说《青春无歌》

【悼唐伟】

## 悼唐伟

——清华文革反思的先行者和两派和解的推动者



唐伟千古

唐堯有继清华学子气象万千  
伟业未竟一代俊杰群英已古

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最难忘却家国情怀。

心有多强大，路有多宽广  
——呼唤中国的政治复兴和思想启蒙

我的外祖母家庭成分是小土地出租。我1岁多时，参加“地下党”的父亲被抓进了渣滓洞监狱，随后牺牲。外祖母接纳了我们，耗尽一生的劳作协助母亲抚养我们兄弟。两位老人教育我们：参加革命工作就是奉献、牺牲，而不是索取、牟利；要坚守俭朴勤奋、知道感恩慎独。哪怕“钻磨眼”（磨眼：指石磨的进料口）那样的艰难痛苦，也要豁出命钻过去。

——唐伟



唐伟的父亲唐征久，男，四川岳池人，1912年出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8月因策动岳池广安起义被捕，关押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狱中，唐征久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在敌人面前毫不屈服，经敌人多次严刑拷打，终不露出半点党的情况。唐征久喜爱画画，爱写古体诗，在狱中他自绘自制了一把布扇。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渣滓洞。时年三十七岁。

### 唐伟自述

毕业后我在青海西宁十年，甘肃兰州四年，广东深圳十六年。其中当机械工人三年，政府机关干部七年，高校干部七年，企业干部十三年。从那个“只开花，不结果”的年代开始，我都在社会生活的第一线。在青海当过工人，干部，支农工作组，去过藏民区，麻风病区约两年多，还教过一年高中语文。在兰州大学、深圳大学经历了高校复兴，改革的动荡。在深圳建材工业集团认真工作了四年多，救活了两个严重亏损的企业。这两个国营企业创建的利润近五亿元。然后是被诬

陷，等待落实政策八年多。

命运待我不薄。给了我广阔而厚实的生活，也给了我中年以后多姿多彩的高质量的生活，还给了我一个安定温暖幸福的家庭。妻王祖扬在深圳大学研究生办公室工作…。这些珍贵的情感是世间最高的消费。

#### 胡鹏池：

老唐走了，老唐生前早酝酿多年的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弃子》也没了下文。老唐曾告诉我，他的这本小说以二十四个节气作为章名。老唐自己的小说没有完成，却为我的两本书写了序言，都是一、两万字的巨作。为《芦花瑟瑟》写的序言标题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最难忘却家国情怀”。写于2013年1月19日

2014年7月16又为我的另一本集子《通俗政治》写了序言“心有多强大，路有多宽广——呼唤中国的政治复兴和思想启蒙”。

#### 张比：

1966年的八八串联会，向工作组扶植的筹委会挑战，实际上是挑战传统，追求公平正义的开端。清华有多少不满于被压抑的学生和教职工，甚至于家属小孩都知道八八，信任八八。唐伟登高一呼，他年青英俊的相貌，带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勇敢直爽的作风，吸引了多少人！很快，八九就败下阵来。后来，魔咒一样的内战让人心痛。几十年后，唐伟似少年归来，仍是豪爽，仍是聪明过人，只是岁月沧海，让他更加通达，更加明智，更加大度，用幽默诠释过往烟云，用清醒唤醒被掩盖的良知。清华历史，绕不开唐伟的名字。他在天国，也是一颗闪亮的星。

#### 邱心伟：

唐伟走了，看那么多校友们的怀念，我已经无语。他们对唐伟的怀念，思念，赞颂都表达了我想说的话。

记得2019年春节后我南下，其中最重要的一站是去深圳。唐伟居然在家人陪同下，外出吃饭给我和王明、张鸿庆接风。

“行胜于言”应该是清华学子崇尚的。从深圳回去后，我加速了清华《老照片故事》的编辑……两年大半后我终于完成了书。现在可以告慰唐伟、汲鹏天上的英灵，将近十五年过去的筹划，努力，我们曾讨论的“留下“文革史料”愿望基本实现了。

孙怒涛说得对：唐伟是清华文革反思的先行者和两派和解的推动者。

2007年的呼吁虽然当时三派头头没签名，但他一直在做工作。

他带我见了许多团派的头；他让一个熟悉的“小朋友”组织了和文革中学生联动的见面；又让清华附中马安约了附中的卜大华等聊天…当然每次也拉上老蒯去听，去和中学生交流。

虽然，约聊的人观点不一定相同，但一个人见识多了，心胸就大，格局就大。唐伟就这样，广交朋友，能帮人人就帮助人，就校友中来说，无论是团派还是四派，受他帮助人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帮生活比较“惨”的狗熊在清华争取福利…他能够在刘冰晚年时，年年到北京来替他过生日。

清华多才子，多能人，但能像唐伟那样敢爱，敢恨，敢说，敢骂的人不多。所以他遭俗人嫉妒，遭小人排挤，没当大官。

但在清华人的心目中，对你那份特殊的尊敬、崇敬，别人是没有的。

唐伟，你快走！但燊、汲鹏、吕术祖在天堂等着你。唐伟，你慢慢走！等着我们，将来还作朋友。

**陈楚三：**

沉痛悼念唐伟！唐伟在清华第一个举起义旗反对蒯大富的极左，清华文革史不会忘记！

**包薇：**

以前只知道他是烈士子弟，但他为人低调，从不以此作为资本，为人正直、善良、谦虚，今天才知道当年新华社在重庆谈判期间发表的一篇向美国致敬，新中国要走自由民主道路的重头文章，就是他父亲写的。

**雷夏：**

唐伟是那时代清华园里的一颗璀璨的明星。1966年8月8日，化学馆201大教室（或301），唐伟主持反工作组的串联会，义正词严，极具感召力。后就以当天的日期“八八”作为名称，八八串联会就此诞生。当时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不期竟先吾等仙去，悲哉。望亲属节哀。唐伟当在天国俯瞰大地的变迁。

**老黄：**

1984年唐伟是深大党办主任，辅佐党委书记罗征启老师做了很多开放改革之事。深大也曾因此名扬全国，常常一天要接待20多个高校来参观学习。唐伟思维高远，文字能力和宣传能力极强。正是强调三自（自立，自律，自强）和脚踏实地，深大才短短30多年，有了今日辉煌。例如校友财富居全国高校第一，学术排名广东居第三。正是：热血精英，追寻开放，同心缔造，大学之光。

深大人不会忘记唐伟！

**林群：**

我曾陪唐伟兄去渣滓洞扫墓，唐老先生为了新中国连尸骨都没留下来，他牺牲时唐伟才一岁多，对父亲都没有记忆。四兄弟都是大学生，有两个上了清华，大哥还是胡锦涛的老师。

唐伟不仅有一个英雄的父亲，还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在他们的影响下，唐伟也走完了传奇的一生。看着他19岁时站在天安门楼上发言的照片，不禁令人钦佩！唐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987年前后，时任团中央书记胡锦涛来深圳视察，当时我在市团委工作，交谈中胡锦涛得知我曾在深大与唐伟一起工作时，就问了唐伟的近况，并让我向唐伟问好。几年以后，锦涛同志已是政治局常委，他跟贾春旺，任彦生小聚时，聊起唐伟，并委托任彦生向唐伟问好。胡总书记两次托人向唐伟问好，这也是一种殊荣。但我就忘了问唐伟，他跟胡锦涛是什么交情？为什么会两次委托人向他问好？

## 致 谢

王祖杨(唐伟夫人)

外子唐伟于2022年元月1日22时47分辞别人世，元月5日为其举行了告别会，在鲜花的簇拥下，亲人、朋友、校友一一和唐伟告别，陪伴我们家人与他温馨平和地走完最后一程，让他开始新的行程。

唐伟生于四川省岳池县一个烈士家庭，自考入清华，在他的面前就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开启了跌宕起伏的人生旅程。唐伟的一生有过堪夸世俗的得意，也有过半生寂寂繁霜鬓的心情。但唯有身边的朋友们不虞匮乏，无论高潮低谷，都与他相伴同行，这是他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唐伟患病近四年，朋友们始终在他的身边，像火一样温暖着他，像清风一样吹拂着他，像甘露一样滋润着他，让他从未有过一朝卧病谁相识的感慨。

他的学生，朋友及清华大学的校友和学长们，特别是在深的校友们，更是给予他兄弟般的关怀与帮助，使他在与险恶的疾病斗争时，不孤独、有力量、决不向命运屈服。当他辞别人世后，朋友、学长们更是以文字语言的方式和他告别，缅怀他、追忆他，悼念他，让他的在天之灵也能感知到众多的关爱、温暖和祝福。家人在此深深地感谢！

人生如逆旅，你我皆行人，只是有些人行得快些，有些人跟随其后。能同行即是幸事，即便万事消磨尽，犹有清香似旧时。唐伟走了，有多少不舍，有多少珍藏的记忆，有多少未完成的心愿都随他去了！

他走了，在深切的怀念中，他是永生的！

再一次向大家为唐伟所做的一切表示衷心的感谢！

2022.1.7





## 【思想文化】

编者按：2012年7月31日，本刊发表了唐伟的《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读后》，并加了编者按，其中提到：“此文是关于清华大学历史和教育的—篇重要文章。作者不仅描述、分析了清华的两派，以及他们所依恃的理论。而且对清华的教育及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入而精辟的剖析。本刊曾编发过两期“清华文革”专辑，并刊发过多篇关于清华文革的文章，在反思的深广和文笔的犀利上，此文首屈一指。”

此文曾在互联网上出现过，现在已经被屏蔽。

2022年元月1日唐伟先生病逝，为了纪念清华文革历史的杰出研究者，本刊重发此文的后半部分。

## 清华的教育

### ——从清华大学的新老校训看党化教育<sup>1</sup>

唐伟

清华文革大戏收场，劫后余生的清华并没有浴火重生、凤凰涅槃。资中筠先生说，它已经不是我上学时的清华了，现在的清华聚天下英才而毁之。

1985年清华第七次党代会提出，“从现在起的十年，是把清华大学逐步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的重要发展阶段”。1993年初的暑期干部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都赞成把学校的奋斗目标确定为“到建校100周年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大学”。1998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正式提出：“为了实行现代化，我国需要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并且确定北大、清华为国家第一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点大学。这个目标既是学校的愿望，更是国家意志、政府行为。去年4月是风光无限的清华百年校庆，是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话题却再也无颜提起。“学校愿望、国家意志、政府行为”成了让人怎么也笑不起来的笑柄。陕西师范大学的一位教师曾是我在兰州大学时的学生，他不客气地对我说：你们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是“向金钱献媚，向权力下跪。”是啊，不知哪个下流

<sup>1</sup> 此文的副标题为编者所加。

无耻的马屁精把涛哥的照片放得最大、放在二校门图案中最显眼的正中央，把母校众多的先贤、恩师的照片作为陪衬、台柱。尴尬呀！你让涛哥情何以堪！你让母校情何以堪！你让我们情何以堪！

最近，出了一个说脱口秀的北美崔哥，他说北大建校以来出了600个名人，而清华只出了一个蒯大富。这不禁也让我想起了一个段子：三个分别来自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人吹牛。人大的说：“我们学校的前身是陕北公学，党领导的老师都在我们学校。”清华的讲：“我们培养出了最多的省部级高官”。北大的最谦逊：“我们学校只出了一个图书管理员，但他领导了中国28年。”北美崔哥说得不对，清华名人中至少还有一个涛哥。他和老蒯都来自江苏农村，都是蒋南翔时期清华学生中的“红人”，太多相似的学生生活和共同的清华文革经历，在现代教育的过程中，在优胜劣汰的管理制度下，本应出现难分轩轻的毕业生。奇迹出现了：一样的种子，种在一样的土地上，同时生出了完全不同的果实。一个是造反有理、“痞子”掌权；一个是又红又专、全面发展。这让我们不能不膺服教育的神奇功能，去找寻其中的道理，去重温如同魔咒般的校训。

## 一、清华老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这个标题是我抄黄延复的，一个字都没改动。黄老先生毕业后就在校史办公室工作，我读他编写的书籍资料如聆面训，清华往事好像没有他不知道的。他把枯燥的工作干成了兴趣盎然的专业，直到退休。他在故纸堆中找寻人生、心系母校且不忘育作他人，任何一个清华学生心中都会有一丝感动。

1914年冬，梁启超正在清华“赁屋著书”，学校就趁机请他给学生作一次“伦理演说”。梁先生欣然接受邀请，并自定演讲题目为《君子》。他分别引《周易》乾、坤二卦的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描述君子人所应具备的精神和品格。他勉励清华学子“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

1917年周诒春任清华学校校长期间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作图制徽，定为校训。1949年以后，镶嵌于大礼堂额顶的“清华学校校徽”图案被一巨大的红色五角星覆盖。老校训从此被人淡忘。上世纪末，覆盖校训的红五星被揭掉，

大礼堂上的老校训方才重现。1999年，1958级校友集资将一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字碑镶嵌在老图书馆大厅北壁上。2000年，学校新建东南大门，又把这八字校训铭刻在大门口的巨石卧碑上，以志永远。

## 二、蒋南翔的“校训”：又红又专，全面发展

蒋南翔时期清华没有校训，只有“南翔精神”“又红又专，全面发展”八个字可以概括“南翔精神”。但它不如“听话出活双肩挑”“听话出活，驯服工具”明白生动，深入人心。“听话出活，驯服工具”才是当之无愧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已被覆盖，清华园内再也无人提起。

蒋南翔是1932级清华校友。这位青年团中央副书记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前不久，清华大学遭到了建校以来最蛮横的肢解，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航空系、采矿系……均被切离清华，一个综合性大学变为剩下8个系、22个专业、15个专修科的多科性工业大学。对于这个对教育事业破坏极大的“院系调整”，现在极少被人提及，更不用说反思教训。父母死了，子孙不忘拜祭。母校惨遭肢解，却从不再提起，只想从心里忘记！“欲灭其国，必亡其史”。我们就是这样的无耻、无颜的人子、学子！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成立时，学生最多的系是政治系。现在津津乐道的国学大师，就活跃在清华学校最后的两三年中。清华理学院的创办人叶企孙和他开创的充满理性光辉的整个时代，离开了他生命中永远的清华园。这个对中国科学贡献巨伟的大师，生前无人看望，死得无声无息。仅仅是因为他无儿无女？仅仅是因为文化革命？不，因为大家都不知道真实的历史，而少数知道的人怯于恐惧而接受“党性”的约束。文理大学可以不设工科，文理学生不须精通工艺、了解生产流程，实验数据可以通过交流获得。工、农、医等应用学科的学生，须臾不能缺少数理逻辑、理性思维、历史启迪、人文关怀。学校被肢解后的清华学子要获取诺贝尔奖的梦幻追求，如同残奥会选手妄想获得奥运会冠军。在“院系调整”中，清华这个美国人用中国人的钱办的中国大学还不是最惨的，那个对中国情真意切的司徒雷登，用心血和意志浇灌出来的燕京大学被锉骨扬灰，美丽的燕园成了她美丽的衣冠冢。从此，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在中国大陆绝迹。清华的断臂残肢，在政府权力魔杖的点化下，奇迹般地长成了矿业学院、航空学院、地质学院、石油学院、林学院……，斯大林不仅送来了建造大学的图

纸，还派来了权威的专家、教授。晚清、北洋、民国时期办学，是鲁迅说的“拿来主义”，富国强兵、为国家培养可用人才是第一位的。“一边倒”向苏联，既受迫于国际冷战大局，也是政治需要，谁人说长道短，必是反苏亲美。蒋南翔有不同意见，那时还人微言轻，并没有置喙的地位；他多年以来耿耿于怀，始终不认同“院系调整”，但从来没有站出来秉公直言，别人劝阻并不是理由，党性原则才是原因。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时，蒋南翔正率领高等教育代表团访问苏联。回来后，他反对校园内搞群众运动肃反，校内主持工作的同志告诉他，这是党中央决定的。党性再一次压倒了理性，蒋南翔不再坚持正确意见。文化革命的第一波灾难中，蒋南翔惨遭抛弃，他的学生、辅导员、干将听党中央的话，纷纷与他割袍断义、划清界限。蒋南翔倒台后，清华的“保蒋派”中除了刘冰等极少数人，什么时候有人站出来为蒋南翔说过公道话？文革的哪一个群众组织不拿批斗蒋南翔来标榜自己革命？蒋校长不是一个坏人，每个学生都受过他语重心长的教诲。他对自己几乎贡献一生的教育事业痛心，而清华文革也让他丧失了自己推行的那一套教育理念的自信。1981年，为了争取区人民代表的民主选举，全国高校学潮汹涌，我当时任兰州大学团委书记协助刘冰校长处理学潮。刘冰几乎每晚都要和蒋南翔部长通电话汇报学潮情况，蒋部长每次都要问一句：你那个团委书记表现怎样？我已经持有了蒋校长给清华毕业生授予的“猎枪”，也从蒋校长的关切中感受到了他对清华文革的反思和担忧：他或许想起了1966年8月的那个夜晚，“马桶将军”当他的面将他继母吊在梁上毒打的惨状，亲眼目睹自己播下的“龙种”，变成了凶神恶煞的魔鬼、性命是从的小爬虫和满世界乱窜的“跳蚤”，悔不当初的心情可想而知。一个高校的团委书记如果变成了耗子屎，足可以坏掉学生思想工作这一锅汤。蒋校长对自己教出来的学生不无忧虑，这绝不能算是成功的教育和教育的成功。

梅贻琦还有一句更精彩的名言：“没有坏学生，只有教坏的学生。”这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何等慈悲、何等浩荡的胸襟胸怀！蒯大富、涛哥、也包括孙怒涛和我，以及我文章中提到的所有同学，都不是坏学生。2005年，在我们入学40周年的校友聚会上，张孝文校长对1964级、1965级的学生讲：“你们虽然没有在清华造就成才，如同面粉没有被蒸成馒头，但你们进校前就已经是好面粉了”。

找寻清华文革罪孽的原因，不能不认真反省清华的教育：不仅仅是教训，而是情真意切的校训。

追究清华文革种种表现的原因，不能不深刻反省清华的教育。反省文革前的清华教育，蒋南翔同样是绕不开的话题。用韦君宜的话讲，蒋南翔到清华当校长是把“一肚子教育理想都带了去的。”蒋南翔的办学理念既有个性，更有党性。“1952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39岁的蒋南翔迈进了他熟悉而又陌生的清华园。”他是带着党化教育的任务到清华当校长来的，从到学校的第一天，在他的讲话中就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日益巩固和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学校中的阵地，这是我们学校胜利完成教育改革的关键。”1980年，死里逃生、重掌大权的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上重复和重申了这段话。蒋南翔在清华校长的岗位上工作了13年。1988年5月3日，蒋南翔因胃癌去世，临终前还对清华大学当时的负责干部说：我认为“又红又专”比“德才兼备”这一提法更确切。

60年代的清华学生早已无从知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耳熟能详的是“南翔精神”“南翔精神”伴随蒋南翔来到清华。1953年初，清华成立政治辅导处，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南翔精神”开始生根；“南翔精神”大成于1958年根据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提出的“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南翔精神”完善于1961年形成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简称《高校六十条》）。这个《高校六十条》是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邓小平总书记直接领导下，教育部副部长蒋南翔系统地总结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经验，用主要精力草拟，并多方面征求意见而形成的。1961年9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高校六十条》，并得到毛泽东的核准。毛泽东说：“总算有了自己的东西”。

半个世纪以来，蒋南翔之后的清华历任领导萧规曹随，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上殊无建树，“南翔精神”继续发扬光大。蒋南翔后来担任了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其实清华大学在“南翔精神”指引下早就办成了党校。有人总结说，什么是邓小平理论，就是纠正毛泽东错误思想的理论。其实说这句话的人高看了邓小平，邓小平只是在毛泽东的专政思想框架内，添加了经济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兴奋剂。对于毛泽东、对于文化革命这两件发生在上个世纪中国的大事，他极不负责任的敷衍塞责，“宜粗不宜细”的回答等于在历史的拷问下交了白卷。清华何尝

不是愧对历史，看看清华的校史展览和反右、文革，许多重大事件被恶意删除，一些良知缺失而又权势在握的人物早已丧失了坦然面对历史的勇气，这样的组织行为只能是更加可耻可悲！

“南翔精神”并不主要是蒋南翔的教育思想，而是毛泽东思想在教育战线上的体现，是毛泽东“自己的东西”。蒋南翔的教育思想只是渗杂进“南翔精神”中的私货，清华文革中被他的包括政治辅导员在内的学生们，一点一点地清理出来、严加批判。蒋南翔只是“南翔精神”最坚定、最忠实的执行者。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乏善可陈，他虽然就学于师范，也算一个有旧文化底蕴的知识分子，却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有着刻骨的仇恨，这也许与他早年在北大图书馆的打工的经历、一段“卑微的伤心史”有关。他指责北大“庙小妖风大，池深王八多”。这是一种恨惧交加的复杂感情。他对清华并无偏见，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修好之前，毕竟有清华体育馆的室内游泳池供他享用。他并不是教育家，却特别中意“伟大的导师”的称颂。他希望全天下的人，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他提出了“三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又红又专”“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国学习解放军”，包括1964年2月13日关于教育革命的春节座谈会，蒋南翔等16人参加了座谈，从传达内容看，也就是些标语、口号：

“教育的方针、路线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还不行。”

“学制可以缩短。”

“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

“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

“现在的考试方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

“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毛泽东所谈的教育是党化教育和远离教育的伪教育。他把宣传和培训也当成了教育。

清华大学不是党校，但却办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以培养“毛主席的好战士”“三大革命运动战士”为目标，这是蒋南翔的功劳。老蒯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没干好”的典型，涛哥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干得好”的典型，他们都是

“毛主席的好战士”“造反有理，痞子掌权”和“又红又专”，既是毛的号召，也是“南翔精神”。早在文革前，清华学生都在争当“听话出活，”的“驯服工具”，这是清华校风中的主流精神。

“党化教育”就是在思想上、组织上对教育进行控制，把教育变成宣传党义的工具，是国民党最早在中国推行“党化教育”的。1924年，国民党仿效苏联，首先在广东推行“以党治国”的政策。为了制止学校向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停止了“晚清新政”开始的教育改革，实行“党化教育”。随着“北伐”的胜利，“党化教育”蔓延到全国，所有学校都开设国民党“党义”课程，教育变成了灌输国民党政治主张的工具。

集“党化教育”大成者是蒋南翔。除了开设马列主义政治基础课，评选“先进集体”活动，蒋南翔特别强调：“学生从到学校第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学校的党团组织和所有的教员都要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蒋南翔创造性地建立了政治辅导员制度，“党化教育”在工作中落到了实处，有了制度上的保证，这是他推行“党化教育”最突出的贡献。

1953年，蒋南翔让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何东昌起草了一份向高等教育部、人事部请示设立政治辅导员的报告。根据“挑选学习成绩优良、觉悟较高的党团员”的标准，从当时在校最高年级（三年级）的学生中，选拔了25名政治辅导员。政治辅导员的学制延长一年，学科则相应减少，每周进行24小时工作。辅导员队伍归团委领导。经过清华文革十年劫难，1977年政治辅导员制度得以恢复，当时学生中党员已占多数，已不宜由团委管理辅导员队伍，清华第一个成立学生工作部，负责全校学生政治思想工作。还逐步增派了一批博士生担任辅导员。

第一批25名辅导员第一次会议是在新林院蒋南翔校长家中召开的；50年代有突出表现的辅导员被选送苏联留学，学习新学科、新专业，返校后就成了新学科、新专业的创办者和学术带头人。这一传统在后来，改变为优秀辅导员不须考试直接就读研究生，“多数辅导员给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据1993年统计，现任12名校级干部，其中10名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系主任、系党委书记及机关正部、处长中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的约占45%。最新的统计是：清华大学1949年后培育出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1人，中共中央委员50人，候补中央

委员 25 人；国务院总理 1 人，副总理 9 人，省部级领导 280 人；全国人大委员长 1 人，副委员长 7 人；全国政协副主席 13 人，政协常委 116 人；最高法院院长 1 人，最高检察长 1 人。清华，只有清华，才有这么多的“听话出活”“双肩挑”的人才。“教授治校”见鬼去吧，清华大学“以吏为师。”

思想“灌输”的效果和成败，不取决于灌输者，而取决于被灌输者是否接受。而接受灌输的前提是受灌输者可以从中获得好处，不难看出政治辅导员必然要先受其害，更不难理解为什么服从、听话的奴仆思想成了他们的思维定式。所以也就更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今的清华牌政治家多如星辰，而兼有人格魅力的清华牌政治家却寥若晨星。

政治辅导员学习的马列主义理论，主要有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毛泽东的“两论”，即《实践论》《矛盾论》，刘少奇的“两论”，即《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团委在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指导下，贯彻《高校六十条》编写的《团支部工作五十条》。其中刘少奇提出的：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等论述影响至深。

1957 年的“反右斗争”，才是政治教育的生动课堂。那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一举击碎了知识分子的脊梁骨，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必须“夹起尾巴”才能“做人”“反右”第一线总指挥邓小平亲自到清华作报告，毛泽东钦点那个说“什么话”的黄万里教授成了“右派”。公开的原因是黄万里反对三门峡工程、写了《花丛小语》，更深刻的原因是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我党必须过河拆桥和民主党派分道扬镳，不整肃多嘴多舌的知识分子，如何统一思想？黄炎培在世的另外两个儿子黄大能、黄必信，两个女儿黄路、黄素回，没听说有什么“右派”劣迹和言论，也一个不漏地被打成“右派”。毛泽东调侃黄炎培说：“你们家也分左、中、右啊”“一门五右派”的黄炎培还敢和毛泽东“窑洞对”，夸夸其谈什么“周期律”吗？蒋南翔和蒯大富一样热衷权力，经常提醒身边的干部“要有政权意识”。钱伟长教授 1942 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后，是解放后首届校务委员会成员，又被派往苏联学习、访问，有新中国学界“三钱”之美誉。钱教授聪敏博学、全知全能、眼生于顶、口若悬河，对蒋校长多有不敬；党委第一书记袁永熙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婿，袁氏夫妇是和平解放北平、有功于国的中共地下党员，因为阶级斗



争中手软，而成了蒋南翔的掣肘。“有政权意识”又不乏阶级斗争警惕性的蒋校长，岂不要打造一个从这里漏气的发动机？和钱教授、袁书记一起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师生有 500 多人，和清华文革中被抓出来的“蒯派”人数相差不多。毛泽东因抓出 300 多万“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超越秦始皇等历代暴君，夺得“坑儒”之冠；蒋南翔因清华反右斗争制造恐怖而赢得威权。

在“反右”之后提出的教育方针，红专目标再无人反对，“党化教育”大行其道。又红又专是党的教育方针的通俗图解，也是“南翔精神”的核心内容。又红又专来源于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第 22 条，讲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早在 1955 年 11 月 7 日在发展刘仙洲副校长入党的支部会上，蒋南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就是后来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的《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1958 年以后，又红又专的指导思想就成了抓教育的一条主线。蒋南翔常对学生讲：“一个人的成就和他对社会的贡献大小，不只取决于他的业务能力，政治往往成为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政治是解决方向问题，方向不对头，就达不到目的。”红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两个拥护，一个服从”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和服从分配。如刘仙洲、张子高、梁思成等著名教授成了“文物”，除了撑门面当摆设，他们在学生中几乎没有学术上的影响；而如张光斗一类投机钻营、腆颜造假、曲学阿世之徒却见风得风、见雨得雨，光荣入党，一直爬到副校长的高位。一大批“蒋南翔式的”“双肩挑”干部，从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从政治辅导员、“助教党”的队伍中成长起来，和找到“归宿”的老知识分子实现了“两种人会师”。一个“永不漏气的发动机”就这样打造成功了。

1958 年，在党委副书记艾知生的领导下，团委着手整顿辅导员队伍，重申辅导员制度的要求，全校辅导员从 150 多人减到 80 多人。1977 年何东昌指示，尽快恢复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至今这个制度已有了近 60 年的社会实践，培养出了大批优秀辅导员，不仅充实了校系领导班子，而且为党中央领导的梯队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涛哥就是最杰出的代表。

当上政治辅导员，在学校里，就意味着成为最优秀的优质生，“革命事业接班人”已经非我莫属。有了这样的耀眼经历，毕业以后都能

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其中最出类拔萃的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辅导员是他们的晋身之阶，所以他们对辅导员制度感激不尽、赞扬有加。有一位辅导员出身已经成为金字塔之顶的高官回清华对学生现身说法：“做辅导员工作可以密切和学生们联系，更重要的是，做辅导员的经历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学会与人与社会打交道，对一生的成长都很有用，不吃亏的。”当我问起我所熟悉的一些辅导员时，他们也是类似的感受。他们多因为有助于本人的成长来肯定辅导员制度的。

在我看来，政治辅导员制度所起的作用主要有这两个方面：

一是利用各种形式、各种机会对同学进行“兴无灭资”教育，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教育、灌输、监督、控制，清除异己思想，排查异己分子。

教育、灌输是软性的一面。所谓灌输，就是洗脑，洗掉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注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过程，其实与传销的洗脑差不多的。辅导员们自己先被洗脑，然后再洗周边同学的脑。不仅要将与正统说教有异的思想清洗掉，那些有点棱角的个性、正常需求的私心，统统都在纠正、克服、抑制之列。青年学生五彩斑斓的内心世界，最后被灌输成单一的红色，再没有其他的色彩。

监督、控制则是比较硬的手段，这针对那些教育、灌输效果不够理想的差质生的。

教育、灌输、监督、控制的具体措施五花八门，无孔不入。其中有一种叫“个别谈心”的，是我最反感也最害怕的。

辅导员和颜悦色地找你促膝谈心，表面上看似亲热、平等，目的就是套你的话，从中找出思想倾向上有问题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会放过。辅导员自己的内心世界对你是禁闭的。偶尔，他也会说一点他的想法。当心，这是一种“钓鱼谈话法”——以自己无关紧要的小事把你思想上偶尔一闪的隐秘想法钓出来。谈完回去以后往往会记在工作笔记本上。一次次的谈话，加上其他各种场合下观察到的表现，成了你完整的思想档案。到了某一天需要“帮助”你的时候，一条条有日期有时间有地点有场景有旁证的记录会翻腾出来。到那时，你自己

都觉得自己差不多是一个屡教不改的反动学生了。

辅导员制度的另一个作用是不断地锻炼、考察、培养辅导员，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级领导岗位，成为维护体制的骨干力量。

政治辅导员才是今后掌权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其他的人，不过是革命事业的打工仔。这些辅导员，名曰又红又专双肩挑，都是根红苗正，阶级立场坚定，政治观点鲜明，对党无限忠诚，在学校期间已经学会掌握了如何控制群众思想、如何制造革命舆论、如何搞无产阶级政治等等掌权的手腕。

我不否认我认识的不少辅导员本人的品质都是不错的，我也不否认他们为同学做过不少的实事。但是，我还是要指出，辅导员队伍只是执政党统治学校、推行教育路线、扼杀独立精神、实施思想禁锢的工具。

在文革初期蒋南翔刚刚倒台的时候，一些激进学生的矛头最先指向的是与他们接触最多矛盾很大的政治辅导员。我看到有的大字报上把辅导员每月18元的生活补贴费叫“养狗费”。这种污蔑人格的说法我过去和现在都是不赞同的。但从中可以看出，即使在那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对辅导员制度已是很反感的。现在看来，如果把执政党比喻成一家“大院”的话，那么，这支辅导员队伍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也就是“看家护院”。

以上引文来自孙怒涛《拷问》中没用上的材料，这是一个清华高年级师兄的真实体会。

学生政治辅导员大多来自“红五类”的农民、工人家庭。尤其那些坚信“王子永远是王子，贫儿永远是贫儿”，既顺从又听话的同学，最适合辅导员工作，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他们纯朴勤奋、感恩心切，对“奴化教育”“痞化教育”殊无反感。植根底层民众的奴隶思想、皇权意识很快上升为对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阶级感情。因为只有那种奴性入骨、惟命是从的人，才是最适合被打造成暴力机器的胚子。

1965年，蒋南翔在毕业生大会上讲：“毛主席1957年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作了分析，我们可以把

思想过硬概括为三个境界或比喻成“上三层楼”来要求：第一层楼是爱国主义……；第二层楼是社会主义……；第三层楼是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后来的系统提法是：

第一个台阶，是做爱国的文明的守纪律的学生。

第二个台阶，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国家分配，自觉自愿为人民服务。

第三个台阶，对学生中一部分先进分子，要帮助他们逐步培养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要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sup>1</sup>

“党化教育”本质上是虚伪的，是反人性、反人道的奴化教育、痞化教育。黄万里是1953年评定的二级教授，出于对官僚体制的抗议和对个人尊严的维护，拒绝写申请当博士生导师。还说：“有资格的人，也就是能带博的人，还要写申请吗？不够资格的才写申请，我够资格为什么写申请？”黄万里成了清华唯一拒绝写申请，而没有当上博导的教授。蒋南翔曾说，“红”就是“两个拥护，一个服从”。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服从分配。曾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黄菊就是一个不服从分配的反面典型。黄菊是清华电机系电机专业63届学生、班团支部书记，毕业前夕表态：服从分配，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听说要分他去大西北，他害怕艰苦，放弃分配，蹿回上海，在上海人造板机械厂参加了工作。他的行为为老师、同学不齿，电机系可能都没给他发毕业证书，他也从来不敢回学校。贺鹏飞勉强考上清华，1970年分配到甘肃武都地区工作，去那里看了一眼，就被那里的艰苦环境吓回来了。贺鹏飞回京途经天水，巧遇和我一个年级、分到武都工作的段姓同学，一番交谈下来，段同学也不服从分配了，他们一起逃回了北京。贺鹏飞已在若干年前死去，死时任海军副司令、中将军衔。

不能老老实实做人做事，只是虚伪地喊“精忠报党”的口号，能不给清华丢人？无数事实证明，如不能从政治上、经济上摆脱对权力的依附，废除任何带奴役的

<sup>1</sup> 以上部分内容主要抄自2005年版的《蒋南翔传》和方惠坚的《清华工作50年》。

契约，就无法指望培育出美德。

清华学生在清华文革中的表现发人深省，孙怒涛还在思考：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任主力军是青年学生，既有大学生也包括中学生。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竟成了只听命于领袖的枪手，充当了无辜的炮灰呢？

党的教育方针是在反右以后的1958年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那时，我已经上了高中，对这一方针出笼前后所受教育的变化有切身的体会。

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的最初几年，要恢复国民经济，要镇压反革命，要抗美援朝，要土地改革，要搞合作化，要对工商业进行改造，等等。及至政权比较稳固以后，就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斗争，标志是五七年的“反右”。以及对教育实行全面控制，标志是提出两个“必须”的教育方针。

回想起来，对我的德育影响最大终生受益的是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党的教育方针。我记得学校里有一个“五爱”教育：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这个时候没有提“爱共产党”，也没有提后来替代“爱护公共财物”的“爱社会主义”。

到了高中，开始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因为教育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当大跃进成为全党的最大的政治任务以后，即便是一所县中，也要垒起小土炉炼铁。

因为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于是，垦荒种地、夏收夏种成了一门分量最重、占时最多的课程。

政治与教育，是有关联的。但是，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是相对独立的。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就把教育置于政治的从属地位。这完全是错误的定位。

更为错误和荒谬的是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就是必须为某一党派的政治利益服务，成为某一党派狭隘私利的工具。

至于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教育的方针，也是极端化的。

无论是叫又红又专，还是叫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有用人才，或者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意思都差不多的。在清华，这一培养目标有一个通俗形象、简洁明了的叫法：听话出活。

所谓听话，当然是忠心耿耿地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做一颗党把你放在哪里就在哪里死心塌地地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就是“红”，就是“德”，是政治标准。

听党的话，落实到具体，不仅要听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体现出来的党中央的话、领袖的话，还要听从基层党组织的话，听从支部书记、支部委员的话，甚至是听从一个普通党员的话。总之，就是听领导的话，听上头的話。脑袋是用来吸收、消化党的指示的，不是用来独立思考的。谁要是有点自己的思想，有点个性，那就意味着与党离心离德，与党不是一条心，那就被视为开始走上错误的、甚至是犯罪的道路了。

所谓出活，就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以精湛的技术做好本职工作，做一个能为党高效率服务的工具。这是业务标准。

在听话与出活上，听话永远的第一位最重要的。

要培养听话的人，首先必须进行无休止的思想改造，也就是“兴无灭资”：灌输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思想、马列主义思想等正统思想，其他的思想统统都是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封资修的，都必须彻底清除干净。

于是，从高中到大学，被灌输进脑子的是这些东西：共产党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毛泽东是永远英明的、不会犯错误也没有丝毫缺点的，抗战八年打日本鬼子是全靠八路军新四军的……

红专大辩论、参观反右展览、联系实际的“九评”学习、学习“毛选”、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雷锋、参加“四清”、政治课教育、党课，还有各种各样形式多样的活动、会议、参观、座谈等等，都是我们上过的阶级斗争主课，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听话的人。

我并不一概否定这些活动，也不是说这些活动的效果一无是处。作为原本纯洁的学生，我们是从正面去接受这些教育的。譬如“学雷锋”，我们从中学做好事，付出爱心，这是对的。但在这些活动中，各级组织的着力点是增强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也是在强力灌输阶级斗争观念和奴隶意识。

不同时期的青年学生，都有共同的特点，如有爱国心，有民族自尊心，有政治热情，追求进步、真理、正义，向往光明美好的社会，单纯，幼稚，勇敢，易被鼓动，易受蒙骗，等等。文革前的青年学生，经过十多年的党化教育与奴化教育，更增加一些新的特征：对领袖无限忠诚，对毛泽东思想深信不疑，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特紧，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无比痛恨，敢为共产主义理想赴汤蹈火，等等。这样的一群青年学生，个个都愿意成为红卫兵、党卫军。文革之所以能得以发动，原因之一是学校已经为文革准备好了成百万的冲锋队员、枪手和炮灰。

孙怒涛的思考痛心疾首。“党化教育”在文化革命初期就发生了极大的混乱，以小骂大帮忙见长的党内大笔杆子邓拓，竟被自己献身的组织构陷委屈上吊而死；明史专家吴晗校友“曲学阿世”，视学术精神如玩物，把一个朱元璋写得颠来倒去，为迎合圣意宣传“海瑞精神”，反被诬为“反党分子”彭德怀一党，夫妻双双受尽羞辱迫害致死；蒋南翔在高教部被揪了出来，清华骤发雪崩，从党委到基层支部的负责人，乃至个别政治辅导员都成了被批斗的对象。党性发生“变性”，再无其他纲常伦理来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精神大厦。清华大学被损毁的不仅仅是“二校门”，蒋南翔鼓吹的“三层楼”也轰然坍塌了。

### 三、陈寅恪的校训：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1927年6月2日，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殉文化”而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鲁迅说：这位“老实得像火腿一般”的国学大师，在取得巨大学术成就两年后，“便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了。现在清华一教西北小山坡前的王国维纪念碑上，镌刻着陈寅恪窥破天机的不朽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万千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纯为知识、学术，勤奋读书、游学，是“中国最博学的人”，中国史学界“三百年来仅此一人”。他以洞悉幽冥的历史眼光，看到了“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代表的物质层面的文化自救彻底破产，“戊戌变法”是中国人第一次企图从政治制度上文化自救而以失败告终的行动。慈禧没得选择的选择了“晚清新政”，刚刚起步的“立宪运动”被“辛亥革命”一枪毙命。宫帷深锁的帝后奢靡生活让站起来了、富起来了的中国人梦萦魂牵、艳羡难已。爱国压倒启蒙，爱国主义成了蒋校长政治思想教育的第一个台阶。民主、科学只是时髦的口号，“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了最有广告效应的“烂尾楼”，值得我们年年凭吊。最迟钝的知识分子都看到了赤县神州遭逢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中国社会的上一次“奇变”，始于“商鞅变法”，大成于西汉“独尊儒术”。那是一次成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演进。“天人合一”的封建文明支撑起了一个泱泱大国三千年的农耕社会。元、清、俄、日……的异族入侵和蚕食，一次次地阻断了中国的社会变革与和平崛起。任何一个文明古国失去了今天，也就没有了过去，不管过去何等强大、如何辉煌。一次次的救亡和内斗阻碍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久历劫难还不是最可怕的，“劫尽变穷”让中国人无路可走才是最可怕的！陈寅恪如同窃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以大勇气、大智慧、大情怀、大心愿昭示读书治学的知识分子要铭记“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一“历万千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训导，要像张骞一样去“凿空”，去劈开中国变革图强、建设



崭新文明的大道。

陈寅恪的校训比梁启超的校训晚十余年，同样没有被贯彻在清华的办学宗旨和教育理念之中。由于对今天教育乱象的反思，有的人高估了民国“黄金十年”教育发展的成绩，轻浮地说什么“中国高等教育30年里走过了西方办大学1000年的路程”。不知道丑陋的中国文人什么时候能改掉总是夜郎自大、蛙鼓蝉鸣的坏毛病。1949年以前，中国大学毕业生总数只有10万人，只是今天一年大学毕业生的六十几分之一。仅此一点可知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并没有多少骄人的成绩，《围城》中的假文凭和野鸡大学生，生活中照样有。问题是我们对待知识分子的极“左”政策有问题，不信任知识分子，不尊重他们的劳动。用杜牧的章句形容：“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按照黄延复老先生关于大师的标准：“大师者，至少应具备以下五种品格：高尚的人格、博通的学术、深邃的思想、卓绝的识见，儒雅的文采”。我斗胆以为除了陈寅恪、黄万里、叶企孙等寥寥数人，还有几个清华教授配称为大师？许多有名望的学者都是在外国高校完成学业、做出成绩的。不能把栽培他们的功劳全都归于中国教育事业。当然也不应抹煞许多教育工作者在战乱频仍、非常艰苦的环境中的卓越工作。在清华，梅贻琦校长就是楷模。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他和潘光旦合作撰写的《大学一解》中。他主张大学之道：明德修己、新民、止于至善。大学的直接目的：发展学术、作育人才。他要求学生具有“超阶级”“超党派”的“宏观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精神。不应该给学生以某种政治派别的思想，只应该给学生判断的能力，让学生靠这种能力去决定自己的政治方向。他要求学生与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宽广的综合的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否则他就只能做一个“高等匠人”，而不能做一个“完全人格”的人，变成一个极能干的工人，而不配称大学生——大学生应该有极完美的常识。他还主张“才不通而身不得出”，即没有通识准备的人，不允许其参加社会事业，社会事业才可能良性发展。为了感受一代教育大家的流韵风采，我不去说他那些枯燥乏味的“通才论”、大师大楼论”“坏学生论”，下面有三个故事感人至深。

梅贻琦说：“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12.9”学生运动后，军警将到清华抓捕宣传

抗日的进步学生。梅贻琦校长将军警的抓捕名单张贴在布告栏中予以公告，在教师、工友的掩护下，蒋南翔等被通缉的学生全部安然逃脱。

“大德不官，大道不器。”梅贻琦民主治校，在于对校长一职有清醒而正确的认识。他曾说，校长就是在戏剧中饰演皇帝角色的人，他端坐戏台中央高高在上，但他不是剧中主角，除了一两句自我介绍的道白，甚至连一段像样的唱腔都没有。我曾设想有一天，重临西南联大旧址，在校园草坪席地而坐，手捧台湾作家鹿桥的《未央歌》，追怀那个国难岁月的大师风采。抗战中，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大，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的资历、人望都在“寡言君子”梅贻琦之上，但他们都信服地支持梅贻琦主政校务、共度时艰。梅贻琦一生从未遭逢异词谤语。我私心暗忖：蒋南翔校长也能做得到吗？

真学者视学术为生命。梁思成回国的目的很纯粹：共产党来了也会有人盖房子。说到梁思成自然难忘风华绝代的林徽因，林才女患肺病喜静，据传梅校长曾命人在新林院梁宅前竖一警示牌：“林徽因住此，请勿喧哗。”梅校长做事如此风雅，实不让六朝故事，令人追忆神往。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没有被人从校训中“腰斩”掉，因为它从来没有成为清华校训。民国政府致力推行的同样是“党化教育”，蒋总统梦寐以求的也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任何反民主、反人权的独裁政权，注定与现代文明绝缘。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已被封建统治阶级利用了3000年了，果真“天不变，道亦不变”？身为“南书房行走”的五品“帝师”、被传统文化彻底“化”了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他投湖而死去“殉”哪门子能够永世长存的文化？我曾偏激地说过，只讲天道、地道而不讲人道的知识分子是伪君子。且不说格、致、正、诚、修、齐、治、平“八级台阶”的人生追求中有多少权谋欺诈，只是向“天地君亲师之位”的牌位磕头的拜师礼，就能说明这是培育奴才的第一课。启发兴趣，提倡思辨，鼓励怀疑精神，推崇超越前辈先贤，让学生认识自己、做好自己，才是教育的真谛。有如亚里士多德超越老师柏拉图。孔门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哪个学生超越了孔子？两千多年下来，汲鹏说是“老鼠下崽，一窝不如一窝。”现在清华检讨自己：“自强不息有余，厚德载物不足。”纯属脸皮太厚的文过饰非。

徐葆耕学长和我有数面之缘。他俨然已是清华“国学专家”，我有点难以置信。他为了称颂今日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风貌，提出了一个荒谬的“灾难铸就辉煌”理论。这个理论有点奇怪，它不追寻灾难的原因，总结灾难的教训，也不去寻找规避灾难的办法，只是出人意外地歌颂灾后的辉煌。

这个理论颇受主流青睐，并广为流行，地震、矿难、高铁出轨后，这个论调都能在主流媒体上“辉煌”好一阵子。徐葆耕有两个例证：一是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中，在敌机不断轰炸的艰难条件下弦歌不辍，无论是教学、学术都创造了史诗般的辉煌。”二是清华“文革动乱后，在‘连洋人屁股都看不见了’的情况下，瞄准世界先进水平急起直追，不仅迅速地恢复了十年动乱造成的创伤，而且创造了新的辉煌。”<sup>1</sup>

“灾难铸就辉煌”，通俗说法是：“灾难就是辉煌”，这是毛泽东的“破就是立”的破坏哲学的另一种表述。常识告诉我们，创造和建设才能铸就辉煌。当年西南联大师生生活异常艰苦，闻一多教授要业余篆刻图章换米求生，如果生活无忧，他们的学术成就是否会更为斐然？乱离人可怜！文史学生尚可苟且延读学业，科研、实验应当难以为继。那时的清华学人之所以还能有所成就，只能说明专制的学术钳制比战乱还要不出学术成果、还要让人才思枯竭。葆耕学长是否也要像毛泽东对田中角荣谈话那样，像无耻地感谢日本人的侵略那样去感激灾难呢？

至于说到文革后清华的堕落，罄竹难书四个字有点过分，痛心疾首是国人的真实感受。葆耕学长也看到了，“对于一个班、一个班的（清华学生）留学美国”，清华已被讥讽为“真正的留美预备学校”。事实上现在的清华留学生和前辈大不一样了，老清华留学生大都回国报效国家，今日留学生大多定居国外，如若回来也多半是加入了“八国联军”（坊间称世界百强企业为“八国联军”，称民营企业为“义和团”）杀到中国，回国为了赚钱。人各有志，其中原因总有不同，自然不必一切为外人道。我要强调的是：清华在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上做得不好，不好到已经留不住人才了；国内工作、生活条件让精英们有了出去不回的理由。清华学生比较许多其他院校的大学生，也许是更听话、更出活的“驯服工具”，但不争的事实是：清华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更大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并不令人

<sup>1</sup> 徐葆耕：《大学精神与清华精神》，载刘琅、桂苓编著《大学的精神》页192，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

满意。还记得张孝文校长的“面粉”比喻吗？考进清华的都是优质生，如同精白面粉，我也不相信清华能把好面粉做成了棒子面窝窝头。

在给孙怒涛的信中，我曾错误地认为自由、独立是资本主义口号，是1980年代香港高楼上悬挂的商业广告：美国精神。前两天去珠海，张鸿庆再次点化我：陈寅恪的校训是他纵观古今、学贯中西，开悟得出的时代精义。新芽萌生于老树的残躯、种子，任何新思想、新事物都切不断与陈旧、腐朽、死亡的联系。在生命将死将生之际，有能量的消散和凝聚。宇宙的历史是一部能量不断改变存在形式的变化史。吸收物质，积聚能量，构建文化，锤炼思想，微小的人类就拥有了生生不息的力量。这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如果对陈寅恪那一代知识精英采取舍弃和健忘的态度，就是对中国历史的无情，也是今天中国人的不幸！

任何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人民当家作主了，“用全人类所有的先进文化科学知识武装自己头脑”、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而达成“一切人的解放”的共产党人，是不是和全国人民一道都应具有“公民意识”？大学是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思想文化更新的中心，是容不得盗袭兵焚的斯文神圣之地。它虽然诞生于西方教会的怀抱，但神圣的大学也禁止在校园里、课堂上宣传教义、党义。大师是人类精英中的精英，他们站在知识的最前沿，站在已知和未知、光明和黑暗、天堂和地狱的分界上，揭示真理、预警灾难、昭示未来。他们因自己的学术成果得到人们的景仰和爱戴，他们不应该因学术思想有悖于统治思想和社会生活的“主旋律”而被整治得死去活来、挨批受“坑”。

1968年7月27日后的清华文革还有整整8年的干烧高压锅里的“热寂”岁月。本应普照天下的“红太阳”盯上了“六厂二校”，红太阳聚焦，“熵增原理”在清华出现了反常。通过8341部队的宣传科长迟群、机要秘书谢静宜，毛泽东从思想上、组织上全面控制了清华。清华文革如朕亲临，继续革命的战略战术、阶级斗争的政策策略全凭圣心独运。先是制造恐怖、获取威权，具体做法是：“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抓516分子”、办江西鲤鱼洲“牛棚”；然后是招兵买马、组织队伍、训练打手，一是从64级、65级的学生中，挑出700多名根正苗红、听话出活的学生留校充实教师队伍，视为“新工人”；二是招收各级革命委员会推荐上来的“工农兵大学生”。红卫兵、工农兵，“两兵”大学生占领上层建筑，名为领导“斗、批、改”，实为充当打手、炮灰。最后由“梁效”写作班

子吹响战斗号角，从清华、北大向全国掀起“反右倾回潮”“批陈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一波紧接着一波的巨劫连绵，无休无止地冲击着赤县神州。这不仅是“党化教育”，更是党的“全面专政”。毛泽东劫尽将亡，他也曾惊惧于陨星天象，伤感于枯树文章。哪一个知识分子不被他折腾得思想麻木、精神癫狂。若干年后，巨恶元凶阴魂不散，涛哥出来宣布：“不折腾了”。大家觉得反正“劫尽变穷”，跟着涛哥得过且过罢了。于是清华百年校庆齐颂盛世、大唱赞歌：“精忠报党”！

迟群是个痞气十足的烂仔，小谢只是后宫嫔妃、答应中比较能认字的人，他们来自掌权痞子的身边，有如来自奈河桥那边的牛头马面。其实权力有自我扩张的天然秉性，和个人的道德品质无关。让全校师生员工时时刻刻生活在恐惧之中，是原始的丛林法则，却非常有效，这就是秀才遇到根本不和你讲理的兵的心理劣势。

那八年中，清华成了兵痞横行之地，被逼死的人、被批斗的人、被冤屈诬陷的人、被体罚被侮辱的人比哪个时期都多。毛泽东认为清华文革偏离了斗争大方向，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结合“清队”“抓516”“整党”甄别干部，重建各级组织。批斗、恐吓、引诱、揭发是一贯手法，利用捕风捉影、知情人急于洗刷自己去立功举报，只要还有自尊自重，不会佯狂自污、唾面自干、宁弯不折的人，多半不会平安过关。工化系副系主任李文才文革时作为交流学者在英国学习，武斗结束前才回到清华，工宣队认为他和清华运动、清华派系没有关系，打算第二天把他“三结合”进入系领导班子。但考虑到他在北京x中学读书时集体加入过“三青团”，就找他谈话，要求他第二天写出交待材料。当天晚上，李文才因惊恐而自杀身亡。在批斗工化系党总支书记滕藤的会上，党总支副书记黄志冲被罚站在滕藤身边陪斗。由于黄志冲是清华教工子弟，说话多、欠严谨，又分管学生工作，接触人更多，留下的把柄也多，可供揭批的言行比滕藤还多，教工的发言多冲着黄志冲去了。据滕藤后来对我说，黄志冲一定认为他是工宣队在工化系的主攻目标。批斗会后黄志冲越想越怕，上吊死了。

江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是一个废弃了的劳改犯农场，占地9300亩。首批398名教职工于1969年5月到达，先后有3000多位教职工及家属在这个血吸虫病区斗私批修、改造思想。1970年查出血吸虫病患者747人，疑是血吸虫病患

者 111 人。我的三哥、工化系教师唐晋也在那里染上了血吸虫病。1971 年 10 月全部人员撤出鲤鱼洲，迁至北京大兴团河农场。奥斯维辛集中营杀人用毒气，迟群、小谢用生物武器，不仅环保，也利于隐匿真凶。你若拷问血吸虫，它绝对不会招供主谋就是那个 1950 年代诗中讲血吸虫已被“照天烧”了的毛泽东。

迟群、小谢用“冷暴力”构筑的专政机器，在教育、培训（包括军训、下工厂农村劳动）、宣传之间划出了两个等号，即：教育=培训=宣传。他们名为关心青年学生，实则利用、出卖青年学生。清华的教改经验是中南海痞子总店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直销过来的毛泽东教育思想，是教育领域里的样板，简称“六厂二校经验”。

毛泽东亲自抓的清华教改，是远离教育的伪教育。他讲，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讲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他需要的只是奴隶中的工匠。谁都可以看出清华“斗批改”的教育革命有多荒唐。但它远离教育宗旨，偷换教育内涵，以教之名义，行害之实质却并没有被注意，更没有被清算。在教育产业化的荒唐指挥下延续至今，怪不得资中筠痛斥清华聚毁人才。熊庆来说：“夫大学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生命与精神。”陈寅恪的校训：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倡导的就是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和人格独立、思想自由。这是知识分子做事做人的两大原则，也就是熊庆来讲的“学术生命和精神”。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教育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改革无定式，无法预设蓝图；改革是“立字当头，破在其中”；改革并不痛快，大多相当痛苦；改革就是做学问，须钻研更须积累，“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投机取巧，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只能像“大跃进”那样害死许多人。

提倡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就是承认学术文化不仅是事业，而且是超越国家、政党、阶级利益之上的事业。陈寅恪说：“国亡然能有史，殷鉴不远，从善去恶，国可再建；如无史，何所鉴戒，何所取法，华夏民族无从因袭，将不复存在矣。”

“国家危难，史学衰落，此已关系到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生死继绝的大节”。只有这种气吞山河，包容万物的“雅量”，才能保持华夏民族文化火种长燃不熄。

“人格独立，思想自由”是育人育己的方向和目标。也就是马克思主张的“人的解放”，从自在走向自为。梅贻琦说：教育本身必须以每个人为对象，从每个人的自身着手，其目的就是首先要促使他们的完整人格的养成。

陈寅恪于1953年12月1日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写到：

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当然，毛公、刘公岂能“应从”陈寅恪的“狂悖”之言，没有治他的罪也只是因为他名气太大，1953年的文网也还没有收到后来那么紧。但陈寅恪坚守大节的心志、胆色却令人动容。

黄万里是一个有着赤子情怀、敢于担当的清华教授。我的长兄杨美卿曾是黄先生的学生，后来又同在水利系泥沙教研室工作。黄先生“怀璧沉沙”的坎坷人生和难得的人品、才情、学问已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他对三门峡工程的论断的正确，已被时间和实践证实。我在读黄万里时注意到以下几件事：

密云水库建成几十年来一直是北京的主要水源，也是清华教育革命拿得出手的主要成果之一。黄先生计算了水库上游河段历年的流量，曾向钱正英部长建议降低大坝的高度，在“经济困难时期”节省投资自有利国利民的特殊意义，但是他的建议无人理睬。一个戴着“右派”帽子的落难教授，如果没有学理精通的大胆识、没有对专业的执着、没有对国家强盛的一往情深，他怎么还要去面对钱部长等人丑陋的冷脸，而自讨没趣呢？

反对修建三峡大坝工程，是黄先生临终都耿耿于怀的不解心结。他早年考察

过几乎所有的川江水系，如同预言黄河的泥沙作祟，他预告长江的砾石将堆积三峡水库的库尾，成为解不开的死结，形成极大的祸害。“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我，乃至我的长兄杨美卿教授都没有能力判定黄先生的意见是否正确。但是论证三峡工程不让有资格和能力的黄先生参加，听不得任何反对意见，能叫重大决策前的科学论证吗？黄先生还提出缓冲意见：用建三峡大坝不到一半的钱，在川江上游建10个水电站，发电能力即可与三峡电站相当。黄先生于1992年写《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1995年写《吁请长江三峡大坝即日停工！此坝决不可修！》，从1992年1月到1994年，黄先生连续致信江泽民总书记、中纪委、监察部，有的信甚至用了举报的方式。对于一个知名教授几近疯狂的抗争，有关部门和有关大员一直装聋作哑，显足体制没有人性的冷漠。2001年8月27日黄先生溘然长逝。弥留之际他挂记的还是长江、三峡。临死还问女儿：“黄委会你知道吗？”

对于关系重大的“南水北调”工程，黄先生也有宝贵的建言，惜乎同样没人理睬。“黄钟毁弃，瓦釜长鸣”，这个典故用来说谁呢？

专家总是片面的，不片面不能成其为专家。黄万里先生不是那种专家级的匠人，他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他家学渊源、文词高雅；数学、力学功底扎实。1930年代初的黄河、长江水灾，促成了他改行水利，一生求学只是为救国救民。他以学习为最高最大的善行，不断更新自己的已有知识。他发现熵值和焓的单向变化将控制水流、泥沙的运动，他不断用新知识、新理论增进对江河水系的认识。“热力学第二定律”“混沌理论”都是他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他是毕生都在潜心学习，学问不断精进的大师。

黄先生一生坎坷，活得艰难，生于忧患，死也遗憾。实践证明，黄先生没有错，是拥有权力的政府和上级组织错了；黄先生并非不幸，他有值得为之奋斗的学术和真理，不幸的是国家和人民！先生仙去，我们怎么能不痛惜大师！

我相信教育可以兴国。由于深圳大学罗征启校长（当时张维任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任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的召唤，我放弃了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刘冰校长给我安排的省委办公厅的副职，于1984年1月来到深圳大学创业，希望能跟随清华师长在特事特办的深圳特区，办成一所争创一流的高等学院。罗征启在深圳大学改革最精彩的一项是党的工作业余化、党的干部兼职化。我在深大任党委



办公室负责人。党办有4名工作人员，后来增加了1名发余热的老干部——人民大学前任组织部长徐景秋做顾问。党办是全校唯一的党的专职组织机构，囊括了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工、青、妇的所有工作；党委书记和各系的支部书记（当时系上还没成立总支）一律兼职。三、四年下来，学校各项工作照样生机勃勃，党员教师投身于教书育人的一线工作，没有任何特权，也没有什么党群矛盾，一点也没有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由于实行学分制，逐步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政治时事课、公民素质课和学生勤工俭学供学生选修。事实证明“去党化教育”也是可行的。

深圳大学的教育改革还是失败了。1989年的“6.4”，导致罗征启下台并被开除党籍。其实，深圳大学教育改革在这一事件的两年前就败象显露、祸根深种。深圳大学一直未能进行民主办学的制度化建设，没有建立对校、系主要领导的权力约束机制。民主只是形式，集权才是目的。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派来的副校长和清华派来的罗校长矛盾重重，教师队伍缺少为改革出力的新血，包括清华在内的教师纷纷调离，蝇营狗苟之徒遂集权力中心，深大改革焉有不败之理。何东昌部长曾说过一句极不负责任的难听话：“罗征启，他懂教育？”我以为去掉这句话的恶意后，还是值得深思的。

“6.4”是罗征启下台的直接的导火线。总结清华文革教训，应该知道学生参加群体事件绝非好事，不管社会哪种势力竭力鼓噪，为学生前途着想，校长、教师抵死也要把学生阻拦在校园之内，绝不让他们跟着“蒯大富们”去搞什么“12.25”行动。我们过去的革命传统教育中充满误导，我就十分着迷过电影《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她站在行进的有轨电车上抛撒传单镜头，简直就是油画中的自由女神在引领大众奔向光明自由。看看真实的历史吧：学生运动只是“五.四”运动的表面浪潮，深层涌动的是纷繁复杂的直系、皖系军阀之争，亲日派、亲英美派的政客之争。“五.四运动”后，北大校长蔡元培引咎辞职，内疚自己未能保护好学生。

罗征启校长作为一名党员，他犯的是组织错误，不是政治错误。周泉纓说：“罗征启得罪了中国两个最不应该得罪的人，在清华他得罪了陈云，在深大他得罪了邓小平”。每当念及罗征启对清华学生、深大学生的关爱之情；每当想起早上上班的路上，见到他和梁鸿文老师走走停停、指指点点，精心设计深大的规划

布局，安排在哪里添修一条路，在哪里多种一片草。我的心中对他和梁老师就有一种浓浓的敬意。在深大工作时，我多次冒犯过他，说“罗校长在深大的改革事业将随他下台而一风吹掉，而他盖的房子将会成为他永远的纪念碑”。对他在深大禁止抽烟，我说过：“林则徐虎门禁烟，被发配伊犁；罗征启粤海门禁烟，将来不知会被发配到哪里？”唉！至今想来我都后悔死了，这张讨厌的乌鸦嘴！

上大学，独立思考能力最重要。真正在人类社会起作用的制度，都不是精心设计而是有机演化、逐步尝试出来的。从教育着手应当是中国改革的切入点。民主政治不仅仅是一套政府制度，民主还应该是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高等学校应该是教育养成这种良好生活习惯、并有益于终生的圣地。

在自由匮乏的社会里，只有思考的碎片，不可能产生完整的思想。香港回归前，撒切尔夫人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但是无论如何，思想总是自由的。中国知识分子将如何面对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总理的挑衅性预言呢？

这篇“读后”或许会让所有读它的人面临一场精神折磨。语云：“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我把它送给孙怒涛学长和我那些传奇般的清华同学，我感谢他们在恩怨情仇的真实世界里一生与我同行。📖

2012/7/15

## 【思想文化】

# 国家的职位与任期<sup>1</sup>

严家祺

### 内容提要：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许许多多国家。公元前7世纪称霸中东的亚述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罗马共和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这些国家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由

<sup>1</sup> 本文选自严家祺的新著《国家政治体制》。

于它们疆域辽阔、国势显赫，现代世界的人们还保留着对这些大国的印象。而对于诸如赫梯帝国、腓尼基共和国、伦巴德王国、莱昂王国、安提俄克公国，生活在这些国家所在地域以外的现代人，也许十分生疏。

无论是我们熟悉的国家还是生疏的国家在它们存在的时期内，统治者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和管理国家，无一不设置名目繁多的职位。罗马共和国时期有执政官、行政长官、保民官、监察官、独裁官等等职位，古代中国有尚书仆射、中常侍、谏议大夫、大仆寺卿、钦天监等等职位。

在现代世界各国，职位的名称虽然渐趋一致化，但仍是形形色色，有国王、总统、天皇、最高元首、国家主席、国务委员会主席、埃米尔、议长、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的委员长、首相、总理、部长会议主席、总人民委员会主席、大臣、部长、司长、局长、署长、办公厅主任、最高司令官等等。上述这些职位，仅是人类社会各种职位的一部分，即国家机关的职位，在这些职位以外，政党、团体、企业、事业以至各种黑社会组织也存在着种种职位。

在本书中，不谈企业、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的职位问题，只谈国家职位问题。国家职位可以按不同分类标准进行分类，如划分为政务官和文官。本书不研究一个国家内部如何对国家职位进行分类，而是研究古今中外世界各国国家元首按权力和任期的分类。权力和任期是国家职位的两大要素，这里从权力谈起。

## 权力与权利

权力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中，单独的个人有意志，能够自主的行为，这并不是权力。两个人或多个人在一起，就可能存在权力关系。由人组成的群体（团体、组织、国家、超国家机构，也有自主行为能力，这些群体之间也存在权力。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权力是一个人使另一个人按其吩咐行为的能力。也可以说，权力是一个人引起他人或团体采取与原来不同的行为的力量。在中国，人们往往把权力（Power）与权利（Right）都简称为“权”。实际上，权力与权利互相联系，但有明显不同。

美国法学家韦斯利·霍菲尔德（Wesley Newcomb Hohfeld, 1879-1918年）的“权利”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权利”（right）就是“要求权”

(claim rights)。广义的“权利”包括四种“权利”：①要求权(claim rights)；②特权(privilege)或自由(liberty)；③权力权(power rights)；④豁免权(immunity rights)<sup>1</sup>。霍菲尔的“权力”概念是指“人们通过一定行为或不行为而改变某种法律关系的能力”“权力权”关系到他人的行为，它指的是我有权主张他人应这样做或不这样做的“权利”。霍菲尔关于“权力”与“权利”概念，是从“权力”与“权利”如何改变法律关系来分析的。本书不使用霍菲尔的“权力权”(power rights)概念，而把权力、权利两个概念作明确区分，并把“绝对权力”定义为“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从不同于霍菲尔的另一途径研究分析权力与权利问题。

人生活在社会中，一个人因另一个人的存在，或感受到社会中的力量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有三大原因，一是担心或害怕受到惩罚；二是希望得到利益或好处；三是因信仰、信念、信义、信任或受社会影响而改变自己的看法和行为。与这三种因素相联系的权力，分别称为强制性权力、奖酬性权力、信服性权力，或简称为强制权、奖酬权、信服权。<sup>2</sup>组织、团体、机构、系统可以不同方式或不同程度把三种权力加以组合，形成各种权力关系。在所有组织、团体、机构、系统中，由于国家垄断了依法使用暴力进行惩罚的权力，形成了强制权，而且国家还用奖酬权、信服权使国家权力为人们自愿接受。在有国教和有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家，信服权对巩固统治有着重要作用。

强制权是一个人的决定，要求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服从并执行，如果不服从和执行，就要受到惩罚。职位可以产生权力，当一个人自愿服从上级或领导人的决定时，这种自愿的背后，有强制权、奖酬权、信服权在起作用。一个人对神权的服从，也是自愿的服从，但这种服从仍然包含着服从者相信，如果不服从会造成自己在未来或来世受到惩罚的后果。<sup>3</sup>

权利(Right)不同于权力(Power)，权利的行使可以不依赖他人，如言论

<sup>1</sup> 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第118页，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1995。

<sup>2</sup> 美国政治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把权力分为Condign power、Compensatory power、Conditioned power三种，中文译为应得权力、补偿权力、调控权力。参见加尔布雷斯：《权力的剖析》，刘北成译，时报文化出版，台北，1992年。

<sup>3</sup> 权力在动物世界中也存在。黑猩猩社会中存在权力，在白蚁、鼯鼠、蚂蚁、蜜蜂社会，也存在权力。本书主要谈人类社会中的国家权力。美国政治学家拉斯威爾(H. Lasswell)在1950年代提出，权力是研究“誰、贏得何物、何時、如何贏得？”(Who get what, when and how?)，这并不是权力的定义。行使权力有一个主体，这个主体要有自己决定、自己行为的能力。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时代，权力概念将会有新的扩展。

自由的权利、休闲的权利；权利是一种自由选择，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所以，权利与自由密切相关。<sup>1</sup> 在有些情况下，权利的行使依赖于他人，如本人的财物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行使索取他人欠债的权利、免于武断监禁的自由。权利往往会受到他人的侵犯，所以，权利需要保障。<sup>2</sup> 权利可以靠权力相互制衡和国家权力来保障。在本书中是指受到“法律保障的权利”，而法律保障，就要依靠国家权力的行使。国家权力的范围是有限制的，基本人权，就是国家权力不能进入的领域。国家职位的设置都与行使权力、保障权利有密切关系。

### 国家权力的划分和分权学说

在政治思想史上，国家权力的划分和分权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的柏拉图(Platon, 公元前427-347年)、亚里士多德(Aristotélēs, 公元前384-322年)和西塞罗(Cicero, 公元前106-43年)。在漫长的中世纪，分权学说无人问津、销声匿迹。近代以来，17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年)系统地提出了国家权力的分权理论，他把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对外权。约翰·洛克说，立法权是短时间存在的权力，执行权是经常存在的权力，对外权是决定战争与和平、联合与联盟以及处理各种对外事务的权力。

洛克认为，立法权与执行权必须有不同机关的人来掌握。如果这两种权力有同一机关或同一些人掌握，就必然给这些人造成方便条件，使他们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sup>3</sup> 洛克认为，对外权与执行权本身是有区别的，但很难由不同的人来执掌。

在约翰·洛克以后，18世纪法国的思想家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提出了“三权分立”理论。他从反对专制主义、要求公民政治自由出发，提出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部分，并认为这三种权力必须由三个不同机关掌握。这三种权力，既然是独立的，又是互相牵制、互相制衡的。孟德斯鸠指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

<sup>1</sup> 霍菲尔德把这种情况下的权利，称为特权(privilege)。霍菲尔德指有特权的人可以有这样行为或不行为而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liberty)，特权(即没有义务)仅关系到本人的行为。

<sup>2</sup> 霍菲尔德把这种权利称为“狭义的权利”，由于霍菲尔德是从法律关系分析权利问题的，他对“狭义的权利”的定义是，指有权利的人可以迫使他人这样行为或不行为。

<sup>3</sup> 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第89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年版。

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会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与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都完了。”<sup>1</sup>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影响很大，为其后许多国家建立宪政体制所采用。从孟德斯鸠的理论来看，约翰·洛克所说的对外权，既包括立法权，也包括行政权，如制订与批准本国政府与外国政府签订的条约，是一种立法权。

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实际上有相互交叉的部分。司法权包括审判权、检察权，是判断一项行为是否违反法律的权力。行政司法权，是一种司法权，是指行政主体作为某项纠纷的第三人，对当事人双方的纠纷进行调解、仲裁、裁决和复议的权力。

立法权、司法权、行政司法权都是规范性权力，司法行政，不是司法权，而是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是围绕司法活动而展开的各种保障和服务的统称。不从分权的角度，而从权力对个人的直接、间接影响来说，国家权力主要有两大部分构成，一是规范性权力，立法权和司法权都属于规范性权力，司法权是保障法律规范有效性的权力；二就是执行性权力，行政权与执行权是同一种权力。从权力分类的角度看，行政权是一种强制性权力，不服从行政决定、指令或命令将会受到惩罚，同时，法律用国家的权威给公民造成一种信念，使公民自愿地按照法律规定行为，这使遵守法律包含了信任性权力的成分。不同的行政权以不同方式组合了强制性权力、奖励性权力和信服性权力。司法权主要是强制性权力。

约翰·洛克关于“立法权是短时间存在的权力，执行权是经常存在的权力”的思想，有重要意义。对一个个人来说，司法权并不是“经常存在的权力”。行政管理权、军队指挥权、警察治安权，都属于执行权，是洛克所说的“经常存在的权力”。所以，对掌握着“经常存在的权力”的人，他的权力尤其需要受到监督。如果说，法官需要对法律融会贯通，“法官终身制”有助提高司法水平，那么，掌握“经常存在的权力”的人，他的权力就需要受到法律的限制。最高国家行政权的行使，如君主的权力，当其他人无法限制它时，就只能通过宪法规定严

<sup>1</sup>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56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年版。

格限制。但宪法上写明的东西在实际上并不见得就一定发生，这就形成了政治领域的“名义”和“实际”的区别。

## 最高权力和最高行政权

在一个国家中，最高立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司法权每一种权力，都是最高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在总统制共和制国家，通常规定议会是最高立法机关，但不规定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在议会君主制和议会共和制国家，议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式议会制度有根本区别，中国不承认自己实行的是西方式议会制度，但中国宪法明文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规定代表机构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一点上，与西方国家的议会共和制是相同的。

在议会君主制和议会共和制下，议会不仅有最高立法权，而且，政府有议会中的多数党组织。政府向议会负责，议会还有权向政府提出不信任案。中国的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罢免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军委主席等，在这一点上，也使中国的全国人大像议会共和制国家的议会一样，表现出可以行使最高国家权力。

在人类史上，除了个别国家外，国家都有武装力量。武装力量包括军事力量和警察力量。军权就是统率、调动、指挥军队的权力。理论上的军权是一种绝对的强制力，是按照掌握军权的人的个人意志行为的绝对权力。军权有大有小。大的军权可以强制小的军权服从。如果不服从，就会发冲突和战争。按照权力的划分，军权是一种执行的权力，所以隶属于行政权。一个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包括全国武装力量的统率权。不包括全国武装力量的统率权的行政权，就不是最高行政权。

最高行政权与最高立法权不同，是一种经常行使的权力。在历史上，这种掌握在个人手中的最高行政权，在没有任期和连任届数限制的情况下，往往就成为凌驾于所有权力之上的独裁的权力。

## 古代“独裁”并非坏名词

就国家机关的各种权力来说，当一个人把国家的最高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

权都集中到自己手里时，这个人就是独裁者。在罗马共和国，独裁(dictatorship)并不是一个坏名词。当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经元老院提名两位执政官之一，为独裁官，任期为6个月或1年。公元前456年，辛辛纳特斯(Lucius Quinctius Cincinnatus)应召为独裁官，立即放下他的犁头，前往拯救他的国家，一俟任务完成立即解职归田。这个故事为其后历届独裁官所尊重。在罗马共和国的近500年中，除了两个人以外，每次担任独裁官，都以辛辛纳特斯为榜样。在一般情况下，国家三种权力中，行政权会经常地、直接地施加到广大民众身上。一个掌握全国武装力量和最高行政权的人，可以凭借武力来保持自己手中的权力。所以，从古至今，人们在限制权力时，首先都是限制包括军权在内的行政权，对最高国家行政权的限制，可以有效行使的手段，不是法律和元老院等机构，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限制掌握最高行政权的人的任期和连任届数，用权力来制衡权力。

就国家职位来说，按照任期来划分，大体上可以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终身制职位，简称终身职。在一般情况下，终身任职的国家元首，就是君主。在有的联邦制国家，在成员邦中是终身元首，但在整个联邦中担任元首有一定任期，这样的职位，也可以视为终身职。如现代马来西亚，马来半岛的9个州的统治者，终身在位而且世袭，马来西亚的国家元首称为最高元首，由这些世袭统治者中选举产生，这一最高元首有任期也是君主。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君主有各种称号，古代埃及的法老、苏丹、哈里发、皇帝、古代和现代的国王和某些终身元首，大公国的大公，都是君主。君主的职位就是君位，有王位、皇位、帝位、大公位之分。本书在不同情况下，按习惯使用皇帝、国王、王、女皇、女王、苏丹、哈里发、沙皇或天皇，意指终身任职的国家元首。在有些情况下，用皇帝或国王一词，代表其他称号的元首，不加特别说明。在古代，雅典贵族会议和罗马元老院的成员，和后来的一些职位，如大法官，他们的任期不受任何限制，即使丧失任职能力和生活能力，都可以继续担任这一职位，这也是终身职。

## 文官就是常任职

第二类是常任制职位，简称常任职。现代实行文官制度的国家，文官的职位就是常任职。文官通常由考试产生，他们一经委任后，除辞职、因过失被辞退、



死亡或退休外，一般长期任职。常任职和终身职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实行退休制度，而后者则不实行退休。西方某些国家的法官终身制，实际上是一种常任职。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的任期不受国会选举和总统更迭的影响，它们非经国会弹劾不得免职，但在年满70岁、任职满10年，或年满65岁，任职满15年的情况下一般都退休。

第三类是限任制职位，简称限任职。这种职位通常由选举或任命产生，有明确的任期。如果选举法没有规定候选人年龄上限，就不能禁止超过文官退休年龄的人竞选有任期的政治性职位。“老人政治”是专制国家终身制的产物，与自由选举无关。在总统制国家，总统不仅是国家行政首脑，而且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又是国家元首，议会或代表机构对总统的权力制衡有限，在这种体制下，规定它的连任届数限制尤其必要。美国总统、法国总统、韩国总统都是限任制职位，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一个人担任总统之职后再胜选可连任一次，然而担任两次之后隔届再参选并不在此限。这种职位，是一种“弱限任制职位”，对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的国家来说，是一条通往专制的道路。普京就是根据俄罗斯宪法规定，在担任了两届总统后，没有竞选总统而担任了总理，在担任总理职务5年后，2012年和2018年第3次、第4次竞选担任了总统。【图1·1】



上图：普京在2008年连任两届俄罗斯总统后，梅德韦杰夫出任俄罗斯总统，2012年普京第3次当选总统。2018年5月7日，普京第四次担任总统。照片是2018年5月7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安德列耶夫大厅就职典礼上。

## 可无限期连任的职位

第四类是可无限期连任的职位。这是一种有任期但连任届数不受任何限制的职位。许多国家议会的议员、国家代表机关的代表、某些委员会的委员也都是可无限期连任的职位。美国第91届国会中有72名众议员连续任职多届。美国犹他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奥林·哈奇自1977年首次当选以来，已经连任7届。在195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生效前，美国宪法对总统连任届数是没有限制的。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担任了两届、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担任了一届、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也只担任了两届总统。乔治·华盛顿和杰斐逊强化了连任不超过两届的传统。从宪法规定看，这种职位仍然属于可无限期连任的职位。美国总统罗斯福带领美国渡过了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就连任了三次总统职位。

在他1944年当选连任四届总统后，195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宪法第22条修正案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得被选任总统两届以上”。这使美国总统职位成了限任制职位。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任期为7年，可以无限制连任，2002年后任期改为5年，可连选连任一次，成了限任制职位。在中亚的乌兹别克共和国，1991年从苏联独立以来，卡里莫夫（1938-2016, Islam Karimov）当选首任总统。他的任期获得多次延长，直到他在2016年9月去世，成了实际上的终身制总统。

在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这些国家对首相、总理的连任没有规定限制。在自由选举条件下，对这种可以无限期连任职位来说，终身任职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现实性，这种职位与常任职不同之处还在于任职不受退休年龄的限制。“可无限期连续任职”既适用于由选举产生的职位，也适用于由任命或其他方式产生的职位。日本首相虽然没有任期限制，但许多党派党章规定了对党的首领连任的限制。

## “反潮流”的非洲小国

一个国家称为“共和国”，当采取总统制时，通常要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对“总统连任届数”的限制。近多年来，在一些非洲小国，出现了一个不大为人们注意的“反潮流”趋势，把“限任制”的总统职位改为“可无限期连任”的总统职位。这种改变，完全谈不上为了进入伟大的“新时代”，而是走回到这些国家传统的“旧时代”。1989年6月发动军事政变上台的非洲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 Bashir, 1944年生)，至今已第7次连任总统，最近一次是在2015年4月16日。巴希尔是当代典型的独裁者，30年连任并没有使他的国“厉害”起来，2005年，非洲国家乍得（又译查德）通过新宪法，废除了对总统任期的限制。在阿尔及利亚，2008年11月，为给现任总统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 1937年生）连任扫清障碍，阿尔及利亚议会两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总统任期限制”的宪法修正案，从而使布特弗利卡从1999年担任总统以来得以第3次连任。非洲国家吉布地宪法规定总统任期6年，不能连任两届以上，2010年修改宪法，取消了连任限制，现任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1947年生，Ismail Omar Guelleh）于1999年当选总统，2016第3次连任总统。

2011年南苏丹正式独立，奥马尔·巴希尔的“国”的面积缩减了四分之一。



左图：1989年6月发动军事政变上台的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 Omar al Bashir, (1944年生)至今已连任第7次总统。

非洲国家发生的事，现在在中国发生了。2018年3月11日，中国的全国人大通过了修宪案，

删除了1982年宪法对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正好在3天后的3月14日，默克尔第4次连续担任联邦德国总理。7天后的3月18日，俄罗斯举行总统选举，已经担任了3次总统职务的普京，在大选中以76.69%的支持率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按照俄罗斯宪法规定，普京将任职到2024年。到2024年，普京将总计担任总统职位20年。

如果说非洲小国是“反潮流”，难道伟大的中国，也是反潮流吗？有默克尔4次连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先例，有普京要当20年总统的榜样，怎么能把非洲苏丹与伟大的中国相提并论呢？然而，全人类的人性是相同的。太阳下没有新事，世界千篇一律，旧戏一再重演。

国家各种职位的任期如何，特别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职位的任期如何，对国家政治生活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下面，我们从古代历史开始，对职位和任期问题，特别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不同的任期类型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问题作一历史考察。☞

## 【百年中国】

# 清华文革蒯氏黑牢的覆灭<sup>1</sup>

周宏余

## 一、蒯氏团伙最后的疯狂

1968年初，在蒯氏集团丧心病狂地制造三大冤案，把数十名无辜的清华干部、教师和学生投入蒯氏黑牢进行惨无人道的残酷迫害的同时，又明目张胆在共和国首都，在国内外闻名的高等学府清华园挑起武斗，攻楼掠地，杀人放火，企图以武力剿灭414，实现他们打天下坐天下独霸清华园的狂妄野心。

早在1月4日，他们就调动了上百人进攻414的“红尖兵广播台”，挑起了清华园内的第一场大规模武斗，双方都有数十人受伤，其中414的郭创贤和江道波同学被逼从5楼摔下受重伤。

<sup>1</sup> 此文选自胡鹏池、陈楚三、周宏余编《从生物馆到200号——清华文革蒯氏黑牢》（香港，时代文化出版社，2021年）一书。文章标题原为“蒯氏黑牢的覆灭”。

1月30日，绑架支持414的干部罗征启，毒刑拷打逼供。

3月16日，绑架邢竞侯同学，毒刑拷打逼供。

3月27日，罗征启逃脱；蒯团又绑架支持414的干部贾春旺等人，毒刑拷打逼供；

4月3日，蒯团绑架罗征启胞弟罗征敷，殴打窒息致其死亡；

4月14--16日，蒯团陆续绑架关押支持414的干部文学宓、刘承娴（女）、饶慰慈（女），毒刑拷打逼供；制造“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冤案。

4月23日，蒯大富发动对414旧电机馆的进攻，逼使多名414同学跳楼受伤。并驱赶持四派观点的同学，抢占了11号楼，开了武斗中强占学生宿舍楼的先例。

4月25日，团派攻打科学馆。

4月26日，团派攻打8号楼。

4月27日，团派追打姜文波致其跳楼死亡。

4月28日，团派再次攻打8号楼。

4月29日，团派开汽车撞倒并碾死谢晋澄。

5月2日，团派攻占旧土木馆，抓走周坚等残酷毒打。

5月8日、9日，绑架谢引麟（女）、黄安妮（女）、张琴心（女）三位女同学，毒刑拷打逼供；制造“12人反党集团”冤案。

5月10日，团派攻打动农馆，并再次攻打科学馆。

5月12日，团派第三次攻打8号楼。

5月14日，团派攻打汽车楼，同日，绑架孙华栋，并将他活活打死。

5月21日，团派再次攻打汽车楼。

5月30日，也就是曾经精心策划的蒯团革委会流产一周年的日子，蒯大富旧恨新仇恶性发作，纠集数百人攻打东区浴室，414战士卞雨林被他们用箭射死；团派火烧东区浴室，414为救重伤战友，21人放下武器。蒯团自己的武斗队员许恭生和段洪水也在混战中死于非命。

5月31日，刘承娴在团派毒打后跳楼重伤，手术后还未苏醒就被团派从医院中强行掳走，6月12日不治身亡。

进入7月，蒯大富团伙更加疯狂。

7月1日，蒯大富下令用枪封锁科学馆，凡有出入者，格杀勿论。

7月4日，团派从闻亭（为纪念闻一多先生而建）开枪打死在科学馆西门外掩体中的414战士朱育生。

7月5日，团派从一教附近的土山开枪打死科学馆外的414战士杨志军。

7月6日，团派从一教向运送后勤补给的414土装甲车开枪，用穿甲弹穿透10毫米厚钢板，打死杨树立（动农系实验技术员）。

7月9日团派火烧科学馆，反诬是414自己放的火。尤其残忍的是他们明知有自己的几名同伴被关在科学馆，仍不顾同伴死活，开枪阻止科学馆救火。

7月18日，团派开枪打死刚从苏州老家返校的自控系女同学钱平华。

在那个炎热难熬的夏天，蒯氏团伙在清华园制造的遍地狼烟、恐怖枪声和十多名屈死冤魂震惊了北京市民和全国人民，也惊动了文革的策划者和总指挥毛泽东，本是让他们反刘少奇的，现在反到自己头上了，公然堕落成土匪，在离自己十多公里远的高等学府内，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杀人放火，不是给自己给文革抹黑吗？忍无可忍，7月27日，在他的亲自策划和指挥下，首都三万工人、解放军进清华宣传落实中央发布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要求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交武器。已经杀人杀红了眼的蒯大富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丧心病狂的下令抵抗，他们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和解放军战士扔手榴弹，开枪，捅长矛，蒯团保卫部长任传仲一人就用长矛捅伤了7名工宣队员，他所率领的那支长矛队捅伤了130多名工人！一天中团派共打死5人，打伤731人（其中重伤149人），抓捕工人和解放军战士143人，穷凶极恶，血洗清华；在共和国首都造成了震惊中外的7.27大血案。

从4月初到7.27的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中，蒯氏团伙在武斗现场和黑牢内外通过枪击、箭射、矛扎、车碾、火攻、爆炸、毒刑等杀人手段致死20人，致残致伤近千人，双手沾满了清华干部、师生员工、首都工人、市民、解放军的鲜血，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物极必反，蒯氏团伙的最后疯狂为他们的彻底覆灭创造了条件。

## 二、蒯氏黑牢的覆灭

在7.27以后的十多天中，蒯氏团伙虽然自知罪孽深重，罪责难逃，但还不甘心失败，企图咸鱼翻身，垂死挣扎，在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的袒护和支持下对宣传队进校做了顽强抵抗。

宣传队进校两天后，即7月30日，他们才在全副武装的解放军的监督下撤出了最后一个武斗据点9003。他们还多次在校内外召开团总部黑会讨论如何与工宣队争夺学校领导权以及如何保护他们中杀人放火的罪犯。

他们继续处心积虑要将414打成是受“反革命集团”和“反党集团”控制的“变天派保守组织”，以摧垮414，在清华建立蒯氏独裁政权。因此他们继续保存蒯氏黑牢，继续关押“两案”被抓捕的干部和师生。

为了摆脱工宣队的监管，不让工宣队发现并解救“案犯”，他们多次在夜半更深将这些“案犯”秘密转押，倒来倒去，关入不同地点的牢房。在宣传队进校之后的7月28日（或29日）夜间把关押在200号的“案犯”秘密转移到北航，8月3日前后又把部分人从北航秘密转移回200号；同时偷偷将文学宓、饶慰慈、贾春旺和李康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将刘冰从北航转移到校内生物馆。为了不让刘冰听到工宣队进校的广播，将刘冰关押在黑暗潮湿的生物馆地下室。

他们同时还将逼供得来的大量纸质材料、录音材料、照片等转移到北航。直到工宣队进校一个多月后的8月底，在一次召开大联委全体会议讨论将材料移交给工宣队时，有人还悄悄地问蒯团专案组副组长王良生：“罗文李饶材料是老团的命根子，都交出去以后会不会有事呢？如果后悔就晚了。”王良生说：“你放心好了，专案组早就想办法了。”后来知道，他们将材料拍了照片，又将照片秘密地转移到了北航。

不过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无情的，7.27以后清华园的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在老人家直接掌控的工宣队面前，蒯氏团伙的一切反抗都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只能一天天走向衰败，一步步走向灭亡，蒯大富经营近一年之久的蒯氏黑牢很快就开始土崩瓦解了。

在5.30守卫东区浴室被俘的王学恭、苏鹏声等17名414同学和吴麒、王竹茹、阎石等老师长期被蒯团关押在12号楼，7.21被抓的周天麒也关押在12号

楼。7.27当天，在工宣队进校以后，团派看守们预感大祸临头，惊慌失措，作鸟兽散，18名同学和三位老师趁乱逃出蒯氏黑牢，实现了自己解放自己。

4月初，电机系教师杨津基、顾廉楚和党总支书记王遵华被团派抓捕关押，7月28日在12号楼被工宣队发现，误认为他们是团派的“黑高参”，带到主楼414防区。

7.27后的第8天，即8月4日，在北京卫戍区政委刘绍文的主持下两派达成了八项协议，其中第四条内容是：“清华两派要主动接触，为革命大联合创造条件，首先两派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所有‘抓去的人’，不得以任何借口进行破坏，以后也不准以任何借口抓人。”表明此时的工宣队已经把解决“三大冤案”中的“案犯”和武斗中的俘虏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了。

8月5日，毛泽东把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送给他的芒果转送给清华的工农宣传队，表明了老人家对宣传队进清华遭受的惨重伤亡的抚慰和坚定支持，进一步巩固了宣传队在清华的地位，站稳了脚跟，成为清华园的新主人，预示造反派已经被抛弃。

又经过宣传队几天曲折的争论和协调，8月7日，双方公布了各自所抓的人员名单。双方到7.27为止实际关押人员情况如表一、表二所示。

表一，到7.27当天团派关押干部和师生的处理结果【1】

	姓名	性别	职业	职务	被抓理由	7.27生态与结局
1	文学必	男	干部	党委统战部副部长	“罗文李饶”集团成员，现行反革命	8.4送公安局，69年初放回
2	饶慰慈	女	干部	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罗文李饶”集团成员，现行反	8.4送公安局，69年初放回
3	李康	男	干部	教务处副处长	“罗文李饶”集团成员，现行反	8.4送公安局，69年初放回
4	刘承娴	女	干部	党委统战部副部长	“罗文李饶”集团成员，现行反	5.31跳楼重伤，6.12死亡
5	贾春旺	男	干部	团委学习劳动部副	十二人反党集团，现行反革命	8.4送公安局，69年初放回
6	邢竞侯	男	学生		十二人反党集团，现行反革命	8.9释放
7	董友仙	女	学生		十二人反党集团，现行反革命	8.9释放
8	谢引麟	女	学生		十二人反党集团，现行反革命	8.9释放
9	黄安妮	女	学生		十二人反党集团，现行反革命	8.9释放
1	张琴心	女	学生		十二人反党集团，现行反革命	8.9释放
1	楼叙贞	女	学生		十二人反党集团，现行反革命	8.9释放



1	刘冰	男	干部	校党委第一副书记	蒋刘反党集团，走资派	8.9 释放
1	艾知生	男	干部	校党委副书记	蒋刘反党集团，走资派	8.9 释放
1	吕应中	男	干部	校党委常委	第二套班子，走资派，漏网右派，	8.9 释放
1	何介人	男	干部	校党委办公室主任	第二套班子，走资派	8.9 释放
1	林泰	男	干部	校党委宣传部副部	走资派	8.9 释放
1	余兴坤	男	干部	工物系总支书记	走资派	8.9 释放
1	滕藤	男	干部	工化系总支书记	走资派	8.9 释放
1	解沛基	男	干部	数力系总支书记	走资派	8.9 释放
2	李恩元	男	干部	校党委组织部第一	走资派	8.9 释放
2	李传信	男	干部	无线电系总支书记	走资派	8.9 释放
2	邵斌	男	干部	蒋南翔私人秘书	反革命，走资派	8.9 释放
2	王遵华	男	干部	电机系总支书记	走资派	7.28 误送主楼，8.9 释放
2	顾廉楚	男	教师	教研组主任	反革命分子	7.28 误送主楼，8.9 释放
2	杨津基	男	教师	教研组主任	拒绝“借钱”给团派支持武斗	7.28 误送主楼，8.9 释放
2	何成钧	男	教授		大右派，特嫌	8.9 释放
2	何增禄	男	教授	工物系	特嫌	8.9 释放
2	吴麒	男	教师	自控系		7.27 从 12 号楼逃离自救
2	王竹茹	男	实验	电机系		7.27 从 12 号楼逃离自救
3	阎石	男	教师	电机系		7.27 从 12 号楼逃离自救
3	陶德坚	女	教师	土建系	红教联头头，现行反革命	8.9 释放
3	朱启鸣	男	教师	化工系	红教联成员，现行反革命	8.9 释放
3	吴栋	男	学生	原 414 总部委员	参加武斗指挥	8.9 释放
3	李元宗	男	学生	414 动农系分部头头	参加武斗	8.9 释放
3	周天麒	男	学生	数力系	参加武斗	7.27 从 12 号楼逃离自救
3	王学恭		学生		参加武斗	5.30 在东区浴室被俘共 21 人，其中 17 人关在 12 号楼，7.27 当天逃离自救 <sup>1</sup>
6	苏鹏声		学生			
	等		学生			

表二，到 7.27 当天四派关押干部和师生的处理结果<sup>2</sup>

	姓名	性别	职业	职务	被抓理由	7.27 生态与结局
1	李正明	男	司机		杀人犯	8.9 释放

<sup>1</sup> 5.30 团派进攻、火烧东区浴室，为救重伤战友，21 名 414 战士放下武器；团派先后将重伤 3 人送往医院门前；1 人（李作臣）被关押在 11 号楼，7 月初从垃圾通道逃出；王学恭、苏鹏声等 17 人被关押在 12 号楼，7.27 当天夜里趁乱逃离。

<sup>2</sup> 见陈育延：《第十六章 清华两派最后的谈判》。

2	马树忠	男	司机		偷运火药	8.9 释放
3	李发祥	男	司机			8.9 释放
4	吴其章	男	司机			8.9 释放
5	刘德荣	男	司机			8.9 释放
6	陶 森	女	干部	电机系总支副书记	走资派，右派， 阶级异己分子	8.9 释放
7	蔡树友	男	职工			8.8 逃离主楼
8	裴觉民	男	学生			8.9 释放
9	谭小平	女	学生			8.9 释放
10	叶志江	男	学生		炮打江青	8.8 逃离主楼
11	杨立人	男	学生		现行反革命	8.8 逃离主楼
12	贾振陆	男	学生		反动学生	8.8 逃离主楼
13	左 羽	男	教师		右派	8.8 逃离主楼
14	曾昭奋	男	教师		现行反革命	8.8 逃离主楼

8月9日一早，工宣队采取了捣毁校内外黑牢，解救被关押人员的行动。这次行动兵分两路：一路由吕方正负责，率领一支300人的队伍和全体团派总部委员乘大卡车去南口清华原子能基地200号，另一路由柳一安负责解救关押在校内的人员。两年多以后韩丁采访了吕方正，吕回忆了捣毁200号“渣滓洞”的经过：“我们知道他们在那边有100多人，于是我们就去了很多人。我们派了大约300人跟我们一起去。估计和前几天（指7.27）在校园里一样，他们可能也会用武力顽抗的。我们做了组织准备，如果我们中有人被打死，其他人就接替他的位置。”“团派在南口的那些人真够‘杆儿’的，他们不参加任何学习班，但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果然不错。我们到达以后，那里院子周围都是通了电的铁丝网，我们只能派代表进去。蒯大富、陈育延和陈继芳三个团派的头头和我们一起去。但守门的人想只让蒯大富作为代表进去，而把我们堵在外面。我们不答应，坚持要一起都进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争论，他们不得不让我们进去了，这时已是中午了。”吕方正接着回忆了他当时看到的情景：“我们发现里面的情况极为糟糕，这地方比任何监狱更恶劣，每一层的门上都焊着钢板。门口堆着沙袋筑成

的工事，所有房间的门窗上都钉了铁栅栏。我们要释放的五个俘虏因为缺乏营养都是面色苍白。其中一个病得厉害，必须由别人抬着上卡车。在7月份这样炎热的天气里，俘虏们只能穿着短袖衬衫睡在地板上，一天只有一个馒头，一碗凉水——通过门上的小孔送进来的。看见我们进去，他们吓得发抖，以为我们是新去的看守，又要带他们去什么地方审问拷打。当他们听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宣传队，他们欣喜若狂，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法西斯迫害者！’我们当面质问蒯大富这些犯罪行为，他说‘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是群众干的。’当得知‘罗、文、李、饶集团’中有两个人被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非常气愤。是蒯大富下令把李康和文学宓当作反革命送到北京卫戍区去逮捕起来了。罗征启已经逃走了——后来我们把他从广东找了回来。因此那天‘集团’中只有一个饶慰慈得到了解放（按：这里吕方正关于对饶慰慈的回忆有误，据陈育延的笔记，饶包括在送公安局九处的4人名单中）。她臀部的伤非常严重，她很长时间既不能坐又不能站，她的身体功能受到了破坏，小便不能控制。她的背上的伤也很厉害，所有这些都影响了她的神经，她的记忆变得很差。当北京卫戍区把文学宓送回学校时，他差不多是耳也聋了，牙也掉光了——那是团派在南口的看守拔掉的，他们要他招供，每次当他没有完全照办时，就拔掉他的一颗牙齿。这全部情况说明，这四个人是被诬害的，团派用拷打逼取供词，然后用李康的话去攻罗征启，用罗征启的话去攻李康。他们有20种不同的刑法。每得到一句有用的供词就用答录机录下来，最后修补整理成一个可供定罪的供词，这些句子可能已完全不是他们自己的原意了。大多数群众听我们的解释以后都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们走的时候，他们还鼓掌欢送我们。”（见韩丁著《百日武斗》）

晚上八点钟吕方正率队回到学校，马上就在主楼前将所有已经掌握的俘虏进行交换，以防两派再生枝节干扰交换的顺利进行。有些两派没有争议，且在校内关押的（例如刘冰等人）已在白天由柳一安解救时放回家了，晚上四派从团派收到10人（多数是“十二人反党集团”的成员）：邢竞侯、楼叙贞、黄安妮、谢引麟、张琴心、董友仙、李元宗、吴栋、吕应中、何增禄。释放了8人（主要是司机）：李正明、马树忠、李发祥、吴其章、刘德荣、陶森、裴觉民、谭小平。同时将7.28宣传队在12号楼错抓的原来是4月初由团派关押的王遵华、顾廉楚和杨津基三人还给了团派。至此，实体的清华文革蒯氏黑牢就彻底覆灭了。

蒯氏黑牢覆灭以后，工人宣传队进一步在清华站稳了脚跟，两派群众组织就从政治舞台上渐渐式微了。8月16日上午，在工宣队的主持下，两派签订了宣传队进校后的“第四项协议”，有八条，其中最主要的几条内容是：取消团派总部和四派总部，成立统一的“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大联委”接受工宣队的帮助和指导；按系统、行业、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在大联合的基础上筹备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这一协议的实质是在工宣队监督下清华两派的“死亡证书”，1968年8月16日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正式寿终之日，敲响了中国“红卫兵运动”的丧钟！

8月26日，毛泽东借姚文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提出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这是文革中毛控制知识分子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强调“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到10月份召开的8届12中全会的决议则更明确指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至此，疯狂一时的“红卫兵运动”就彻底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了，学校中所有知识分子再也不能折腾，只能老老实实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争取“可能得到的改造和解放”了。

### 三、对蒯氏暴行的清算

8届12中全会以后，由于文革发动者预定的打倒刘少奇的主要目标已经实现，像蒯大富这些对打倒刘少奇立下丰功伟绩的宠儿很快就变成了弃儿，面临封建帝制下农民革命中开国功臣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下场。

7.28那天，尽管蒯大富在前一天犯下了屠杀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滔天大罪，但毛泽东对蒯大富还是爱恨交加，语重心长地安慰蒯“我是偏向你们的”，而且夫妻二人还涕泪横流通过同声否定414来表示对蒯的支持。尤其在延续5个多小时的召见结束时，毛已经步出会议大厅后又一度返回叮嘱身边的人“不要又整他们”（指蒯大富们）。似乎恨铁不成钢，抚慰有加。可是两年多后，开始清查“五一六”时，毛泽东一句：“既然有怀疑，把蒯大富叫回来问问就行了嘛”的话，

当时的清华党委就把他从宁夏工作单位揪回北京，关押审查，监督劳动，直到文革结束。

在1975年底老人家有一个批示：“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此时的毛泽东，还在领导文化大革命，但已不再关心老蒯在何方，也不再叮嘱身边的人“不要又整他们”了。这个当年的宝贝，已经弃如敝屣，任其自生自灭了。同时那些在蒯大富的支持纵容下，在黑牢和武斗中有血债的罪犯也在1973—1976年期间陆续被审查或逮捕判刑，受到党纪国法的初步惩处。

但是，由于当年还是处于法制混乱、是非颠倒的文革期间，作为在清华园内制造黑牢、策动武斗、指挥杀人放火的祸首蒯大富，可能圣上还念点旧情，只是监督劳动，没有受到刑事处罚。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恶人一定会有恶报，正义终究要到来。随着红太阳陨落、四人帮垮台、刘少奇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的冤案平反、“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等重大历史剧陆续上演，1981年1月，制造十年灾难和浩劫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江青、张春桥被判处死缓，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主犯也判了16—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在此前几年已死的康生、谢富治两名主犯的反革命罪行也被中央彻底清算，开除党籍，撤销悼词，挫骨扬灰，清除出八宝山，遗臭万年。在此背景下，中央对文革中林、江反革命集团在各地的打手和爪牙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也开始进行了系统和全面的清算。

北京的红卫兵“五大领袖”，除谭厚兰因患癌症被免于起诉外，其余4人均被判刑，其中蒯大富在1983年3月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见附件：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2）中刑字第1124号）。同时，清华大学党委按照中发【1982】55号文件关于清理“三种人”（指文革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的精神，在文革期间工宣队审查的基础上，对两派组织在“文革”期间的问题，又作了进一步清理，并留下一份清华大学文革两派组织被判刑和“记录在案”的84人名单，其中团派有76人，四派有8人。

在团派的76人中又分9类：团总部核心及总部委员16人（其中2人被判刑，14人记录在案）；“罗文李饶”专案组19人（其中17人记录在案）；文攻武卫指挥部及武斗队3人记录在案；全国联络站12人（其中10人记录在案）；军事动态组4人记录在案；保卫部7人（其中判刑1人，记录在案4人）；杀人凶手8人均已判刑；宣传部2人；工总司5人（其中判刑1人，记录在案1人）。这76人就是清华文革中沆瀣一气，造反夺权，组织武斗，诬陷迫害干部和教师、学生的蒯氏犯罪集团的核心和骨干。其中团总部核心中就有2人受到刑事处罚：除前面提到的第一把手蒯大富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7年外，武斗副总指挥任传仲也被判刑12年。那些在武斗中和工宣队进校时犯有杀人放火等重罪的罪犯受到了法律的严厉惩处，例如那个身负两条人命案（武斗期间用穿甲弹打死动农系实验员杨树立，7.27又用手榴弹炸死工宣队员供电局工人潘志宏）的赵德胜和犯有盗抢、行凶、纵火罪的原团派保卫部值勤组组长邢鹏两人被判无期徒刑，其他7名杀人凶手被判处2到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团派76人中受党纪国法惩处的总的情况是：人民法院判刑（2年到无期徒刑不等）12人，定“严重政治错误”2人（其中1人还被单位除名），被“开除党籍”1人，被“取消党员预备期”1人，有犯罪行为但不追究刑事责任2人，53人作“记录在案”处理，其余5人做其他处理。

四派记录在案的8人中只分两类：四派总部核心成员6人，联络站2人。8人中没有一条触及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没有一人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理。

现在看来，清华党委的84人材料真实地反映了1983年那个时代的法制水平和对文革路线的认识水平。自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7年时间中，全党全国人民经过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把颠倒了的是非又颠倒过来了，基本恢复了社会主义法制，对文革的路线是非和代表性人物思想行为的评价发生了180度的大变化。所以蒯氏团伙中那些策划组织武斗，并在武斗中杀人放火的罪犯们基本受到了党纪国法的应有惩处，伸张了正义。应该充分肯定。

但从这个材料看，当时的处理还是有缺憾的。主要表现在对部分人所犯的严重罪行认识不到位，导致有罪不罚，罚不当罪。例如涉及“罗文李饶”专案的，除了“记录在案”名单中列出的19人，包括团总部核心成员陈继芳和王良生在内实际上是21人。可是这21人没有一个人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全部只是“记

录在案”。是他们的罪行不严重吗？当然不是。本书前面揭露的蒯氏黑牢中的累累罪行（例如罗征敷被活活用棉丝堵嘴窒息而死；刘承娴被毒打侮辱后跳楼重伤，手术后昏迷中又被抢出医院，折磨而亡；饶慰慈臀部被打烂而终身致残；文学宓和贾春旺遭受酷刑逼供，被用钢丝钳活生生掰断、夹碎多颗牙齿，等等）还不触目惊心吗？像靠刑讯逼供制造了这么多惊天冤案的总策划和总指挥陈继芳，还有专案组的组长王子瑜、副组长王士元，还有那些直接使被害人致死致残的打人凶手，按照他们的罪行接受刑事处罚是罪有应得，一点都不冤枉。结果恰是一点惩罚也没有，甚至他们中有些人连党员的牌牌都还照样扛着。现在想想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些像康生、谢富治那样的共产党员整人害人专家混在我们的队伍里就会后背发凉、不寒而栗！真不知道当时负责审理这些案子的人是怎么想的啊！

对文革暴行的清理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表明：到1983年时我国对文革期间一些反社会反人类的暴行的清算还不是很彻底很精准，对文革中的是非罪错还有很多模糊认识。尤其是近年来文革成了这里的敏感话题，对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没有能得到更深入的批判、揭露和反思。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薄熙来当年在重庆破坏法制，搞文革回归预演还有那么大的市场？为什么在微信和网络中还不断有攻击邓小平，抹黑改革开放政策，呼唤文革回归的鼓噪？为什么不但蒯大富本人，还有很大一批支持者一直不承认法庭判决的杀人罪和诬告陷害罪？为什么“罗文李饶”专案组中至今似乎只有孙耘就致死罗征敷对罗家属表示了道歉，其他没有一个人对他们自己曾经的罪行表示过认错悔罪？尤其是专案组的总指挥陈继芳还下了封口令，教他们的同伙在反思文革中“写回忆录应当写对我们自己有利的事”。所以至今关于蒯氏团伙如何策划和实施三大冤案的细节还是个“黑洞”，本书的材料全是来自受害人的回忆，加害人没有提供一点信息。这当然是非常遗憾的。

## 四、对蒯氏暴行的一些反思

### 1. 文革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破坏是产生蒯氏暴行的根本原因

读了本书前面的章节，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产生的第一个疑问就是：在人民共和国建立17年之后，蒯大富一伙人怎么就敢在共和国首都北京，在国内外著名的高等学府清华园以一个群众组织的名义对广大干部和师生员工进行诬告陷害、

制造冤案、私设黑牢、刑讯逼供、使数十人致死致残？这不是无法无天，胆大包天，明显犯罪行为吗？答案是：十年文革自始至终就是一个法制沦丧、无法无天的时代。

文革一开始，就突破了法治社会的底线，砸烂了公检法，搞所谓“群众专政”，所有法律法规（包括宪法）都弃之如敝屣，当时发布了一个“公安六条”，指明只保护统帅和副统帅，反对他们就是反革命，其他所有人都被置于无法律保护的地狱，随时都可能被揪斗，游街、逮捕，甚至枪毙。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丧心病狂地将国家主席刘少奇，国防部长彭德怀，军委副主席贺龙，中央常委陶铸等几十位老一代革命家迫害致死。将八届中央委员会123名中央委员中的88人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走资派”，坐监的坐监，整死的整死。将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中的27个的第一书记、省市区长打倒。据有关资料透露，十年中，中央和国家机关被审查的干部有近3万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副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有40人被迫害致死。在人民解放军中有175位将军被打倒，占文革前开国将帅总数的11%。

为了制造“红色恐怖”，掀起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风恶浪，惨无人道地制造了大兴大屠杀、道县大屠杀、广西大屠杀。

他们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继1954年反胡风集团、1957年反右派后，对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有名望有贡献的高级知识分子再次进行了残酷迫害，像作家老舍，历史学家吴晗，电影演员严凤英，科学家叶企孙等数百位各界名人被迫害致死。到1968年底，中科院在北京的171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被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

十年文革中受冲击和迫害的人数超过一亿，非正常死亡数以百万计，那时中国成了一个真实的人间地狱。

正是这个疯狂的践踏法制、毁灭文化、争权夺利的文革大环境刺激了蒯大富团伙的至恶人性和个人野心，使他们迅速堕落成人性泯灭、天良丧尽的魔鬼。文革初期，他们很快就成为中央文革小组迫害刘少奇等国家高级领导人的帮凶和爪



牙，连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还有彭真、薄一波、罗瑞卿等高干都敢拉到清华来批斗，所以就更不会把通过制造冤案、私设黑牢、诬陷迫害清华园中的干部和教师、学生当回事了。

从上述对蒯氏暴行的背景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法制永远是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和保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一旦破坏了法制，就会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社会就会发生大倒退，人民就要遭大殃受大罪，幸福乐园就会变成人间地狱。清华文革的蒯氏黑牢就是在社会主义法制被破坏以后，从高等学府变成人间地狱的最好例证。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大尺度空间看，民主法治的形成和发展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是检验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从蒯氏黑牢的覆灭中我们得到的最大的教训和启发是，按照一定的民主程序建立起来的国家法律制度是保护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利益的，我们每个公民都要建立起牢固的法制意识，不仅要保证自己模范地遵纪守法，而且要随时监督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政党，各个团体、各个成员都要遵纪守法，随时和一切违法行为进行坚决斗争。

清华文革的蒯氏黑牢因社会法制的破坏而出现，也因社会法制的回归和重建而覆灭。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当年蒯大富团伙推波助澜，趁火打劫，为虎作伥，充当了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鹰犬，在清华建立黑牢，制造冤狱，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最后被人民法庭判以重罪，罪有应得！

## 2，清华 414 对蒯大富团伙斗争的性质

仔细研究文革后几十年来对清华文革的反思发现：对当年蒯大富团伙和四派的争斗，多数当年的激进造反派认为是造反派内部争权夺利的内讧。实际上这种看法是片面的，错误的。从两派的形成过程、人员结构、主要观点、行为方式、社会影响和最后结局等方面分析，两派都有显著的不同。

414 对蒯大富团伙的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清华 414 对蒯大富团伙的斗争不是什么造反派之间争权夺利的内讧，而是推动促进文革和抵制反对文革的两种力量、两条路线、两种前途的搏斗。

清华两派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是文革发展的必然。

回顾文革初期，最高领袖利用群众对自己的迷信盲从和对权力的臣服本能，通过发布“516 通知”、批发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制

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贴出《我的一张大字报》、八次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支持鼓励红卫兵揪斗“走资派”等加剧阶级斗争的系列措施，煽动全国全面的造反夺权狂潮。

清华园内相当一部分人紧跟伟大领袖战略部署，响应“造反有理”的号召，成了造反派。但到1966年底1967年初，造反派的队伍发生了分化。

以蒯大富为代表的少数激进造反派权欲熏心，在造反大潮中，政治野心日益膨胀，尤其是在张春桥授意下率先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迎合了最高领袖的政治需要，得到江青和中央文革的青睐，这就刺激了他们的勃勃野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野心家小集团，一个个摩拳擦掌，处心积虑想在动乱中捞一把。连共产党员也不是的蒯大富，不满足于已经通过造反派群众组织窃取的清华大学的临时权力和北京市革委会常委职务，还想入非非，提出要“为九大立新功”的口号，妄想钻进九大后的中央委员会。他们是“打倒一切”的文革极左路线的推动力量。

另外有一部分本性务实、正直善良的造反派以自己亲身的经历、过往的体验，从对最高领袖的狂热、迷信、盲从，渐渐走向冷静，觉醒，和怀疑。他们开始思考：我们这一代人不是一直在共产党毛主席的教导下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习雷锋，学习焦裕禄，唱着“社会主义好”幸福成长的吗？我们的学校怎么成了“黑线主导”？怎么可能我们干部的大多数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者”？

1967年2月23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经过周总理审阅并修改的社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十七年来，在各条战线上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就是铁的证明。要把干部一概打倒的观点，就是抹杀十七年来的基本事实，就是否认十七年来的伟大成就”。3月31日《红旗》杂志又发表评论员和调查员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清华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这三篇文章如同石破天惊的一声春雷震撼了文革乱局中的中国大地，对狂呼“黑线主导”口号、挥舞“彻底砸烂”黑旗、如脱缰野马恣意狂奔的激进文革势力是当头棒喝，对处于文革高压中恐惧不安的广大干部和群

众（包括处于怀疑迷茫状态的部分造反派）是一副振聋发聩的清醒剂，使他们看到了方向，受到极大鼓舞。

因为文革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夺走资派的权，所以干部问题是文革的核心和实质。而《红旗》杂志的三篇文章正由于触及了文革的这个核心和实质问题，很快清华造反派内部的激烈斗争就聚焦到了干部问题上。正是在这个焦点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清华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团派和414派（四派）两大派。

以蒯大富为首的少数激进造反派形成了团派的核心。他们自称“大翻个派”，激烈反对《红旗》杂志这三篇文章，他们认为：清华的解放后十七年是黑线主导，干部基本上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干部有一大批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清华的党员、干部大部分是假党员，刘、邓的党员。因此，要彻底砸烂旧清华。宣称他们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就是要彻底砸烂旧清华，实现阶级关系大翻个儿，现在的好人要从过去坏人中去找。在政权建设上他们认为清华左派力量强大，学生可以单独执掌政权，反对与军代表和学校干部分享权力。

而由经过几个月独立思考的造反派中的温和理智派为核心组建的414派则借助《红旗》杂志这三篇文章的浩荡东风，从建立之初，就旗帜鲜明地批判极左思潮，高高举起了两面旗帜：一面是“十七年红线主导”，另一面是“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这两个观点在当时的社会上，尤其在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的各级干部群体中，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四派认为，十七年清华大学红线占主导地位，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也照进了清华园。沈如槐、黄瑞和的联名大字报《什么“严重错误”》和《什么“彻底砸烂”》两篇文章认为，对“旧清华必须一分为二！”“在我们学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基本上执行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砸烂旧清华”是“毫无阶级分析的无政府主义口号！”周泉缨的大字报《414思潮必胜》总结了四派所坚持的主要观点，例如红线主导论、阶级关系不变论、造反派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论，以及不能“大翻个儿”、不能划分造反阶级和保守阶级、不能冲击军队、要巩固和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要坚持“五个正确对待”，等等。这些大字报广为传播，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些观点传到了外地，同样获得了许多省市温和造反派的强烈呼应，成为他们与本地极端造反派抗争的锐利武器。在政权建设方面，四派从蒯大富在清华的表现和北京其他高校的实践看到：学生不仅不能单独掌

权，而且无法委以重任，必须坚持三结合的方针，让干部在三结合的权力机构中发挥骨干和核心作用。同时考虑到当时混乱的现实政治情况，必须建立以军代表为首的三结合领导班子，取代蒯大富的红卫兵临时权力机构，才能稳定大局。在武斗期间，更进一步发出要求中央对清华实行军管的呼吁。

414的这些观点和主张与蒯大富们的观点和主张完全针锋相对，不可调和。不让蒯大富掌权，这比要他的命还难受，所以他们对414充满了刻骨的仇恨，说414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右派翻天。并不惜制造冤狱，挑动武斗，必欲置414于死地。

在文革发展到全面夺权阶段，需要造反派实行大联合的时候，414从井冈山兵团总部分裂出来，实质上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反抗。如果认同414的这些观点，的确是无形中否定了最高领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正当性。“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这么一个非常敏感又十分现实的话题，触动了不少新老造反派的神经，显然也点中了老人家的某个穴位，他立即联想到“无产阶级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所以7.28他说“清华414说414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又说：“那个414是反对我的。”因为它颠覆了文革的两个基本认知：一个是文革的理论基础，一个是文革的权力基础。414在这两个问题上，旗帜鲜明、有理有节地与蒯大富一伙争论，在全国造成了巨大影响：蒯大富一伙理屈词穷，进退失据，最后恼羞成怒，挑起了武斗。百日之内，中央和北京市不管不问，听任拥有优势武力的团派攻城略地，想助其造成既成事实；没想到蒯大富太蠢，对414就是“搞又搞不掉”，最后竟然把长矛手榴弹扔向了为他搭梯子下台阶的工人、解放军，酿成了震惊全国的7.27大血案。

人间正道是沧桑。414思潮尽管受到最高领袖和所有激进造反派的打压和反对，但却得到了多数人的衷心认同和支持。因为它表达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文革乱象的抵制和反抗，顺应了人民群众结束政治动荡，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国民经济，改善民生的善良愿望和迫切要求。414队伍实际上是清华园内所有反对文革极左路线的人们的集合，其中既有经过反思而觉醒了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造反派，更有当年的众多保守派，尤其是多数干部、教师和党团员都是支持414的。他们明知老人家支持蒯大富，他们是冒着巨大政治风险，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

拉下马”、甚至“舍得一家刚”的英雄气概支持参加414的。实际上支持和同情414的人占了清华的多数，真正死心塌地拥护蒯大富的人只是少数。

414的思潮及其艰苦卓绝的斗争也得到了中央高层及全国各地抵制和反对文革力量的支持。在414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虽曾多遇坎坷，却每次都能化险为夷，绝非偶然。67年5月29日晚414总部宣布成立，5月30日凌晨周总理通知蒯大富因“革命派还没有联合起来”而不能参加清华革委会成立大会，彻底搅黄了蒯大富日思夜想企图窃夺清华党政大权的黄粱美梦，反映出周总理的心和414人是相通的。在清华武斗最疯狂的日子里，也有外地的一些群众组织对414表示了深切关注，并提供了部分物资援助。我在南京大学的一个老同学告诉我，正是在清华武斗最激烈的时候，他曾经奉他们的头头曾邦元之命，押运了几箱药品从南京大学送到414据点清华动农馆，彰显了得道多助的人间正道。

现在我们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到，半个世纪前的文革动乱确实曾经使我们面临过一场亡党亡国的现实威胁。如果当年真的让蒯大富团伙掌握了清华大学的党政大权，清华大学出现一个蒯校长，更多的蒯氏黑牢，更残酷的政治迫害将成为清华的政治常态，清华的广大干部和师生员工将长时间生活在人间地狱。值得庆幸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文革势力的顽强抗争，这些“如果”没有变成现实。

在今天看来，当年清华414对蒯大富一伙文革势力的抗争具有特殊的价值和贡献。

首先，在清华两派争论中形成的414思潮最先提出了批极左、实际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观点，并经过《414思潮必胜》在全国上下造成了巨大影响，尤其是蒯大富团派的小报对《必胜》连篇累牍的批判，给414思潮做了最好的宣传和扩散，成了全国上下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一面理论旗帜。连北大钱理群教授在解释为什么他不谈北大文革，却大谈特谈清华文革时也坦言：“因为清华有414思潮，更有代表性。而且清华人对文革的反思，似乎比北大更深刻。”他还认为“414派基本上是一个‘十七年派’”“打出了一个‘全面恢复十七年’的旗帜，也就事实上取消和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其次，在当时《公安六条》高悬头顶，文革怪兽无情破坏社会秩序，吞噬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类理性良知的暴虐环境下，414明知最高领袖和中央文革是支持

蒯大富的，却敢于冒极大政治风险，不畏强暴，坚持真理，和蒯大富团伙坚决抗争了一年之久。在最后蒯大富挑起的百日武斗中，面对他们的优势武力，414坚持自卫原则，只守不攻，有理有节。最后连支持他们的最高领袖也无可奈何，不得不在68年7月27日派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清华制止武斗。宣传队进校不久，清华两派就被解散，同归于尽。

虽然两派结局相同，但意义完全相反。对蒯大富团伙，是粉碎了他们消灭414、独霸清华园的狂妄野心，并彻底暴露了他们自己灭绝人性的豺狼本性，是彻底的失败；对414，则是完全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对清华实行军管，断绝了蒯大富文革激进势力进入清华权力核心的任何可能性，是当时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414的决死斗争，清华两派的同归于尽，开辟了一个红卫兵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新时期，宣告了文革初期利用红卫兵造反夺权完全是一场政治闹剧，由此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走向失败的起点。

所以说清华414对蒯大富团伙的斗争不是什么造反派之间争权夺利的内讧，而是推动促进文革和抵制反对文革两种力量、两条路线、两种前途的搏斗。7.27以后，我们又经历了1971年林彪的外逃，1976年四人帮的覆灭，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结束文化大革命，将工作中心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转变，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和蒯大富等文革激进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彻底否定文革的历史决议等重大的历史事件，结束了十年文革的噩梦，铲除了产生清华文革蒯氏黑牢的社会基础。最近40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消除了数亿人口的绝对贫困，经济总量进入世界第二。去年至今的新冠疫情是对世界各国的大考，我国毫无争议地获得冠军。

产生蒯氏黑牢的年代虽然离我们很远了，但历史绝不会忘记我们多难的祖国曾经在文革浩劫中从至暗走向光明的转折点，414为促进这个历史转折，尽快结束当时我们党和国家的悲惨境遇，开创我们民族的新生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我们更要牢记这段历史，警惕为文革翻案的暗流，绝不能让蒯氏黑牢的惨剧重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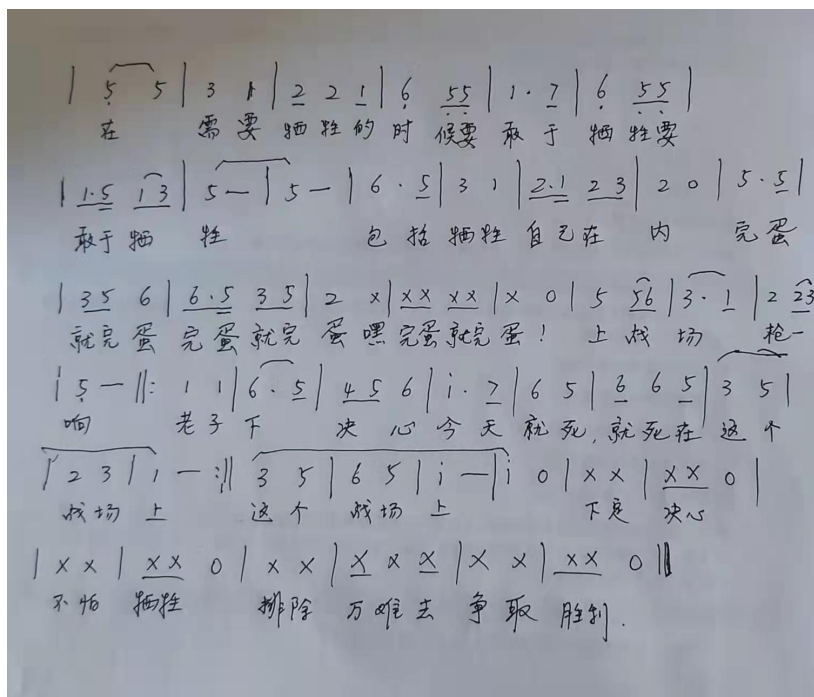
\*\*\*

\*\*\*

\*\*\*

我们在本书中邀请了多位蒯氏黑牢的受害者更全面更系统的揭露蒯氏团伙曾经的恶行，主要目的是呼唤当年文革暴行施暴者良心的发现和人性的回归，希望这些人能够对曾经的恶行有一个认真的回忆和理性的反思，对当年的受害人给出一个迟到的但是真诚的道歉和忏悔，既是对他们本人灵魂的救赎，也是对受害者精神的慰藉。如果他们能够再前进一步，公开他们当时如何策划制造冤案、酷刑逼供的内幕，使本书揭示的史实更丰满、更完整，为历史留下更全面、更真实的记录，给后人以更深刻、更有震撼力的警示、警醒和教育，当然是我们所希望的。❏

### 附：清华大学《414 战歌》



#### 《414 战歌》歌词<sup>1</sup>

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嘿，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就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就死在这个战场上。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就死在这个战场上。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sup>1</sup> 这首歌词的主要内容选自林彪语录。

【百年中国】

## 画说我的一生 (16)

上战场，枪一响……（中）

（1967年8月-10月）

刘海鸥



空闲时我就上街转转，乌鲁木齐的街道拥挤喧闹，不时地看见装满武装工人的卡车一辆辆飞驰而过，或者堵塞在某个大街小巷，车上架着机关枪，工人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他们叫苗子），雄赳赳气昂昂地呼喊口号或唱着歌。一天，看见路中央一大摊血迹，旁边的人说，一个行人就是叫这样的大卡车撞死了。

马路边上，市民照常活动，似乎是两个世界，一部分人忙于打仗斗殴，另一部分人就在他们的身边照样过自己的日子。商业中心各族人来来往往，商店依然繁忙，大街上摆满货摊，烤馕的维族老汉坐在炉台上，勾身把面饼贴在炉壁里。水果摊上的果子随便尝，摊贩毫不在意。西瓜又凉又甜。葡萄干又大个又便宜。还有自制酸奶，我吃了一碗，又酸又馊，一点也不好吃。买东西的计量单位是公斤、克，买点东西我要换算半天，很不习惯。我和克阳还在街上吃了手抓羊肉饭，



没有筷子，实实在在地用没洗的脏手抓，弄得一手油。

街心花园孩子们追打嬉闹，维族老汉懒洋洋地晒太阳。更妙的是在市中心广场，高音大喇叭里播送着美妙的维族歌曲，我虽然听不懂，但我知道那绝不是革命歌曲，也不是在汉人中流行的那些“新疆歌曲”。那曲调带着古波斯的神秘，一波三折，委婉凄美，让人心痛，让人感伤，让人百听不厌。



在新疆大学我找到了同学的姐姐。她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考上大学，但是1964年新疆大学到北京招了一批汉族学生学维语做翻译，出身要求不严格，于是她总算上了大学。我和她打听海燕的情况，又通过她知道我的小学时代的好朋友定华就在乌鲁木齐的新疆工学院。

我立刻去工学院找定华，还真的找到了。多少年没见面了，我们兴奋得大叫。我也见到了她的男朋友小韩，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个子不高，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1966年9月15日他代表西北红卫兵上了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回疆后是红二司的头头。



当晚我就住在定华那里，她是新疆工学院红二司兵团的广播员，广播站设在图书馆，定华也住在那里，床夹在两排书架中间，躺在床上看书左右逢源。她让我睡在她的床上，想要什么书拿走就是。我抽出一本书《红字》看了一夜。我什么书也没拿走，革命第一，带上几本外国小说看是很不合时宜的。



这年的冬天，定华突然出现在北京，她要为爸爸洗清冤屈。她爸爸我常见，原来是科学出版社的编辑，一个戴深度近视镜的书呆子。她爸爸的事情十分荒唐，犯的不是右派罪，不是流氓罪，而是“偷书罪”——1957年整风鸣放时群众有话不敢说，她爸爸自告奋勇，当了群众意见代言人，向领导转达意见遭到怀恨，定右派还达不到标准，就以莫须有的“偷书”定了个“坏分子”，开除了公职。

定华的妈妈受到丈夫的牵连，在六十年代初被下放到新疆，没有工作的爸爸带着一家也跟随而去。妈妈在农一师的印刷厂工作，全家只靠她的微薄工资生活，如果活儿太重，爸爸就代替妈妈去做。

我陪定华去找他爸爸的好友姚依林，没找到。从姚家出来，定华的眼睛直愣愣的，突然说：“小韩被流弹打死了。”说得很平静，让人心寒。小韩就是她的男朋友，不久前他去三中抢枪，被对方射杀。我正在想怎么安慰她，只见定华目光灼灼地看着我笑了：“海鸥，其实我知道你是干嘛的，你是公安局派来监视我的。”我意识到，定华的精神出了问题。我们赶紧给她家打了电报，她爸爸赶到北京，把她送到医院，待她病情稳定一点，他们一无所获地回新疆了。

如今定华已经回到内地，住在杭州。我回中国时候会和她通电话，定华一说起话来收不住，把过去的事一件件重新说一遍。他弟弟说，她的病还是时好时坏，但每次见她总是把海鸥挂在嘴上。



红二司的大本营新疆大学多次被对立派攻打，最终失守。为了安全，我们搬到了外贸局。外贸局地方不大，却仍为红二司所占领。接待我们的人叫小王，文文弱弱的，他的妻子也是小巧玲珑的。他们都是江苏人，言谈之间对文化革命很不理解，对武斗十分厌倦，很想回老家呆一阵，只是因为孩子刚刚出生不便出行。他对我们的要求尽心尽力，替我们安排好了一切事情。外贸局的人早都不上班了，办公室都空着，科大的学生住在一个大办公室，我和克阳住在一个小间。

常有炸弹炮轰落到外贸局的院子里，玻璃老是震得轰轰作响。我们怕遭冷弹，轻易不在户外活动。有一天傍晚去食堂打饭，穿过院子，一颗炮弹就落在附近，震耳欲聋，好在是自制土炸弹杀伤力不大。奇怪的是，我从来也没有觉得害怕过。



一天我上街看情况，不觉走到火车站附近，见一大队人排着队喊着口号行进。我上前问，知道他们是上京告状返回的红二司派群众，刚下火车，有几百人。他们不知新疆“老保”已经绝对地控制了局面，红二司则早已转入“地下”，一下火车就不知死活地开始了示威游行，这些人高喊“打倒王恩茂！”“打倒保皇派！”有的人拿着刀子匕首，有的人甚至敞开衣裳，亮出腰里别着的一圈手榴弹。我知道这是极端危险的，他们一定要出事，就跟在队伍旁边看个究竟。

果然，队伍进入一条街道，街的前端已经被沙袋木架铁丝网等路障封住，就像巴黎的街垒战一样，沙袋上架着好几挺机关枪，沙袋后面卧着操机关枪的人。路障前站了一排人，头戴帽盔，手持长矛，腰间和胸上缠着皮带，气势汹汹地摆

出了准备刺杀的姿势。游行队伍打头的人心有点虚，但还是迎了上去，嘴里仍然呼着口号。那一排横握钢矛的人（都是少数民族同志，而且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



是保王的，看来王恩茂在新疆的统治是很得人心的）紧逼过来，迫使队伍站住。双方对峙，冲突一触即发。打头的红二司的人还是不明情势，破口大骂，持钢矛者火了，一帮人冲上前去对准为首的就要刺。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冲过去，挡在长矛和打头人中间，用手抓住一个长矛的尖端，使劲往回一顶，嘴里喊道“不许武斗！”持长矛的人没料到这一手，被顶得往后一个趔趄。



刹那间六七根长矛尖同时顶在了我的胸口。队伍中有人把我往后拉了一把，长矛紧紧地逼上，我没有显示一点恐慌，拿长矛的看我和那些人风格不一样，说话也不同，问：“你是干什么的？”我想起了自己的身份，说：“我不跟你们说话，叫你们的头头来。”这么一端架子，更没人敢下手了。



头头走过来，是一个汉人。我掏出自己的“记者证”，两个指头夹着递出去，用不卑不亢的口吻（实际上心里也虚）道：“我是首都红卫兵驻新疆记者，我会把这一切向中央文革汇报。你放我离开这里，否则后果自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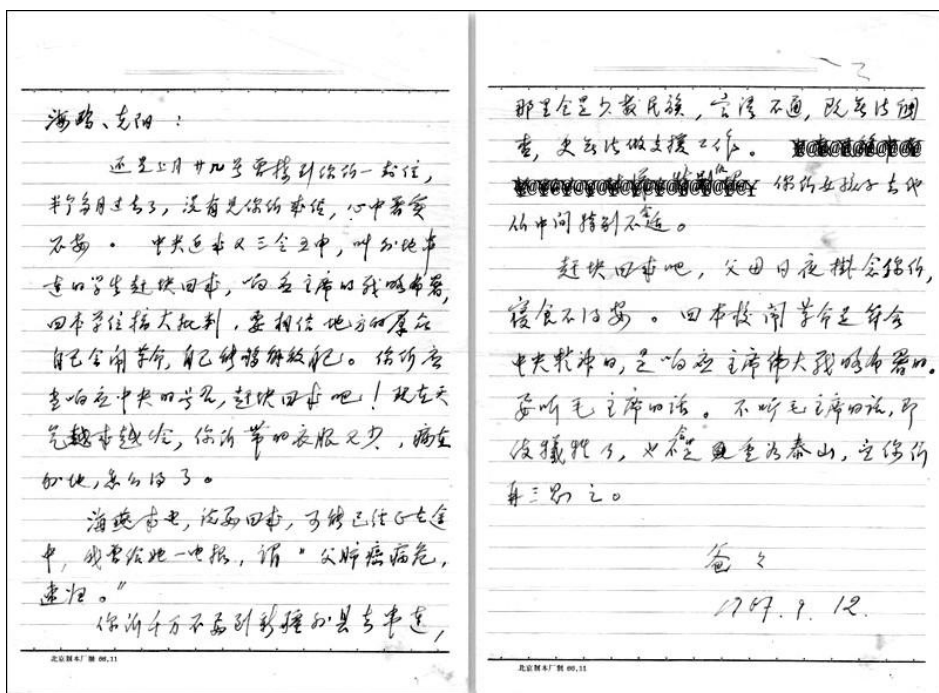


听我的口气这么大，那个汉人上下把我打量一番，仔细地看看我的证件，略一思考，把手一挥，矛子们离开了我的身体。他让我从旁边的一条小街出去，我想，走也要走得堂堂皇皇，就面无惧色大摇大摆地向前方，冲着路障和机关枪走去，其实我心里也是胆怯的，他们若在后面捅我一长矛，或在前面一扣扳机，我就完了，但是我知道此时我决不能表示怯弱。

整个队伍安静地注视着我走出街垒。一离开那条街，我简直要撒腿逃跑，还是压着自己，一步一步走远。那条街前后左右都被封锁，游行队伍全班人马都成了瓮中之鳖，后来听说为首的几个被杀，其他的人被迫投降。

这是我在新疆经历的最惊险的一幕，那时有一条“林副主席”的语录十分流行：“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勇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这句话后半截现在看来很有点“痞”，但是当时最受青年人青睐，很多人高颂着这条语录投身于狂暴、混战，就这样“死在战场上了”而发起混战的老人家则轻描淡写地说“轻如鸿毛”。

现在回头看，我想起了两个词——老毛称赞的“痞子”，还有我们家乡话的“光蛋”，这话安在“老子”们身上最合适。我们就是以“痞子”和“光蛋”勇气冲向战场。何其愚蠢！



红二司几乎不再活动，科大的学生也没什么事干了。我和克阳很无聊，有时买一大堆葵花籽，撒在桌子上，一手抓一个，抢最大的嗑。乐此不疲。

我决定去伊犁兵团农四师找海燕。海燕从去的那天起，就不能忍受兵团生活和纪律，得罪了层层领导。文革正是一个打击报复的机会，她被兵团的对立派整得很厉害，被管制，失去了自由。全家人为她日夜操心，寄希望于我把她带回家。

不久我收到了爸爸的信：“还是上月（八月）二十几号曾收到你们一封信，半个多月过去了，没有见你们来信，心中着实不安。中央近来又三令五申，叫外地串联的学生赶快回来，响应主席的战略部署，回本单位搞大批判，要相信地方的群众自己会闹革命，自己能够解放自己。你们应当响应中央的号召，赶快回来吧！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你们带的衣服又少，病在外地怎么得了。

海燕来电，说要回来，可能已经在途中，我曾给她一电报，谓，‘父肺癌病危，速归。’你们千万不要到新疆的外县去串连，那里全是少数民族，言语不通，既无法调查，更无法做支援工作，你们女孩子去他们中间特别不合适。

赶快回来吧，父母日夜挂念你们，寝食不安。回本校闹革命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是响应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要听毛主席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即使牺牲了，也不会是重如泰山，望你们再三思之。 爸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

但是我决定不找到海燕就不回去。那时真不懂事，自己有了孩子，才理解父母对我们多么操心。



还没等我出发，一天新疆大学的朋友到外贸局来，带着一个不速之客——海燕。一见到我海燕就放声大哭，说爸爸得了肺癌。我又惊又喜，告诉她这是假的，是人们糊弄领导的惯常手法。



收到爸爸的电报，海燕不管不顾溜出了兵团，这更惹怒了兵团，扬言抓住她就要“砸断她的狗腿，砸烂她的狗头”。海燕穿着请维族人做的维式棉袄，很好看。她从来不穿黄色的兵团服。📷

【人物】

## 低学历知名学者何方

宋以敏

何方 1922 年 10 月 18 日生于陕西临潼，14 岁小学毕业，初中上了一年多，就被革命浪潮卷到了延安。18 岁当上抗日军政大学政治助教。29 岁被任命为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成为外交部几个主要“笔杆子”之一。57 岁进入学术界，当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65 岁发表有关时代问题的研究心得引起广泛关注，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1994 年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主要依据。77 岁开始研究中共党史，83 岁写完的专著得到较高赞誉。2007 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评选为首届荣誉学部委员，学术领域专长为两项：国际问题，中共党史。

资中筠先生在 2011 年 10 月 19 日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说，“特别佩服何老的，就是他的读书。他的学历是我们在场的人中最低的，但是他读书是最多的，至少是最多的一个。从文化底蕴这方面，是很少有人能够达到的。所以后来他思想能够发展到现在的这一步，也是跟学而思分不开，而且永远坚持独立思考。”

何方去世后，文史学者吴迪教授也写过类似的话：“在‘三八式’一代知识分子中，何方的学历如果不是最低的，也是最低的之一；而在‘两头真’的老革命中，何方的著述如果不是最多的，反思如果不是最深的，那么，也是这最多最深的之一。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道人所不曾道，言人之不敢言。从最低到最多最深，靠的是什么？是自学。”

正如吴迪教授所言，何方所以能够取得成就，靠的就是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自学。可以举个例子。《红楼梦》里的诗词和回目，何方几乎全能背下来。这早在外交部就出了名。1954 年何方随同我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一次周恩来

总理和大家一起吃晚饭，乔冠华向总理介绍说，何方可以背《红楼梦》。何方赶快申明，顶多能背百分之八九十的诗词和回目。在座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不信，要何方背林黛玉的《桃花行》。何方立刻开背，背了一半，大家叫停才止。那么，何方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看和背《红楼梦》的呢？是在延安劳动间隙的时候。连抬粪时也拿着，路好走时看书，路难走时背书。何方在一生中把《红楼梦》连看带背地读了好几遍。

1987年何方曾应约写过一篇《也谈点自学的体会》，被收入《名家谈自学》一书（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版）。何方在这篇文章里谈到，除了强烈的求知欲、广泛的兴趣、“挤”和“钻”的精神、养成习惯持之以恒、善于适应环境和学用结合这几条，自学的动力还来自巨大的工作压力。

“抗大”毕业后留校当政治助教，同学的文化程度普遍比何方高。为了能辅导理论学习，何方只有拼命读书，硬是在十七八岁上啃起了《资本论》。他说，不一定都能读懂，却因此逐渐养成了自学的习惯。

更大的工作压力来自1950年进入外交部工作以后。研究国际问题，不仅专业性强，而且知识面要广。何方自学的劲头更大了。

何方在两个学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离不开张闻天。在国际问题研究上，张闻天给何方当了十年导师。何方晚年改行专攻中共党史，出自他对张闻天的深重内疚之心。

何方研究国际问题，是由张闻天领进门的。张闻天是位学者型领导人。耿飏、伍修权和周培源等党内老革命和老教授都说张闻天有学者风度或大学教授风度。这一点，张闻天早在延安负责宣传教育工作时已有充分展现。后来，无论在东北做地方工作，当驻苏联大使，还是当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他都继续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当大使时，按水平把所有工作人员分成高中低三组，分头学习理论、国际法、历史地理、俄文和文化知识等，还组织由水平高一些的去辅导水平低一些的。当副部长时，创办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和外交学院，在部内建立教育委员会，要求干部们人人参加各类学习。张闻天也让何方帮助他组织这些学习活动。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张闻天本人更是一直学习到老，在流放地肇庆写出多篇具有真知灼见的理论文稿，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与经济》这篇重量级专论。

能在外交部当上张闻天的主要助手，是何方的得天独厚机遇。可以说，何方

是张闻天带出来的一个研究生。张闻天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总发展方向有自己的基本判断，对我国应该奉行什么样的外交路线有自己的系统看法。在把张闻天的这些思想一一变成文字的过程中，何方的认识水平得以不断提高。

对于这样一位有知遇和长期教导之恩的导师，何方却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违心地参与了对张闻天的错误批判。从1960年开始，何方就为此深感愧疚，有时竟不能自己。为了赎罪补过，在完全卸去国际问题研究的职责之后，何方全力投入了中共党史研究，研究重点就是恢复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的真实地位。

何方当过第七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苏（苏联解体后是中俄）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的兼职教授。何方的学识加上有话直说的作风，使他在同国内外学界和公众人士的交往中赢得了尊重和友谊。下面举两个例子。

有泽广巳先生是日本学术院院士，在日本广受尊敬。先生相当看重何方，何方也把先生视为异国忘年交。这和何方陪同先生参观游览杭州的愉快经历不无关系。何方和先生谈论问题的内容广泛，包括随口背诵和议论中国古人赞颂西湖的诗词。两人谈话投机，先生很是高兴。

何方在参加全国政协活动时，不仅在五花八门的问题上都能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更常能提出别人还没有看出或虽已看出但不敢谈出的问题。在1990年的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何方在小组会上讨论国际形势时提出“苏共气数已尽”的论断并作解说，让同组人大吃一惊。何方在小组内得到了“炮筒子”的称谓。在何方参加的最后一次会里，几位老大姐颇为惋惜地说，以后没有何老参加，我们这个组开会也就没劲了。

何方早在2008年就决定身后把遗体捐赠给协和医学院供教学之用，不留骨灰。感谢新华社名记者唐师曾、在杭州的抗战老兵后裔吴缘和安贤园负责人李钢的大力帮助，使何方竟能于2019年8月24日落葬在安贤园名人苑内的张闻天座像旁。在何方的骨灰盒里安放的是他的著作。这正是他受教于张闻天和向张闻天赎罪补过所取得的成果。

何方的墓碑上写着：“曾论证世界早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如何判断关系国家走向；在党史研究中考察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意义和影响。作为张闻天在国际问题和政策研究上的主要助手，1959年庐山会议后随张闻天蒙冤，1979年随张

闻天平反。为还原张闻天在中共党内曾任总书记并发挥过重要领导作用的真实历史，做出突出贡献。”

能在这里和他的导师永远相伴，对何方在天之灵是莫大的安慰！

（撰稿人宋以敏，是何方的老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已离休）

## 【人物】

技术出众的刘师傅，不仅踏实肯干，还是受人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实在人，因为有生理缺陷而备受欺辱，最后一次打击令他无法吞咽，导致高烧不退，含冤早逝。——作者题记

# 技工刘榔头

向真

1969年3月5日，16岁零两个月的我被分配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前后共当了5年工人、一年红医工、10年半劳资员，共16年半。1985年6月7日，经社会公开招聘，我进中国少年报社当了编辑。我在工厂时，结识了许多工人、技术员和干部，其中一些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前几天，我写过“右派室友彭诚”“军管组长门双成”，今天写一名外号“刘榔头”的老六级技工的往事。

秉承自己的习惯，我写人和事从不含水份，全是自己亲见亲闻的事情。技工刘师傅的故事有两个看点，一是他技术出众，但处世懦弱；二是他有生理缺陷，没有生殖能力，俗称“二椅子”（也叫二性子、两性人），他为此蒙受了莫大羞耻，一生充满悲情。

## 1. 大字报上写着，要砸烂他的狗头

我进厂时，文革迈入第四年，大批判正如火如荼，“喜迎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阶级斗争如火如荼，厂房内外墙上不断刷出新的大字报，互相揭发“罪行”，充满恶狠狠的人身攻击。刘师傅的名字，还有他“刘榔头”的外号，我是从大字报上先于其人见到的。揭发并攻击他的那几张大字报的标题为红色大字，

赫然写着“革命的铁榔头砸烂刘榔头的狗头！”内容极尽嘲讽之能事，比如：“你刘榔头技术再好，也没有革命的铁榔头硬”；“不突出政治，走白专道路，假装老好人，一心想当技术大拿，没门！”“革命群众要造你的反，把你的狗头砸个稀巴烂！”

大字报的内容有好几张，却全然看不出刘师傅有任何“罪行”，一个普通技术工人被这样公开羞辱谩骂，给我留下深刻的坏印象。看了大字报，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个要被人砸烂狗头的“刘榔头”，他的技术一定不错！

几天后我就见到了刘师傅本人。那时我刚被分到组装车间钳工一组当学徒工，师傅叫王知仁，7级工，是钳工组技术组长。王师傅喜欢搞发明，厂里许多自行研发的革新设备好多台都出自他的手。那时他正潜心研制一台多功能半自动钻孔机，派我去机修组找刘榔头取回一个零件。“刘榔头？不就是大字报上说的那人吗？他怎么叫这个名字呀？”王师傅说：“刘师傅有绝活，能用榔头敲平薄钢板，得了这个外号。他技术全面，车钳铣刨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我不由对此人肃然起敬，兴冲冲去了机修组。

机修组人不多，不用打听我就找到目标。刘师傅高大壮实、单眼皮小眼睛，正俯身在机床前用砂纸抛光一个零件，他的新徒弟小赵是我的中学同学，小赵告诉我“快好了”，然后拉我到一旁，皱着眉头说：“我真倒霉，摊上个二椅子师傅，在咱同学面前都抬不起头。”“什么二椅子呀？”这个词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小赵说“别问了，反正特恶心，我是倒八辈子霉了！”

刘师傅将打磨得光亮如镜的零件交给我，把转告王师傅的两个注意事项交代得一清二楚，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好。小赵把我送到车间门口，我对他说：“我师傅说刘师傅技术特别好，脾气也这么好，你别再瞎抱怨了。”后来看到，他师徒俩关系果然处得不错，后来小赵也成为一名出色的技工。

## 2. 技术好靠钻研，出好活需静心

几年后，我所在的班组因组装发动机增压泵遇到难题，刘榔头调进我组，成敦组长让我给他当助手攻克这项技术难关。搭档期间，我更感受到刘师傅的技术

和脾气都是一等一的好，我跟他学会精密零件研磨等技术，他喜欢边干活边听我讲故事，一起干活挺愉快的。

各种难活儿在刘师傅手里似乎都玩得转。他的工具箱与众不同，其他师傅箱子里都是从库房领来的统一制式的工具，刘师傅箱子里的工具多是自制的专用工具，除了工具还有一些技术书，他爱琢磨那些在我看来很无趣的技巧，休息时，他独自猫儿在角落里抠搜着干点零活儿。他性情孤僻，总躲开人多的地方，但我发现他其实挺爱说话的，有时他嘴巴不拾闲，说起各项技巧如数家珍。一旦开始做研磨等细活儿时，他能长时间一言不发、眼都不眨，他说“心不静，不出好活。”我揣摩那种意境，排除杂念，八字旋转时专注于手中活计，果然也能将泵芯的两个小齿轮研磨得严丝合缝了。中国最缺的不是工程师，优秀的技工一直严重短缺，人心太浮躁（不好意思也包括我），像刘师傅这样肯钻研又静得下心的人太少太少了。

我也发现刘师傅的毛病——猜疑心过重。欺软怕硬，是许多大陆同胞的通病，所以常有人爱捏造他，拿话讥讽他的生理缺陷，有人很阴险，有些话相当露骨，抽冷子戏弄他个脸红脖子粗。刘师傅太窝囊，不会还嘴，气极了扭头离去，还得听身后不依不饶地坏笑。有两次，我发现他站在车间小门的门缝外面，伸着脖子往里听，一个大男人这等做派太裁面了吧，我瞪他一眼径自推门进去，里面几人果然正聚在一处嘲笑着“刘榔头”，议论他的小心眼儿和不育症。

有人告诉我“刘榔头是个假男人，他的生殖器像孩子一样，连胡子都没有，他从来不在工厂洗澡。”这话令我吃惊，也很困惑，三通用厂有个温泉大澡堂，下班后去洗温泉澡是我们一天最惬意的事。我留心观察，果然刘师傅不去澡堂子，二椅子的传言莫非是真的？

### 3. 红颜薄命与缺陷人生的悲凉

为此，我去了我师傅王知仁家，王知仁师傅和王幼珍师娘有四个女儿两个儿子，大女儿与我同龄，师娘和姐妹几个对我很亲热，有自家人的感觉。我向师娘打听刘榔头的事，他们两家是多年的邻居，师娘给我讲了一个悲惨的故事。原来，刘榔头是河北农村人，很小被送进京城铁匠铺学徒，技术出类拔萃，49年后评

定技术等级时，凭他掌握的几项绝活，评上最高的8级是应当应分的，可惜他因懦弱遭人白眼儿，只评个6级工。

他父母在老家给他说了个媳妇，挺漂亮的，他把媳妇接来北京，户口也上了，两口子相安无事。1958年大跃进，有劳动能力的家庭妇女纷纷进了街道工厂。刘师娘那时身材苗条、容貌端丽，还是个唇红齿白的大姑娘呢，在一大帮黄脸婆中很是惹眼儿。上班后，几个多嘴多舌的老娘儿们拿她乱开玩笑，甚至不分场合地当着她的面议论夫妻间的私生活。

领班的班长是个中年汉子，眼前来了只楚楚可怜的玉兔，他动了歪心，骗奸了她。一回强迫，二回半推半就，三回如鱼得水，柔弱的刘师娘初尝妇人滋味，像被施了魔咒般以心相许，哪知缺德的班长只想尝个鲜儿，不愿背上包袱，随即调走了事，人间蒸发了。

火焰乍燃便被冰霜砸熄，被抛闪的人一下子疯了，数九寒天竟脱光了衣裳在外面疯跑疯叫，两三个人都拉不回来。刘师娘的工作丢了，刘师傅花光了积蓄才把媳妇治好，因服用大量激素，她变得臃肿不堪，几年下来已判若两人。刘师傅家有个叫小颖的女孩，是刘师娘病情稳定后，她妹妹过继给他们的。

刘师傅夫妻的遭遇令我唏嘘不已，从此无法容忍对他生理缺陷的讥讽，再有人当我面说他“二椅子”“连个崽儿都下不出”之类的刻毒话，我会立即毫不客气地大声斥责：“刘师傅招你惹你了？少缺点德吧你！”“再说这种话别怪我骂你！”几次下来，没人再公开拿刘师傅寻开心了。

#### 4. 我收获了实心实意的回报

那时我已经看过《水浒》《警世恒言》等老书，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话能张口就来，暂时没人公开欺负他了，刘师傅虽无感谢之言，却以行动表达了谢意。他为我自制了一套小巧实用的工具，悄悄放进我的工具箱；他捡来废钢丝，做成一款多用的晾衣钩，怕我拒收，就做了好几副分送给几个女工。不久，我被厂部借调到劳资科参与工资改革试点项目，离开车间后，有一次刘师傅站在厂门口等我，把一只小饭盒塞到我手里，匆匆跑开让我无从推却，打开一看，是一小盒糯米豆沙糕，以前一起干活闲聊时，我说过爱吃糯米豆沙糕。

1975年春，父母来信说不久要回国述职，我四姐妹们兴高采烈准备给父母一些惊喜，每人画一幅墨竹、写一句话凑成四幅挂在客厅中间四扇屏风上；买来丝绵亲手缝制两床柔软轻薄的丝绵被等父母回来享用；买两大束绢花，装点父母卧室。最大一项工程是粉刷三个房间的墙壁，那时不懂有家装公司，征询了内行人后决定自己动手。买来白粉、色粉和胶，准备好桶和排刷，我姐妹各请了一天假，调制出淡蓝色的粉浆后就开工了。



我父母在新华社驻外分社工作时的一张照片

不干不知道，干起来真叫累。我们住的房子开间很高、很大，我姐妹四人分两拨轮换着刷墙，没多长时间就感觉脖子和胳膊又酸又疼，更要命的是发觉两把椅子摞着还不够高，屋子顶棚只有最高个儿的二妹一人能够得着，发愁之际，刘师傅突然不请自来，让我大吃一惊！原来，早晨一上班他听我师傅王知仁说我今天请假、家里要刷墙，他担心我和妹妹难胜此任，赶紧请假坐车赶过来帮忙。刘师傅高大强壮，一个顶我们仨，有他加入，进度快多了，特别是三间屋顶的粉刷他一人包圆了。原打算挑灯夜战的活儿，下午就提前刷完了。



刘师傅谢绝吃晚饭，刚完工就回去了。他走后，二妹不住口地夸他，连说：“阿弥陀佛，刘师傅简直是天兵天将。”大妹说：“刘师傅太好了，没见过干活这么卖力的人。”刘师傅诚心诚意的帮助，令我姐妹非常感激。

## 5. 遭受打击，含冤早逝

至今许多人还在怀念80年代。上世纪80年代初，平均主义大锅饭遭到公开贬斥，国家顺势出台职工工资按百分比上调的政策，各单位按在编职工总数的2%下达涨工资指标，就是一百个人中有两人可以上调一级工资。1949年后，仅有文革中期一次工资普调，很长时期人们无不盼望涨工资，以改善拮据的经济状况，2%的比例对应100%的巨大期盼无疑是杯水车薪，竞争空前激烈。我厂采取各车间、科室根据出勤、完成任务情况，在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采取三榜公布的方法确定上调工资人员名单。

那时我是厂部劳资员、工资调整办公室骨干成员，各车间、科室分三次上报的调资名单我要及时统计并上报厂长和机械局劳动处。刘师傅工作成效突出，所在车间前两次报上来的名单中都有他，最终名单却把他换作别人。不久，有人告诉我刘师傅住进同仁医院了，我一愣，心想“他身体那么棒，怎么生重病了？忙过这阵，去医院看看他。”几天后没等我去，紧接着就传来他病逝的消息。

事情是这样的，刘师傅同车间一男青工，妻子是农村户口没工作，有两个小孩，他说自己“一到下半个月家里就揭不开锅”。因孩子生病他请假超时，眼见前两榜自己名落孙山，涨工资没戏，他急了，拿了把刀冲进办公室威胁车间书记，声言“如不给我涨工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车间书记吓得哆里哆嗦就应承了他。必须去掉一人才能加进这个人，书记掂量来掂量去哪个也不好惹，就把生性软弱的刘榔头除了名。

刘师傅的女儿刘颖正上中学，妻子没收入还需要长期服药，日子很紧巴，两次张榜公布已然手拿把攥、必涨无疑的那级工资，没有任何解释就不翼而飞了！刘师傅急得嘴上起泡、牙床子红肿、嗓子也哑了，他的大徒弟小赵跑去质问车间书记，书记无奈说出真相，小赵气不忿找那人评理，男青年气急败坏破口大骂，

掐着生理缺陷的七寸狠狠当众羞辱刘师傅。蒙受这番奇耻大辱，老婆女儿也没法交代，刘师傅一病不起，高烧不退，住进医院没几天就亡故了，终年刚50出头。

刘师傅病故后，我去他家看望刘师娘和他的养女，刘师娘使劲拽着我的手，洒泪相告，刘师傅病中曾对女儿小颖说“以后遇到难处，去找你于姐。”

听闻此言，我泪水盈眶。当时有政策，老工人退休或病故，可以安排子女中的一人进所在单位接班，顶替父母享受国家正式职工待遇。据此，我跟主管厂长说了刘师傅的遭遇，厂长动了恻隐之心，我赶紧叫刘师傅女儿来面见厂长，厂长见姑娘文静秀气的模样，就准了接班一事，安排小颖进厂部办公室当了打字员。

小颖上班后，表现不错，因家庭环境比较特殊的缘故，性情有些内向。刚来时，我去她的办公室看她，她朝我笑笑，马上低头继续练习打字，我就放了心。随后，她来我办公室串门，我说起她爸爸刘师傅技术全面，脾气也特别好。我对面桌是负责人员调配的大张（就是为她办理接班手续的人）接我的话茬对她说：“你爸爸啥都好，就是太窝囊了。”此言一出，她马上站起身，变色道：“他不是我爸爸，以后别提他！”从此她再也没来找过我，即使走路碰个照面，小姑娘一偏头赶紧走开，好像从来不认识我。不久，我参加中国少年报的公开招聘，调离工厂进入报社，没再去看望刘师娘，也没再见过刘师傅的女儿小颖。

顺便说一句，我过去供职的、位于京郊的三座大厂：起重机械厂、建筑机械厂和第三通用机械厂，作为北京市工业改革的首个试点，三厂合并成一个万人大公司，迅速失败三年后被拆分，再后来大批工人纷纷下岗，当年人气、产值俱旺的东三厂，早已不复存在，如今连个影子都不见了。❶

【述往】

## 1973-1977: 我的“二外”记忆 (14)

——我带走了“二外”的一张借书证

李红云

学校是读书的好地方，二外也不例外。

我73年到二外报到后不久，就拿到了随学生证发下来的一张借书证。借书证也就手掌大小，是淡淡的橘黄色。上面贴着我的照片，还有学号——“731111”，

其中“73”代表年级，“1”是英语系的代号。借书证标志着我正式取得了二外学生的资格，开始享受学生的待遇——可以在学校的图书馆和阅览室借书看书了。



从此，这张小小的借书证陪伴着我在二外度过了三年半的读书时光。

那是1973年到1976年，恰逢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书荒岁月”，精神生活十分贫乏。不管是图书馆还是书店，很多书都因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而禁止阅读。但那个时候像我这个年纪的年轻人，正处在“读书饥渴”的年代。在林彪事件之后我们逐渐从狂热的理想中渐渐清醒过来，开始有了些思考。所以，即使是在意识形态强化到了极点的时候，好书仍然是我们千方百计寻找的目标。对于知识的渴望和对精神的追求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于是，二外的图书馆和阅览室自然成了我最喜欢去的地方。

记忆中，二外的图书馆不大，只是一间大点的教室。图书馆不对学生开架，门口摆张桌子，我们将填好的索书单交给管理员，他找到后给我们。从门口可以看到里面一排排的书架，上面摆满了书。对于我来说，这间不大的屋子里藏在许许多多的奥秘。为了能探寻到更多的奥秘，就频繁地去图书馆，频繁地借书。

还记得从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一本彩色插图比文字还要多的英文书，可能就是一本少儿读物。里面的插图有灰色的城堡、绿色的树林、五颜六色的花朵，还有一位漂亮的女妖。这本书我翻了又翻，看了又看。直到借助唯一的一本英汉小词典，把那几句英文都看懂了。

后来还借过不少的书。

记忆中还保存着我当年看书的场景：大部分时间在教室或在阅览室，天气适宜时我喜欢去教学楼四楼顶的露台，找个地方靠着墙，垫张纸席地而坐——那里无人打扰，可以完全沉浸在书中。在书本与知识中遨游，你会忘记一切。那种感觉是我自从离开学校后一直盼望的。

阅览室和教室的窗外，就是那小路两旁的梧桐树。它们枝干挺拔，生机勃勃，盛夏之时更是绿意磅礴。有多少次，读书的间歇，我的目光会落在那些梧桐树上，它们成了我的目光经常可以投靠的风景。

刚入学时还看不懂多少英文著作，于是读中文译著就成了我阅读的主要内容。但有些书学校的图书馆里借不到，于是，同学之间的互相借阅就成了书籍的主要来源。

入学后同学之间熟悉起来，很快就找到了几位跟我一样爱读书的同学。“智识的成长在于交流”。我们经常会利用课余时间谈古论今，谈各自读过的书，也会互相推荐和借阅一些书。

记得有一次晚自习时，我和一位同学在教室里整个晚上的时间都在讨论《红楼梦》里的“好了歌”。说起来，《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是我在上二外之前才正式读到。这几本书是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为了表现图书市场的繁荣，各地新华书店被要求投放的。我家还买了一套《红楼梦》。

那晚，我们聊得兴起，有讨论，有争论。因为怕影响别的同学，就在纸上笔谈。这张纸居然被我保存了下来。记忆中，这样的讨论还是挺多的。

那时读的书并不系统，由于书少，也没有什么选择，基本是拿到什么读什么，也不管看得懂看不懂。

回想起来，并根据我当时的笔记，当时读的书主要是下面几类。

### 西方名著

入学后不久，同班的一位同学曾借给了我两本书：一本是拜伦的《唐璜》；另一本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后者实际是一套四本。这些书到我手上时已经不知经过了多少读者的手，已经被翻得有些破烂。

此前，中国的文学作品我读过不少，外国名著中除了一些苏联的小说外，则读得很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完全受的是正统的教育，即完全由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的教育，从来没有看过这类似乎与主流意识形态所控制的正统教育有点不搭的书。坦率地讲，以我文革开始时只读到初中二年级的水平，很多书我也看不懂。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开始尝试读一些西方的名著。

《唐璜》是英国作家拜伦的代表作，也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书中的内容虽然当时还不能全理解，但里面唐璜的种种浪漫奇遇，欧洲社会的各种人物百态，城市的各种风情，都向我展现了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五彩斑斓的世界。里面的许多描写都令我惊叹：还有这样的人，还有这样的生活，还有这样的书。

《约翰·克里斯多夫》读起来容易理解些，因为其主人公约翰·克里斯多夫的许多事迹是以音乐家贝多芬为原型的，是一部宣扬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长篇小说。但当时主要看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并没有注意小说中的那句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不过，通过这本书我记住了该书的作者罗曼·罗兰，后来才知道，他凭借这本书获得了19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西方的名著后来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我读得越来越多，但对最初读的以上两本书记忆非常深刻。在阅读中，我会把一些自己喜欢的片段抄在本子上以加深印象，反复阅读，就这样慢慢养成了一种做笔记的习惯。

### “灰皮书”

苏联的文学作品曾经对我们这代人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一些宣扬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文学作品曾经让还是少年的我热血沸腾，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可以成为卫国捐躯的英雄。如高尔基的《海燕》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sup>1</sup>，《海燕》中那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还有保尔·柯察金的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sup>2</sup>在我们那一代人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段话至今我都可以一字不落地背诵。还有一本叶·伊琳娜的《古丽雅的道路》<sup>3</sup>，这是我上中学时读过一本书，至今这本被翻烂的、已经没头没尾的书仍然躺在我家的书架上。

随着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的书很少看到了。记得看过的一本书是《叶尔绍夫兄弟》，还有大约在1967年看过一本《红肩章》，描写的是苏联苏奥洛夫军校学员的学习和生活。书中描写的学员的生活曾让我羡慕不已。此外，我还读过马雅科夫斯基的长诗《列宁》和《好！》。

到了70年代，忽然出现了俗称的“灰皮书”。这类书其实就是“禁书”，主要是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和内部读物。70年代初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的一些新翻译的苏联小说，就是“灰皮书”的代表。这些书封面设计、装帧都一样，“内部发行”四个字印在书的封底页上。所谓“内部发行”，有个冠冕堂

<sup>1</sup>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梅益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12月

<sup>2</sup> 这段话的全文是：“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才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sup>3</sup> [苏]叶·伊琳娜：《古丽雅的道路》（任溶溶译），时代出版社，1953年10月。该书讲述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古丽雅为了夺回被德寇占领的五六·八高地，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成为一名苏联英雄的故事。

皇的理由：供“批判”使用。虽然都是正式的出版社发行，但只发行到县团级以上单位，凭书店“到货通知”和单位介绍信购买。二外图书馆里是否也有，我并不确定，但从来没借到过。

这类书我读过的有：谢苗·巴巴耶夫斯基的《人世间》<sup>1</sup>、柯切托夫的《落角》<sup>2</sup>、伊凡·沙米亚金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的《多雪的冬天》<sup>3</sup>。

这些“内部发行”的苏联小说，多半是揭露了当时苏联国内社会现实中的一些阴暗面。所以书前就会在“内容说明”或“内容提要”中阐明出版者的意图。比如《多雪的冬天》就在《内容提要》里写明，小说揭露了“苏修特权阶层中一伙人的丑恶面目”。

当时我读这些书的时候早把批判放到了一边，更关注的还是书中的内容。对于我们而言，这实际是在文化荒漠与思想禁锢的时代得以接触外国文学、窥见外部世界的一个机会。从这些阅读中我看到的是另一个不同的世界，经常会获得一些从未有过的快感，有时可能还会成为同学间交流的话题。

这类“灰皮书”的获得渠道基本是借，一本书不知要传多少人的手。还有一套书是我家里买的，就是[美]威廉·夏伊勒著，董乐山译的《第三帝国的兴亡》<sup>4</sup>。这套书借来借去，最后就借丢了，不知落到了谁的手里。

当时还看过的一本书是马克斯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sup>5</sup>还有一套三本书是戴维·哈尔伯斯坦著《出类拔萃之辈》<sup>6</sup>，讲的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这是我当时看过的为数不多的社会科学类的图书。封面都是灰色的，内部发行。

### 英语简易读物和注释读物

大一以后，随着英语阅读能力的提高，我已经可以阅读英语的简易读物了。这类书是我用借书证在学校图书馆借的最多的书。

<sup>1</sup> [苏]谢苗·巴巴耶夫斯基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人世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

<sup>2</sup> [苏]弗·阿·柯切托夫著：《落角》，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9月

<sup>3</sup> [苏]伊凡·沙米亚金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多雪的冬天》，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12月

<sup>4</sup> [美]威廉·夏伊勒（董乐山译）：《第三帝国的兴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3月

<sup>5</sup> [澳大利亚]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著（陆仁译）：《印度对华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1年

<sup>6</sup> [美]戴维·哈尔伯斯坦著（齐沛合译）：《出类拔萃之辈》（上中下）（内部发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12月

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出版一些由外国名著改写的英语简易读物，如：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Oliver Twist*（雾都孤儿）（1959年4月版）、*Great Expectations*（远大前程）（1964年5月版）、*A Tale of Two Cities*（双城记）（1964年1月）、*David Copperfield*（大卫·科波菲尔）；Abdulla El Tayib Michael West 的*Stories from the Sands of Africa*（非洲沙漠上的故事），Jonathan Swift的*Gulliver's Travels*（格列佛游记），Lewis Carroll的*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爱丽丝漫游奇幻记），等等。这些书实际是英文原著的简写本。非常适合大学英语专业二年级以上学生或同等程度的读者阅读。

对于我们来讲，这些简易读物中生词较少，基本不用查字典。遇到生词时就连猜带蒙，反正能明白上下文意思就行。实在搞不清楚了再查字典。这样注意力可以集中在内容和文字的表达方法上，因此可读得快，读得多。阅读能力提高很快。

简易读物中的故事情节虽然有所简化和删节，但原著的精神内涵和文学成分得以保留，大量阅读这类读物不仅可以让我们的英语阅读能力上有所提高，扩大词汇量，还能拓宽视野，陶冶情操，提高人文素养。

我阅读的很多西方文学名著，其实都是从阅读这些英语简易读物开始的。

除了简易读物外，商务还有一套英语的“注释读物”。如：H.G.Wyatt改写、吴翔林注释：*Stories From Shakespeare*（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上）（下），1964.8），上下两册共包括16个故事，包括了莎翁著名的戏剧：《威尼斯商人》《麦克佩斯》《如愿》《李尔王》《第十二夜》《暴风雨》《哈姆雷特》《冬天的故事》，等等。

这些莎士比亚著名剧本改写而成的故事，内容情节曲折、饶有趣味，文字浅易流畅。除对难句难词加上汉语注释外，书末附有词汇表。

这些书的装帧很有特色，封面都是单一的颜色：橙黄、玫红或翠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开本较小，长方形，便于携带，装在口袋里正合适。

这些书我读了不少，主要是从学校图书馆借，也有向同学借的。

### 英语原版书

二年级以后，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我开始阅读英语的原版书。

为了提高我们的阅读水平，系里还专门翻印了一些英文原文的阅读材料发给

大家。我保存的美国人Red Reeder所写的“*The 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本。

系里发的实际是这本书的节选本。书的封面印着“内部使用”，时间是1975年冬季，这时我们刚刚进入大三年级的学习。在这本书的“说明”中讲到了为什么要选这本书：“本书……文字较为浅易，且有一些常用的典故，对于我们学习语言及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实是有帮助的。”接下来的一大段文字是对作者的批判：

作者由于他的唯心史观，不可能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对大战的原因做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作者顽固地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敌视共产主义，敌视斯大林，因此是叙述第二次大战的过程中，肆意吹捧丘吉尔、罗斯福等资产阶级人物，竭力贬低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在击败法西斯侵略中的决定性作用，甚至在描写希特勒等法西斯分子时，有时也流露出某种赞许或惋惜的情调，对于作者的这种反对立场，阅读时应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sup>1</sup>

编写阅读材料的老师们非常清楚，学习语言必须要阅读原文的资料，为了避免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大帽子，不得不加上这样一段批判的内容。

考虑到我们的英语水平阅读这样的资料还有一定的困难，老师们在每一个故事的后面特地加上了“Note”（注释），讲文中难懂的单词、词组和句子用汉语一一做了解释。有了这些解释，我们阅读起来就容易多了。

除了系里发的这些阅读材料外，我们接触英文原版的图书资料还有一个途径就是学校的图书馆和阅览室。

我比较喜欢的是学校的阅览室，经常在晚饭后将整个晚上都“泡”在阅览室里，直到值班的那位女老师用浓重的分不清是四川还是湖南的口音反复催促：“到时间了”，我才极不情愿地把手里的刊物放回架子上。

阅览室里除了有一些外语类刊物外，还有一些社科类的中文刊物，如《学习与批判》，可以在里面看到一些对于当时苏联文学的评介。对于我们而言，在这些刊物中可以看到“八个样板戏”以外的一些东西。

<sup>1</sup> “说明”见 Adapted from RED REEDER'S, *The 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English Department, The Second Peking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Winter 1975.



此外，阅览室还有《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sup>1</sup>和《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sup>2</sup>这类国内发行的英文刊物。除此之外，在这里还可以看到一些英文的原版刊物。如澳大利亚共产党的机关报《先锋报》（*Vanguard*），新西兰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之声报》（*People's Voice*）。听戴宗显老师讲，文革前及文革中，二外有“涉外特权”，所以可以订阅像美国的“*Time*”（《时代周刊》）<sup>3</sup>，“*Newsweek*”（《新闻周刊》）<sup>4</sup>和英国的“*Financial Times*”（《金融时报》）<sup>5</sup>等国际著名的英文刊物。

阅览室的这些刊物扩大了我的知识面和阅读的范围。

但是，图书馆里英文的原版书很少，阅读这类书的渠道主要是同学间的传阅。

原版书中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美国作家Joseph Heller(约瑟夫·海勒)的*Catch-22*（《第22条军规》1961），记不得是向哪位同学借的了。但当时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Black Humor”（黑色幽默），看了好多页也看不懂，甚至不明白“*Catch-22*”是什么意思。还记得我拿着这本书去找吴敬瑜老师求教。在她的耐心解释下，我稍稍明白了一点，硬着头皮把这本书看完了。

在我保存的读书笔记中，还有一本书是德国作家Erich Maria Remarque（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1898年6月22日-1970年9月25日）写的：*All Quiet On The*

<sup>1</sup> 《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是当时中国唯一的英文新闻周刊，于1958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创办，是中央级重点对外宣传刊物之一。《北京周报》为外国政府官员、投资人、商人、学者提供有关中国发展的新闻和评论，同时也是国内外事、外贸和各类高级专业人士必不可少的英文时事周刊。

<sup>2</sup> 《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1952年由宋庆龄创办。创刊时为英文双月刊，1955年起改为月刊。从1960年至1980年，先后有西班牙文版、法文版、阿文版、俄文版和葡萄牙文版创刊。1980年10月中文版创刊。1990年1月，该刊易名为《今日中国》（*China Today*）。详见<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BB%BA%E8%AE%BE/12681179?fr=aladdin>，访问时间2020年12月9日

<sup>3</sup> 《时代周刊》（*Time*）又称《时代》，创刊于1923年，是美国的三大时事周刊之一。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最先出现的新闻周刊之一，特为新的日益增长的国际读者群开设一个了解全球新闻的窗口。《时代》是美国三大时事性周刊之一，内容广泛，对国际问题发表主张和对国际重大事件进行跟踪报道。详见<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B6%E4%BB%A3%E5%91%A8%E5%88%8A/6643818?fr=aladdin>，访问时间2020年12月16日

<sup>4</sup> *Newsweek*（《新闻周刊》）是美国时政杂志中因评论优秀而获得荣誉最多的周刊，1933年2月17日创刊。该刊与《时代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并称为美国三大新闻周刊。它是一份在纽约出版，在美国和加拿大发行的新闻类周刊。详见<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9%97%BB%E5%91%A8%E5%88%8A/66028?fr=aladdin>

访问时间2020年12月16日

<sup>5</sup> 英国的*Financial Times*（金融时报）是由James Sheridan及其兄弟于1888年创办的世界著名的国际性金融媒体。该报在伦敦、法兰克福、纽约、巴黎、洛杉矶、马德里、香港等地同时出版，日发行量45万份左右，其中70%发行于英国之外的140多个国家。该报为读者提供全球性的经济商业信息、经济分析和评论，由该报创立的伦敦股票市场的金融指数更是闻名遐迩。详见<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8%9E%8D%E6%97%B6%E6%8A%A5/3749639?fr=aladdin>

访问时间2020年12月16日

*Western Front*（《西线无战事》）<sup>1</sup>。读这本书的时间是1976年10月。

我读过的英文原版的小说还有一本是爱尔兰女作家 E.L. Voynich（艾捷尔·丽莲·伏尼契）的小说：“*The Gadfly*”《牛虻》。虽然早就听说过这本书，但读原版还是第一次。书中描写的主人公牛虻与琼玛的虐恋，让我几乎落泪，尤其是牛虻在临死前留给琼玛的那封告别信，我读了又读，还一字不落地抄在笔记本上。那种撕心裂肺的爱情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抄在笔记本上的还有一篇英文的演说辞，是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的那篇只有三分之一的著名演说——葛底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它因演说地宾夕法尼亚州的葛底斯堡而得名。该演说只有10句话272个单词，语言简洁而精炼，用最短的篇幅阐释了具有极为深远历史意义的理念。在这篇演说中，我第一次知道了“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这几个词。也开始了解了一些其中的含义。

### 八面槽的外文书店

这里我要说的是这家外文书店中的“内部书店”，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北面八面槽。那时，一些外文书店中都会有这种专门面向“内部读者”的店中店，外国人禁止入内。

进入外文书店大门，右手边有一个踏上去“咚咚”作响的木制楼梯。楼梯口有一个告示牌说明二楼只允许内部人士光顾。沿着楼梯上到二楼，可见一小房间，有一个小窗口专门有人检查证件。当时还没有身份证，也没有私人企业，只要“有单位”的人都会有证件，所以有工作证或学生证都可以进去。二外的学生证就管用。

进门之后可以看到高高的书架上摆满了书，这里的书都是国外原版书的影印版。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组织，随意翻印外版图书，纸张虽粗糙，价格却便宜。各种最新的外文原版词典、科技书刊、社科英文专著，应有尽有。还有一些外文影印书的征订目录可供预订

这类书在封底前的那页都会夹上一个大约2x3厘米的小纸片，上面写上该书的中文译名和价格，还会特别标明“内部交流”。

<sup>1</sup> 《西线无战事》（德文原名：*Im Westen nichts Neues*，英文原名：*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是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创作的长篇小说，1928年发表在《福斯报》，翌年单行本出版，共分十二章。详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7%BA%BF%E6%97%A0%E6%88%98%E4%BA%8B/68399?fr=aladdin> 访问时间 2020年12月21日

这些书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国内专业书籍的不足，因此该书店成为我特别喜欢去的地方。它正好在我家和学校之间，到书店很方便。有段时间，我每周六中午在学校吃完午饭，就和同学一起乘坐1路公交车在王府井下车，穿过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大街就到了这家书店。看上一阵书，再挑上本书喜欢的书，然后再回家。

现在我家的书柜里还有很多在这里买的书。这些书中，英语类的主要书有：

Linguaphone Institute, *English Course* (《灵格风英语教程》)，三册，从初级本(0.5元)、中级本(0.7元)到 *Advanced English Course* 高级本(0.8元)，1974年购买。

Alexander L. Sheff and Edna Ingalls, with revisions by Mary S. Allen, *How to Write Letters for all Occasions* (《英文书信大全》)，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71 出版。

C.E. Eckersley, M.A and J. M. Eckersley, M.A, *A Comprehensive English Grammar for Foreign Students* (《综合英语语法》), Longmans, 1961 出版。硬皮的精装本，440页，1.9元。

当时学习英语的工具书很少，连本像样的字典都没有。一本巴掌大的《简明英汉小词典》几乎是我唯一的工具书。直到在八面槽买到了一本双解的英语辞典后，才结束了我没有英语字典的学习。

这本字典就是：A. S. Hornby, E.V. Gatenby, H. Wakefield, *Th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现代高级英语辞典》)，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硬皮精装本，只卖4.40元。

这本字典对于我们的学习有非常大的帮助，后来做了我们老师的黄建东在文章中也提到过。他写到：

当时，我们班几乎每人手头都有两本字典：一本是ALD (*Th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纯英文的解释；另一本则是《英汉小字典》。ALD是老师推荐的，每本四元四角。……按照当时是英语水平，翻阅纯英文释词的字典时，自己的词汇量是不够的。……时间一长，我们就慢慢体会到了用英英字典的好处了，特别是在对词的理解上。因为是从英语去理解生词的，所以理解比较准确。<sup>1</sup>

<sup>1</sup> 黄建东：“大学七年”，载于《二外四十年》编辑委员会编：《二外四十年》，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字典中还夹着一张小纸片——“告国内读者”。上面写到：

《现代高级英语辞典》（“*Th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2<sup>nd</sup> ed, 1963）是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编目征订的外语工具书之一，现在根据读者的要求，继续予以发行。

原书是英国的几个资产阶级学者编著的。出于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对所收编的词语，按其资产阶级观点进行了歪曲性地解释。诸如该书第272页中关于“dictatorship”（“专政”）一词的释义：“Government by a dictator”。第362页中对“feasible”（“可以实现的”）一词的用法所举例句：“A counterrevolution is feasible ,we can, if we choose, bring one about.”等等，不胜枚举。这一类词句的解释是相当恶毒的。我们希望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读者，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洋为中用”和“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原文如此——笔者）的原则，批判地加以使用。

北京608邮政信箱 1971年8月

出版者将这段话印出来，无非是先给读者“打预防针”，然后为自己“规避风险”，免除自己的责任。这也是当时的惯常操作。

这本字典我用了好多年，现在仍静静地躺在我家的书架上，偶尔还会翻一下。

随着书越读越多，阅读范围越广，我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为我日后在学术方面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书读多了就会有了自己的想法。独立思考的习惯渐渐养成。

如今我已离开二外多年，却依然十分怀念那时的读书时光——那是年轻时充满了渴望、痴迷、悸动，有时还会热血沸腾的读书时光。

那是一个物质和精神都十分匮乏的时代，但这并没有阻止我们将最单纯最干净的年华浸入到最优秀的书籍中。不经意间，那些经典滋养了我们还在成长的身心。那时读过的书，或许对我后来选择法律专业产生了影响。书中那些曾经有过的美好与崇高，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直到现在，脑海里经常浮现出这样的场景——晚上上完自习，和同学一起走

出教室或阅览室，穿过那两旁都是梧桐树的小路走向宿舍。

这时，微风吹过，树叶簌簌作响。我们边走边聊着各自刚刚看过的书。皎洁的月光透过梧桐树的枝叶，在我们年轻的脸庞上跳跃。……

也许是因为太怀念二外的读书时光，离开二外时，我还清了从图书馆借的书，却带走了二外的那张借书证——她是我自认为最有意义的纪念品。

好想有一天，再拿着这张借书证，到二外的图书馆借一本书，或在阅览室里看一本杂志，再和同学一起，走过那两旁都是梧桐树的小路。📖

……

## 【书讯】

# 《吴忠将军口述——几件大事亲历记》

在美国华忆出版社出版



ISBN: 978-1-68560-004-4 (Print)

978-1-68560-005-1 (Ebook)

书名: 吴忠将军口述——几件大事亲历记

整理：陈楚三 李大震

出版：美国华忆出版社

版次：2021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字数：100千字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 LCCN：2021 920860

## 整理者说明

1986年夏，已经退休的吴忠将军与陶然女士多次长谈。陶然，原名朱东北，是辽沈战役中牺牲的解放军著名将领朱瑞同志的次女。因吴忠系朱瑞同志老部下，所以吴忠与老首长女儿的谈话很敞开，无拘无束。

在谈话中，吴忠回忆了他在文革中和文革后亲身参与的几个重大事件。在回忆林彪外逃事件的处理时，披露了林彪在“9.13”之前写给毛泽东、但最终没有送出的一封信。尼克松访华期间，恰逢北京鹅毛大雪厚达30公分，而第二天尼克松游览八达岭长城和十三陵时，一路上却既没有雪也没有冰，传说是动员沿路群众连夜清扫，吴忠的回忆为此解惑。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吴忠是清场时的现场指挥，邓小平复出后说天安门事件至少死了六人（吴忠为此于1977年9月被调离北京卫戍区，蒙冤十年），吴忠则多次表示：他保证当时没有死一个人。吴忠直接参加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1979年，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吴忠正在积极准备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开战前夕，军委下达了吴忠的免职命令，广州军区为避免临阵换将，请示军委批准后未宣布此命令，吴忠得以在一线直接参与指挥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吴忠还结合亲身经历，对党内斗争的不正常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

陶然女士将谈话内容做了现场录音。吴忠与陶然谈话时，陶然的丈夫李大震在场。

吴忠将军于1990年2月因车祸逝世。陶然也于1990年11月辞世；她临终前把吴忠将军谈话的录音带16盒交给我们两人各自保存一套，并嘱在适当时机整理公布。二十年后，我们才按照陶然的遗愿完成了录音整理工作。

我们整理录音时力求保持口述原貌。但磁带有些地方听不清；特别涉及具体人名、地名时，难免有不准确之处。敬请读者见谅。

我们对吴忠的口述回忆录音整理完成后，希望尽快公诸于世。《炎黄春秋》

杂志 2012 年第一、三、五期，选登了其中三节（九一三事件、1976 年天安门事件以及粉碎“四人帮”），但不知触犯了什么禁忌，在当年杂志受到的十八次警告中，吴忠回忆竟占了四次！

为便于读者了解吴忠所述事件的背景，我们增加了必要的注释。不过，吴忠的口述回忆从录音整理完毕到成书出版，又拖了十年；期间，注释中涉及的人物有些确知已经辞世（如王海蓉、谢静宜都在 2017 年去世），更多的则不了解现状如何，因此我们对这部分人只注明出生年份或者干脆回避。

录音整理者：陈楚三 李大震

2021 年 9 月

回应：

《炎黄春秋》2012 年第三期刊登了吴忠口述中关于 1976 年天安门事件的大部分（不是全部）内容，同年第六期《炎黄春秋》发表马懋如文章，质疑吴忠所说“与事实并不一致，让人难以理解”。

我们完全同意马文中对 1976 年天安门事件起因、经过和性质的分析和认定，并无异议。但该文对吴忠的质疑却失之偏颇。

吴忠谈到事件的“诱因”时，首先感到在北京医院太平间与总理遗体告别不够规格，接着提到不让各单位设灵堂悼念的“干涉来自中央”“心里不舒服”“很不理解”“群众很不满意”“全国人民都不满意”；吴忠没有明指“四人帮”反对周总理，但却表示对毛主席在周总理病重时没有去看望、在周总理逝世后没有参加遗体告别也没有参加追悼会，反复说“不理解”“很不理解”“很有想法”“心情很复杂”，这说明吴忠想得更深、更“复杂”，实际上是一种暗示。

吴忠口述中几次提到“劝阻”送花圈，指出这是“中央的精神”；吴忠能信口说中央“劝阻”送花圈的精神就是“禁止、镇压、打成‘反革命’”吗？当然不能。口述中提到，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布置，要天安门广场的值勤战士等人员“劝阻”群众送花圈，吴忠“当场拒绝”，表示“只要送到天安门附近，就不能劝阻，只能协助群众把花圈安放好，排列好，保护群众安全，防止外国人搞破坏活动，防止坏人破坏花圈。”

天安门广场的值勤战士很好地执行了吴忠的要求。“纪念碑摆满了，广场摆满了，一直摆到灰观礼台，也摆满了”，又“把红观礼台开放。红观礼台也摆满了，不存在群众送来花圈没地方放的情况，群众很满意，在红观礼台上很醒目，很壮观”“警卫战士的态度也非常好。”这是符合事实的。马文所说刘湘屏对医科院“问罪”，要他们把送到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拿回来，这并不能否定值勤战士“协助群众把花圈放好”的事实，和吴忠无关；至于医科院有人在“四五”后被诱捕入狱，更和吴忠要求天安门广场值勤战士“保护群众安全”扯不上关系。吴忠所指，是维护当时天安门广场的秩序，不能出安全事故；吴忠虽然是分管政法系统的市委书记，但他既不能指挥北京市公安局，更指挥不了公安部，他只能对卫戍区警卫部队的行为负责，让他为“四人帮”及谢富治的公安系统镇压群众的罪行承担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

马文说吴忠“强调天安门事件是‘极个别’的‘攻击毛主席’，‘是少数人’‘起哄’‘胡闹’”“是‘一伙人闹事’，‘引发’了‘冲突’”，这一指责毫无根据。吴忠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可以避免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他明确指出，“天安门事件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鲁瑛的条子”“把政治局原来已经确定的6日收花圈提前两天，这是造成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原因。”“如果花圈允许放到六号，六号晚上收花圈，冲突就不会有；冲突不会有，烧房烧汽车的情况就不会出现；不出现，哪来的天安门事件呢？”

吴忠的假设不见得能成立，但确有极个别人攻击毛主席，也确有极少数人在天安门广场砸汽车、烧汽车、烧自行车，并进而烧楼、抢楼内东西甚至武器，尽管人不多（二十多人），性质确属犯罪；这一事实成了“四人帮”诬陷邓小平、诬蔑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活动的借口，也是促使毛主席说“又打、又砸、又烧，性质变了”的理由。至于吴忠，认为天安门事件“是个大笑话”“真正像样的反革命，没有”，仅从他在当时那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下，竟斗胆把政治局决定的清场时间擅自推迟两个半小时，就足以表明他对事件定性的态度了。❏

（本书出版时略有修改）

2015年9月



【资料】

## 清华大学“文革”期间造反组织的情况调查

### 中整办调报字【83】3号

根据耀邦同志和一波同志的批示，北京市委段君毅同志派人对“清华”的派系情况和北师大“文革”期间造反组织的情况作了调查。现将北京市委的调查材料摘要如下：

#### 清华大学“文革”期间造反组织概况

一九六六年八月，先后成立一批红卫兵组织，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称八八派）、“清华大学红卫兵”（称八九派）、“清华大学红卫兵造反总部”。一九六七年四月，由于观点分歧，形成了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简称团派）”和以沈如槐为首的“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简称四一四）两大派。

“井冈山兵团”的头头和骨干，运动一开始大多是反蒋南翔，后又反工作组的学生和少数教工。他们自始至终是反刘、邓，反蒋南翔和前校党委，自称是“一反到底”的造反派。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煽动和支持下，他们中的不少人干了大量坏事：

- （一）残酷迫害干部群众，大搞刑讯逼供；
- （二）挑起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造成十二人死亡，三十余人残废，数百人受伤；
- （三）支持各地造反派，反军乱军，大搞打、砸、抢、抄、抓；
- （四）反刘少奇同志和周总理，揪斗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 （五）砸机关、抢档案，造成严重后果；
- （六）武力对抗，驱赶工人、解放军宣传队，造成五名工人死亡，七百三十一人受伤。

“四一四总部”有许多人原是“八八派”。他们开始批判工作组，后来批判刘、邓和蒋南翔、前校党委。他们认为校内解放后十七年红线占主导地位，我们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路线。也有

抓干部和个别人殴打干部的行为。在校外，他们支持“地派”造反派，也积极参与了围困中南海，“揪刘火线”、揪“军内一小撮”、打砸抢等活动。主要有：

- （一）派人出去揪“军内一小撮”；
- （二）参与北京地派策划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活动；
- （三）抬尸游行，造成不良影响；
- （四）“四一四”一百余人，被团派武力围困在科学馆，他们炸断三万五千伏高压线，造成严重后果。

“井冈山兵团总部”问题较多的机构有：专案组、文攻武卫指挥部、军事动态组、全国联络站、保卫部（专搞打砸抢抄抓）、宣传部、工总司（专搞武斗）、斗蒋（南翔）兵团。

“414 总部”问题较多的机构有：作战部、斗蒋（南翔）作战部、保卫组、专政组。

“井冈山兵团”总部核心组成员有：蒯大富、鲍长康、刘才堂、陈继芳（女）、陈育延（女）、任传仲、王良生、马小庄等。蒯大富、任传仲已判刑，其余人员列为记录在案对象<sup>1</sup>。

“414 总部”核心组成员，有沈如槐、宿长忠、刘万璋、汲鹏、陈楚三、孙怒涛、张雪梅、黄瑞和、蒋南峰等，其中有的人犯一些错误，均记录在案。

来信人陈楚三<sup>2</sup>是“414 总部”核心成员，负责宣传，在清查中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但“文革”的表现记录在案，现是党员，在北京某炮兵研究所工作。

清华大学党委根据中央有关清理“三种人”的精神，正在对这些人的问题做进一步深入清理。

## 编者的话

这份文件的形成日期是 1983 年 11 月。

文件中提到“来信人陈楚三”，陈楚三给李志民（时任中组部青干局局长）写信介绍清华文革两派的时间是 1983 年上半年；

<sup>1</sup> 文件原文中，陈继芳错印为“陈继芬”，黄瑞和错印为“董瑞和”。

<sup>2</sup> “来信人陈楚三”的“来信”，指 1983 年陈楚三写给李志民（时任中组部青干局局长）关于清华文革两派情况的信。2013 年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书中公开了陈云对孔丹信的批示后，陈楚三曾将给李志民信的基本内容投书《炎黄春秋》杂志，《炎黄春秋》2014 年第七期以《关于红卫兵的一桩历史公案》为题发表，但发表时杂志编者所加的两处注释性文字欠妥，陈楚三又致信《炎黄春秋》编辑部请求更正。

当时任青干局长的李锐曾以此信在青干局部分处长、副处长中传阅；

李志民所在处的副处长刘泽彭背着李志民将此信通过密友陈元（陈云之子）捅到陈云处，陈云对此信做了严厉批示（但至今未能获得批示原文），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胡耀邦和常务副主任薄一波随即批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对清华（及北师大）文革两派造反组织情况进行调查；

这份文件就是北京市委调查材料的摘要。

调查是因陈云批示陈楚三的信而起，这份文件也是对陈云批示的回应。

1984年2月23日，孔丹等二人给陈云写信，为以高干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包括北京高等院校的保守派组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一司”）评功摆好、鸣冤叫屈；仅仅过了四天，2月27日，陈云即批示肯定“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强调“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

陈云批示中，要求把孔丹的信和“陈楚三的材料”印发政治局、中央书记处，这里所说“陈楚三的材料”就是陈楚三给李志民的信以及陈云对陈楚三信的批示。

值得注意的是孔丹给陈云写信时的身份。这时的孔丹，正担任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的秘书，并且是陈云办公室一个“学习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包括陈云的两位秘书及陈元等）；因此，陈楚三在他的回忆录《人间重晚晴》中指出，“有人推测，以孔丹、董志雄名义写给陈云的信，很有可能是针对我给李志民的信而精心策划的，说不定就是陈云授意甚至修改的产物。”

也许不是巧合，在陈云对孔丹信的批示之后，已经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因有四人向陈云告状（刘泽彭的母亲是告状人之一）而“被退休”；其后不久，刘泽彭却被提拔为中组部副秘书长，从李志民的下级变成其顶头上司，以后更担任了中组部副部长。📍

#### 【资料】

###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一九六七年目录

1967. 1. 21. （缺版）

1. 彻底砸烂“联动”这个右派黑组织 2. 他们要干什么——揭“联动”暴徒六冲

公安部 3. 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是什么角色

1967. 1. 23. 第12期（四版）

1. 千万不要迷失方向 2. 戳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铸的反革命面目 3. 扫除障碍实现革命大联合 4. 大抓革命 狠促生产 5. 革命造反车间 6. 战斗在北京第一机床厂 7. 简讯：“联动”近况 军内文化大革命动向

1967. 1. 26. 增刊（四版）

1. 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一切反动派的权——希尼斯·卡博在康生同志陪同下来我校参观文化大革命并与井冈山兵团战士亲切座谈 康生同志讲话 2. 在与阿尔巴尼亚贵宾的座谈会上蒯大富同志讲话 3. 在我校两条路线斗争展览会上 希尼斯·卡博同志的题词 4. 照片：中阿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岁！

1967. 2. 1. 第十二、十三期合刊（八版）

1. 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 2. 决不能同右派折中派联合 3. 粉碎向左派的反攻倒算——二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 4. 纠正左派队伍中的几种错误倾向——三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 5. 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倡议书 6. 苏修混蛋绝没有好下场 7. 坚决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群众（略） 8. 造反！造反！ 9. 最最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10. 故事新编：孙悟空四打白骨精 11. 刘少奇对抗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 12. 清除托派——四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 13. 彻底打倒刘少奇叛徒集团

1967. 2. 8. 第十五、十六期合刊（八版）

1. 一场触及灵魂的大论战——五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 2. 论陶铸罪行录 3. 谈“群众” 4. 论“痞子运动” 5. 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六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 6. 提高路线觉悟 保卫红色政权——七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 7. 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续） 8. 彻底粉碎刘少

奇的反革命复辟阴谋——简评 1962 年修改补充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9.  
歌曲：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 权，我们要夺！

1967. 2. 15. 第十七期（四版）

1. 伟大革命导师毛主席和列宁论反对无政府主义 2.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  
通令 3. 邓小平反毛泽东思想言行一百例 4. 抄“私”字的家 革“私”字的命 4.  
以大局为重 要联合 不要分裂 5. 从刘少奇在天津东亚毛纺厂的罪行 看他的反  
革命修正主义嘴脸 6. 快板：造反派生活会

1967. 2. 27. 第十八期（四版）

1. 正确处理革命队伍内部矛盾——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  
表十周年 2. 痛斥陶铸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3. 识大体，顾大局，搞好整风，迎接  
决战 4. 首都红代会首战告捷 5. 痛斥陶铸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6. 是促进大联  
合还是制造分裂 7. 谭浩强同志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 8. 简讯：王力对北大  
等校学生谈如何对待革命干部问题 谢富治接见首都革命造反派

1967. 3. 3.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报编辑部联合报（四版）

1、热烈祝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  
大会宣言 2. 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3.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告全国红卫  
兵书》 4.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上周总理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讲话 5.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文化大革命 6. 紧密团结起来迎接大决战 7. 革命派大联合  
胜利万岁 8. 红代会召开以后

1967. 3. 8. 第十九、二十期合刊（八版）

1.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关于全体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开展军训的决议 2. 自己  
动手搞好军训——记全校军政训练大会 3. 关键在于和“私”字刺刀见红 4.  
在整风中学会整风 5. 我们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掌好权用好权 6. 红卫兵的  
盛大节日 7. 诗歌：赞红代会 8. 高校整风动态 9. 《邓小平反毛泽东思想言

行一百例》 出版者的话 10.《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言行一百例》 出版者的话  
10.彻底砸烂反革命组织“全红总” 11.“中国工农红旗军”罪恶累累！

1967.3.15. 第二十一期（四版）

1.把两条战线上的革命进行到底 2.彻底粉碎从上到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首都红代会组织统一行动 我井冈山兵团连日举行集会游行 3.打倒谭震林,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4.谭震林十大罪状 5.刘少奇的反革命历史 6.英雄的八月属于真正革命的红卫兵 7.大毒草《论造反派》的要害问题是翻案 8.短讯:炮轰谭震林 解放农林口 我校动态

1967.3.17. 第二十二期（四版）

1.团结大多数 将革命进行到底 2.争取和团结受蒙蔽群众 3.我们是如何争取和团结十七人下组的 4.《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纪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四十周年 5.破私立公,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6.干部必须到群众中去 7.短讯:坚决镇压反革命(略)

1967.3.23. 第二十三期（四版）

1.社论:不折不扣地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2.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坚决实行革命的“三结合” 3.砸碎刘少奇反动“修养”的枷锁 4.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5.论“想不通” 6.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7.谁来掌权

1967.3.24. 第二十四期（四版）

1.井冈山人永远忠于毛主席——庆祝井冈山红卫兵成立半周年 2.“清华井冈山人靠‘怀疑一切’起家”的怪论可以休矣！ 3.“八.九”派必须和《修养》彻底决裂 4.《论共产党员修养》是刘少奇个人野心家丑恶灵魂的自我写照 5.革命小将掌权赞 6.井冈山人赞 7.短讯:3月18日在民族宫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 天津红代会光荣诞生 清华附中召开控诉刘邓路线大会(略)

1967.3.29. 第25期（专刊）

1. 大毒草，必须连根铲除 2. 彻底批判个人野心家的人生哲学——评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3.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4. 一个刘氏《修养》的忠实信徒是怎样走上反革命道路的？ 5. 《批斗刘邓陶战斗团》在战火中成立 6.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反毛泽东思想言论举例 7. 小资料：刘少奇的野心 8. 简讯：体院 矿院 北航 掀起批判《修养》的群众运动

1967. 4. 1. 第 27、28 期合刊（八版）

1. 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 2.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调查） 3. 革命干部杀出来 4. 清华干部特殊论可以休矣 5. 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干部问题上的种种表现 6.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7. 亲切的关怀 巨大的鼓舞——全校师生、革命干部热烈欢呼《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发表 8. 刘家衣钵 蒋氏嫡传——从蒋南翔对清华毕业生的讲话看刘少奇的《修养》 9. 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解放出来——揭发和控诉刘少奇——蒋南翔对清华干部的毒害 10. 揭穿苏修的谎言 11. 坦桑尼亚朋友热爱毛主席 12. 图画：热烈欢呼毛主席对清华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关怀

1967. 4. 5. 第 29、30 期合刊专刊（八版）

1. 社论：痛打落水狗 怒批黑《修养》 2. 资本主义复辟的黑纲领、宣言书——评刘少奇的《论修养》 3. 刘记“修养”的灵魂、手段、目的 4. 痛打落水狗——记“4.2”行动 5. 打碎枷锁！——愤怒控诉刘邓路线对我的毒害和迫害 6. 彻底肃清刘氏修养在清华的流毒 7. 漫画：刘少奇的罪状

1967. 4. 6. 第 31 期（四版）

1. 红代会清华井冈山兵团关于四月十日揪斗大扒手王光美的通告 2. 要“放”不要“收” 3. 我兵团举行控诉大会 誓将刘氏黑《修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彻底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基础 4. 愤怒控诉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干部残酷的迫害 5. 让铁的事实说话 6. 控诉刘邓反动路线对我的迫害 7. 刘修外传（第一回）

1967. 4. 8. 第 32 期（四版）

1. 坚定的国际反修战士李敦白同志痛批黑《修养》——在与我兵团战士座谈会上的讲话 2. 全世界无产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彻底批判黑《修养》 3. 刘少奇外传（第二回）

1967. 4. 8. 特刊（四版）

1. 斗臭王光美，打倒刘少奇 2. 激战前夜——记“斗争王光美大会”前的准备 3. 热烈欢呼中央批准揪斗王光美：王光美，滚回来算账 彻底清算刘少奇、王光美破坏四清运动的滔天罪行 4. 愤怒控诉刘、邓、蒋对我的毒害和迫害 5. 王光美丑闻二三事 6. 王光美究竟是什么货色 7. 漫画：打倒扒手王光美

1967. 4. 11. 第 33、34 期合刊（缺版）

1.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2.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役——我兵团和革命群众几十万人狠斗王光美 3. 把仇恨凝聚在刺刀尖上 4. 戳穿王光美对干部的四条毒计 5. 王光美是刘少奇派的刽子手 6. 怒火燃烧 义愤填膺 狠斗王光美 同仇敌忾 众志成城 声讨刘少奇 7. 水调歌头：斗王光美 8. 揭露王光美的“四清”罪恶 9. 粪土当年万户侯 10. 除了一大害，立了一大功——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李敦白同志讲话

1967. 4. 13. 第 35 期（四版）

1. 社论：决不允许转移斗争大方向 2. 彻底粉碎奴隶主义枷锁——评刘少奇的《修养》 3. 我们和刘邓路线不共戴天 4. “修养”与“反蒯” 5. 彻底粉碎奴隶主义的枷锁 6. 刘修与赫秃 7. 赌棍的逻辑

1967. 4. 18. 第 36 期（四版）

1. 干部亮相必须一边倒 2. 矛头对准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3. 肃清无政府主义 4. 谈谈清华干部的特点 5. 干部亮相中的十个错误思想 6. 从要害问题开刀，把《修养》批倒批臭 7. 刘少奇外传（第三回）



1967. 4. 20. 第 37 期（四版）

1. 北京革命的伟大胜利——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2. 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3. 无产阶级专政与刘少奇的假共产主义——评刘少奇的《修养》 4. 李秀成与刘少奇——评刘少奇的叛徒哲学 5. 看！刘少奇投降卖国由来已久——评《人的阶级性》

1967. 4. 22. 第 38 期（四版）

1. 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热烈欢呼“我们自己的权力机构诞生了” 2. 为革命的《北京日报》大声叫好 3. 要允许亮错相的干部改正错误——再论干部亮相必须一边倒 4. 坚决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评《修养》第九节 5. 看，刘少奇毒害青年的罪行——兼批《论修养》 6. 刘修外传（第四回）

1967. 4. 27. 第 39 期（四版）

1. 社论：高举革命批判大旗，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促进革命的“三结合” 2. 红线与黑线——从土建系看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 必须区分红线与黑线 4. 惩前与毖后，治病与救人 5.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紧急通告 6. 寓言：老母鸡的悲剧 7. 简讯：北京各界群众愤怒声讨印尼反动派

1967. 4. 29. 第 40 期（四版）

1. 风展红旗如画——五一献辞 2. 我校革命师生员工将于五月四日举行毛主席巨型塑像落成揭幕仪式 3. 全面地看 热情地帮 4.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介绍革命干部韩银山 5. 在大批判中起来革命 6. 破私立公 亮革命的相 7. 刘修外传（第五回）

1967. 5. 6. 第 41、42 期合刊（八版）

1. 清华园升起不落的太阳——记五月四日庆祝毛主席巨幅塑像落成大会 2. 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胜利前进 3. 砸烂旧清华 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 4. 走毛主席指出的革命道路——南非自由战士发言 5. 照片：毛塑像落成 6. 毛主

席永远统率我们前进！——记毛主席全身巨型塑像的落成 7. 毛主席派人来 8. 诗歌：毛主席啊，井冈山人的红司令 毛主席站在井冈山上 热烈欢呼毛主席塑像的建立

1967. 5. 8. 第 43 期（四版）

1. 把清华大学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2. 校革委会筹备小组 井冈山兵团总部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市革委会决定的通知 3. 清华园的新曙光——热烈欢呼革委会筹备小组的成立 4. 彻底批判《人的阶级性》 5. 灵魂深处闹革命——改造自己为了坚决战斗 坚决战斗必须改造自己 6. 为工农干部进入“三结合”而大喊大叫 7. “新奴隶主义”论可以休矣

1967. 5. 10. 第 44 期（四版）

1. 彻底批判黑《修养》 坚决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2. 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学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3. 狠批黑《修养》，解放一大片 4. 刘修外传（第六回） 5. 诗歌：前进，红卫兵——献给清华大学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学们 6. 短讯：热烈欢迎红色外交战士 坚决支持中学革命造反派 为死难烈士报仇 打倒荣高棠

1967. 5. 11. 第 45 期（四版）

1. 什么“新阶段论”？！ 2. 俯首甘为孺子牛 3. “客观主义”是清华园保守势力“发展兴旺”的法宝之一 4. 驳“为干部平黑”论 5. “两小撮”论必须彻底批判 6. 无政府主义的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7. 向着暴风笑，迎着阻力上一——向四川革命造反派致敬 8. 给成都革命派的声援电 9. 井冈山兵团赴蓉战士决心书 10. 誓作四川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

1967. 5. 13. 第 46 期（四版）

1. 搞臭分裂主义 2. 社论：打倒空想主义 3. 砸烂旧清华要靠谁 4. 科学与空想 马列主义与机会主义——谈解放全人类 5. “新阶段论”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6. 看刘氏忠实走狗薄一波是什么东西 7. 为革命老干部奋起揭发叫好！ 8.

怕死鬼刘少奇 9. 刘修外传（第七回） 10. 短讯：热烈欢迎谢副总理来校 四川老产头目被擒 北航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组

1967. 5. 16. 第 47 期（四版）

1. 斗倒蒋南翔 砸碎旧清华 2. 刹住这股妖风——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重要通告 3. 天翻地覆慨而慷——我兵团举行“打倒清华园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会” 4. 踏平蒋家小朝廷 誓将清华换新天——斗蒋大会发言摘编 5. “九评学习”与“文化革命” 6. 刘修外传（第八回） 7. 短讯：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京剧演员 武汉消息

1967. 5. 18. 第 48 期（四版）

1. 社论：学习江青同志的彻底革命精神 2. 向谢副总理学习 3. 仅仅是奴隶主义吗？——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4. 毛泽东时代工农文艺的春天 5. 在清华园的京剧舞台上 5. 打倒“武训精神”——评反动电影《武训传》 6. 学习光辉的《讲话》 解决立场问题 6. 蒋南翔参与反动的围攻罪责难逃 7. 短讯：强烈抗议港英当局血腥镇压我国同胞 热烈欢迎国际友人 热烈欢呼中共中央重要文件的发表

1967. 5. 21. 第 49 期（四版）

1. 集中火力 共同对敌——学习中共中央 1966 年 5. 16 《通知》 2. 清华大学革委会筹备小组 红代会清华井冈山兵团 关于认真学习《通知》的紧急号召 3. 欢呼北航、北邮、北林等校革命委员会成立 3. 坚决打击一小撮 牢牢把握大方向 4. 粉碎敌人阴谋，夺取新的胜利 5. 敢教日月换新天 6. 井冈山人的大方向全然没错 7. “打击两小撮论”就是均衡论 8. 永远跟毛主席、中央文革干革命——为纪念《通知》发表一周年而作 9. 刘修外传（第九回）

1967. 5. 25. 第 50 期（四版）

1. 毛主席关怀我校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赞成谢富总理主持下达成的四点协议（略） 2. 向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致敬——介绍江青同志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

线而英勇斗争的部分事迹 3. 立即建立革命委员会 4. 刘修外传（第十回）

1967. 5. 27. 第 51、52 期合刊（四版）

1. 毛主席的指示给井冈山人带来无穷勇气和力量 我校文化大革命出现空前大好形势（略） 2. 要真批判，不要假批判 3. 批臭二月提纲，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4. 二月提纲与蒋南翔一小撮——学习《通知》狠批《二月提纲》 5. “奴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6. “新奴隶主义”论是对奴隶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 7. 反革命《二月提纲》的准备、出笼和覆灭 8. 刘修外传（第十一回） 9. 《老残游记》与刘少奇 10. 简讯：外国战友热爱毛主席 大破洋框框——钢琴搬上街

1967. 6. 1. 第 53 期（四版）

1. 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欢呼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诞生一周年 2. 井冈山人永远忠于您——伟大领袖毛主席 3. 誓作井冈山人 4. 打倒资产阶级辩护士——批判反动电影《不夜城》 5. 真正高举《通知》的革命旗帜 6. 劲松与茅草 7. 井冈山人迎着风浪前进 3. 土皇帝——邓小平丑事

1967. 6. 6. 第 54 期（四版）

1. 边整风边战斗 2. 立即制止“内战” 3. 《不夜城》出笼始末 4. 电影评判必须击中要害 4. 念念不忘突出政治 5. 捣毁《林家铺子》 6. 武训是什么东西 7. “官逼民反”是什么货色？ 8. 邓修外传（长篇连载）

1967. 6. 8. 第 55 期（四版）

1. 我校近万人进城参加示威游行 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声明 誓作阿拉伯人民的坚强后盾 2. 社论：阿拉伯人民，中国红卫兵坚决支持你们 3. 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论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 4. 改正错误 关键何在？——二论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 5. 《逆风千里》为谁张目 5. 一株地地道道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评反动电影《两家人》 6. 刘修外传（第二回）

1967. 6. 14. 第 56 期（四版）

1. 突出政治，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 我校革命师生员工积极准备支援夏收 2. 社论：老老实实做劳动人民的儿子 3. 在“改”字上狠下功夫 4. 必须正确对待群众 5. 不许歪曲历史——评反动电影《燎原》 6. 为工农兵掌握文艺批评武器喝彩 7. 绝不让资本主义复辟 8. 刘少奇十七年来在文艺方面的部分反动言论 9. 《逆风千里》要逆什么风？

1967.8.10. 专版（四版）

1. 三审王光美（记录）：第一次审问 第二次审问 第三次审问

1967.8.12. 第73期（四版）

1. 讣告 2. 社论：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 3. 李磊落同志永垂不朽！ 4.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 作千秋鬼雄食补还家——悼李磊落同志 5. 悼念战友肖化时 6. 李磊落同志日记摘抄 7. 大杀回马枪 8. 文化大革命与枪杆子

1967.9.6. 第81期（四版）

1. 社论：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纪念首都三司成立一周年 2. 马列主义当还是修正主义法西斯党？——评刘贼《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 3. 联合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乘胜前进！ 4. 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 5. 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为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6. 就是要打倒朱成昭 7. 蒋南翔的罪恶史——屈膝投降 漏网大右派

## 【读者来信】

### 1. 林成谈言真《写给明天的纪念》

沈力先生的经历是中国那批为共产奋斗先驱们的缩影，历经艰辛、出生入死、饱尝中共内斗磨难，老人家能活着走过来已属万幸！

深有同感，我的父亲也是这样，到死对这党也是忠心耿耿，他对老毛没有表示过丝毫不满，我想可能是他被打成右派开除出党，给整怕了，一直没缓过来的缘故。反正在我面前他从没表示过。

文章最后总结的到位。他们那一代人和那些无数牺牲的战友“只是不起眼的一块基石，一座丰碑的基石还是一道高墙的基石……”。

这块巨大的基石托起了金字塔的顶尖——一个新阶级、权贵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者。

我们这代人可能看不到摘掉那张像、推倒那些像的日子了。但我相信，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不可阻挡，总会到来。👍

## 2. 一青年读者谈沈言真的长篇小说《青春无歌》

郑绩东、郝海静、古岗南这三个主要人物非常饱满，也都有性格的变化，让我对那个年代有了一定的理解。前半部分比较低沉，后边的结果是个很圆满，很轻松的结果。

非常赞叹作者的记忆力，能把这些事都记得这么清楚，写的也非常清楚，让我看明白了那个压抑年代青年的心理状态。

书中也有一些地方没太看明白但也能说得过去：郑和郝后来重逢有点巧合，古和林突然就好上了。还有就是时代的变化来得那么突然，也可能那就是一个畸形的年代。最后还有一个疑问：刘玉芳后来怎么样了？是留在内蒙了吗？还有就是知青偷着跑回来不回去没有人管吗？👍

##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1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